

國立台東大學社會科教育學系
社會科教學碩士班
論文

鍾肇政小說中反殖民意識之研究——
以《台灣人三部曲》、《怒濤》為例

研究生：董砒娟 撰
指導教授：詹卓穎先生

中華民國九十六年八月

國立台東大學
學位論文口試委員審定書

系所別：社會科教育學系

本班 董鈺娟 君

所提之論文 鍾肇政小說中反殖民意識之研究—

以《台灣人三部曲》、《怒濤》為例

業經本委員會通過合於 * 碩士學位論文 條件

論文口試委員會：

曹常仁

(口試委員會主席)

莊德成

詹春穎

(指導教授)

論文口試日期： 96 年 08 月 24 日

國立台東大學

博碩士論文授權書

本授權書所授權之論文為本人在 國立臺東大學 社會科教育學 系(所)

社會科教學碩士班 組 96 學年度第 一 學期取得 碩 士學位之論文。

論文名稱：鍾肇政小說中反殖民意識之研究——以《臺灣人三部曲》、《思痛》為例

本人具有著作財產權之論文全文資料，授予下列單位：

同意	不同意	單 位
☐	☒	國家圖書館
☐	☒	本人畢業學校圖書館

得不限地域、時間與次數以微縮、光碟或其他各種數位化方式重製後散布發行或上載網站，藉由網路傳輸，提供讀者基於個人非營利性質之線上檢索、閱覽、下載或列印。

本論文為本人向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申請專利(未申請者本條款請不予理會)的附件之一，申請文號為：_____，請將全文資料延後半年再公開。

公開時程

立即公開	一年後公開	二年後公開	三年後公開
☐	☐	☐	☐

上述授權內容均無須訂立讓與及授權契約書。依本授權之發行權為非專屬性發行權利。依本授權所為之收錄、重製、發行及學術研發利用均為無償。上述同意與不同意之欄位若未鈎選，本人同意視同授權。

指導教授姓名：詹長義 (親筆簽名)

研究生簽名：董碩明 (親筆正楷)

學 號：KS1393006 (務必填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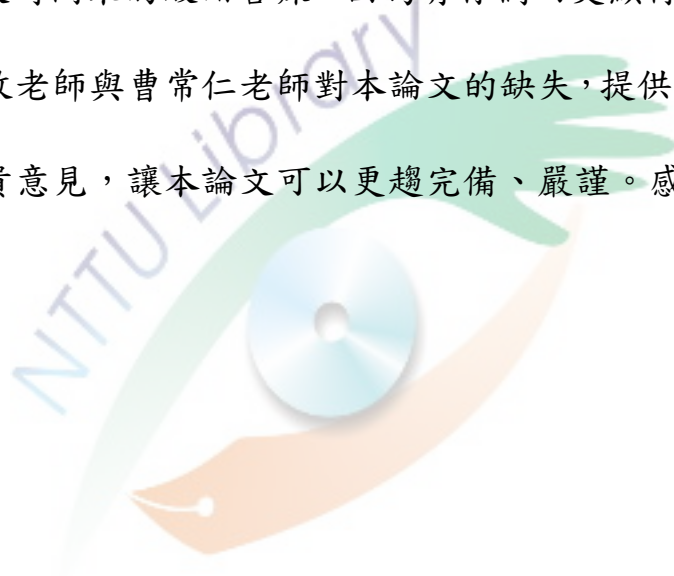
日 期：中華民國 96 年 8 月 27 日

1. 本授權書 (得自 <http://www.lib.nttu.edu.tw/theses/> 下載) 請以黑筆撰寫並影印裝訂於書名頁之次頁。

2. 依據 91 學年度第一學期一次教務會議決議：研究生畢業論文「至少需授權學校圖書館數位化，並至遲於三年後上載網路供各界使用及校內瀏覽。」

謝 誌

能順利完成這篇論文，心中充滿著對許多人無限的感恩。感謝指導教授詹卓穎老師在百忙之中，仍記掛及提點我們完成論文的進度，以及對論文不成熟之處予以指教及修正。我最親愛先生與家人，這一路來默默的支持與陪伴，也讓我在學業上能無後顧之憂；而信君、美秀主任與學校同事，總在我學業與工作兩頭忙時，不斷地鼓勵著我堅持下去，這段時間來的酸甜苦辣，因為有你們而更顯得深刻與難忘。也感謝林德政老師與曹常仁老師對本論文的缺失，提供不同角度的思考方向及寶貴意見，讓本論文可以更趨完備、嚴謹。感謝你們。



鍾肇政小說中反殖民意識之研究——

以《臺灣人三部曲》、《怒濤》為例

董鈺娟

摘要

鍾肇政是戰後臺灣文學史上的傑出作家之一，他的小說內容多取材自其真實的生活經驗，在經歷臺灣光復後白色恐怖的禁忌年代，文學作品成為鍾肇政抒發威權統治下的心理抑鬱的窗口。本文主要以鍾肇政這兩部分別於戒嚴與解嚴時代完成的小說——《臺灣人三部曲》、《怒濤》的文本與主題研究，探究鍾肇政在不同的殖民經驗下，所傳達的反殖民意識內涵及其意義。

本論文共分五章。第一章、緒論。論述本研究的動機及目的，從歷史的背景，與社會的變遷來分析鍾肇政反殖民意識的緣起，兼說明本論文的研究方法與前人的研究成果，作為本論文的發展方向與可能受限之處。

第二章、針對鍾肇政的生平及創作意識做一簡要敘述，以便瞭解鍾肇政成長過程及所處時代背景對其反殖民意識可能產生的影響。

第三章、藉由《臺灣人三部曲》、《怒濤》這兩部小說中的呈現歷史背景，輔以小說中陳述的殖民體制下，殖民者與被殖民者間的衝突，探討臺灣人反殖民意識形成的可能因素，與身為一個知識份子在受壓迫下，所產生的使命感。

第四章、從《臺灣人三部曲》、《怒濤》這兩部小說中，透過不同角度的剖析，探討作者如何透過書寫呈現其反殖民意識，以及其價值所在。

第五章、結論。本章綜合前面各章所述，對鍾肇政的反殖民意識在創作上的代表的意義，以及對臺灣人精神的形塑及族群的迷思做一整合評論。

目次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1
第二節	研究材料、方法與限制·····	6
第三節	文獻探討·····	8

第二章 鍾肇政的生活經驗與文學創作背景

第一節	鍾肇政的生平簡介·····	12
第二節	時代感觸與創作意識·····	17
第三節	承繼新文學運動的創作精神·····	28

第三章 《台灣人三部曲》、《怒濤》中，殖民體制下的衝

突與現象

第一節	異族的統治與種族的歧視·····	31
第二節	社會變動下的農民生活·····	38
第三節	知識份子的使命與宿命·····	41
小結·····		48

第四章 《台灣人三部曲》、《怒濤》中反殖民意識的觀察

第一節	角色的形塑·····	50
第二節	與命運的搏鬥·····	60
第三節	土地之愛的堅持·····	67
第四節	文化交錯下的矛盾·····	72
小結·····		78

第五章 結論·····81

參考文獻·····88

附錄·····93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縱觀臺灣近百年來的境遇，從荷蘭據台揭開了臺灣被殖民的序幕，歷經明鄭、清領時期的統治，臺灣對於中國的統治者而言，一直都是化外之地。清政府更因為臺灣人的三年一小叛，五年一大亂，而視臺灣人為難治之民；1895年甲午戰爭後，清朝確定了臺灣割讓給日本後，臺灣又開始了另一階段的被殖民統治。

不同於荷據時期的殖民統治其間，日本以優勢的武力對台進行有系統的殖民政策。在日本強勢的武力下，讓臺灣人對日本這個強權不得不由武力的對抗轉向法理的抗爭，求取公平的對待。1945年隨著日本無條件的投降，臺灣終於回歸了祖國的懷抱，但回歸的喜悅並未持續太久，隨著國民政府接收工作進行，臺灣人從與祖國的互動中，臺灣人逐漸意識到與祖國間的距離，已非昔日想像中的親密。隨著國民政府對台的不當政策，衝突已成無法避免的結果，在暴力與高壓的統治下，臺灣儼然又面臨另一次殖民統治的開始，臺灣並未隨著政權的更迭，擺脫被殖民的夢魘。

而許多走過這段歷史的臺灣人，更難以遺忘這段歷史帶來的傷痛。葉石濤則曾對終戰後的第一代作家¹有這樣的評論：「屬於第一代的作家，從初生到成熟的階段裡，身心受到日本殖民者直接的壓迫和摧殘，而且太平洋戰爭的慘酷體驗使他們多多少少留下戰爭後遺症。這固然有效於磨練他們堅強的抵抗意識，不過也傷害了他們心理層面的正常發展。」²而不僅臺

¹ 所謂的戰後第一代作家，指的是從小接受日本教育長大，戰後才開始學習中文。其成長的年代，也是白色恐怖最嚴重、最恐怖的年代開始。參閱鍾肇政：《臺灣文學十講》，台北：前衛，2000，頁 260。

² 葉石濤，《臺灣鄉土作家論集》，台北：遠景，1979，頁 153-154。

灣人在殖民統治下，烙下無法磨滅的傷害，臺灣文學的發展，也在殖民體制下備受壓抑。從日治末期的「文學奉公」到終戰後的「反共抗俄文藝」，臺灣文學在佈滿荊棘的環境中飽受壓抑與摧殘。終戰後，在主政者高倡戰鬥文藝的使命下，臺灣作家又經歷了白色恐怖的威脅，戰後的臺灣文學顯得更為沈寂。在外來的殖民政權之下，「臺灣文學」變成了它者的支流文學與邊疆文學。³日治時代，臺灣作家以文學的形式，傳達對日本殖民統治的抗議，也成了貫穿日治時代臺灣新文學創作的突出主題，表現出尖銳的抗議精神。1950年代才投入文學創作的鍾肇政，則以史詩的寫作方式，重新見證臺灣人在日本殖民時代的悲愴、抗爭、徬徨、自覺的血淚辛酸史，也延續了日治時代文學的反抗精神。林瑞明在《臺灣文學的歷史考察》中就曾提到：

文學常是時代的反映，在歷史的變化過程中，文學的變化亦有其複雜的過程，有些是內在對於舊有形式的不滿和求新求變的創作慾望所促成，有些則緣於外在的因素，因社會、政治或文化的變動而跟著變化。⁴

古繼堂在《臺灣小說發展史》中，也提出相同的看法：

臺灣的新文學，臺灣的小說，就是在這種由武裝抗日轉入非武裝抗日，在政治、文化抗日日趨高漲的形勢下，在歷史和時代的呼喚聲中，在人民和土地的渴盼和期望中，作為人民的心聲，時代的寵兒，在歷史的大潮中誕生了。因而從它誕生的那一天起，便承載著神聖而偉大的歷史和文學使命。⁵

從《濁流三部曲》開始，鍾肇政開啓了「大河小說」先河，而《臺灣人三部曲》的完成，更具有劃時代的意義。橫跨日本殖民五十年的時間軸，他

³ 周慶華：《臺灣文學與「臺灣文學」》，台北：生智，1997，頁 37。

⁴ 林瑞明，《臺灣文學的歷史考察》，台北：允晨，1996，頁 3。

⁵ 古繼堂，《臺灣小說發展史》，台北：文史哲，1992，頁 19。

試圖重現臺灣人在日治時代的抵抗精神，形塑臺灣人的新形象。

儘管臺灣光復後，政治環境的轉變，並未帶來開放、自由的創作環境，反而因白色恐怖而壓抑了臺灣作家的創作。鍾肇政卻仍在這樣惡劣的環境中，致力於文學的創作，因此筆者好奇的是這樣一位在臺灣文學領域裡默默耕耘的作家，如何在國民黨主政的高壓政權下，以文學的筆觸，對抗頑強的統治者對思想的迫害？因此筆者以戰後第一代作家之一的鍾肇政的作品為研究主題，企圖從他的文學創作中，發現其反殖民意識的呈現形式及其意義。

鍾肇政——一個經歷二十年殖民經驗、接受日文教育、從終戰後才開始學習祖國語文的作家。他曾這麼說過：「我是在戰爭時期，由少年而青少年而成年的，故最熟悉那個時代的殺伐之風，與日本人的虛無暴躁兇惡，以及裸露的民族仇恨。」⁶葉石濤在〈臺灣鄉土文學中的現實主義道路〉中曾提到：

構成作家意識的重要因素之中，累積下來的民族的反帝、反封建的歷史經驗，將佔有一方廣大的領域。民族的抗爭經驗猶如那遺傳基因，鑲刻在每一個作家的腦細胞裡，左右了他的創造性活動臺灣作家這種堅強的現實意識，參與抵抗運動的精神，形成臺灣鄉土文學的傳統，而他們的文學必定是有民族風格的寫實文學。⁷

在鍾肇政的作品中，普遍存在這種寫實的寫作特質，創作素材，多源於其曾經歷的真實體驗。因此以日治時代為背景的小說，鍾肇政寫來，自然是入木三分，格外深刻。古繼堂就認為鍾肇政可視為臺灣光復後新一代臺灣鄉土作家的卓越代表，他的創作也在臺灣的文壇異軍突起。⁸其作品之豐，

⁶ 鍾肇政，《鍾肇政回憶錄（一）》，台北：前衛出版社，1998，頁 207。

⁷ 葉石濤，《臺灣鄉土作家論集》，台北：遠景出版社，1979，頁 9。

⁸ 古繼堂，《臺灣小說發展史》，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2，頁 204。

涉及生活畫面之廣，表達的主題之深邃，描繪的人物之眾，均不是在一篇文章中和一部小說史的一個章節中所能論述得了的。⁹而在鍾肇政為數眾多的作品中，以大河小說¹⁰最為人所關注。其中《臺灣人三部曲》¹¹，更是其寫作生涯中的重要作品之一，他自己曾說道：

這部《臺灣人三部曲》，幾乎是我開始走上文學這條路的時候就想要寫的，儘管起初還只是個模糊概念。當我從事學習寫作屆滿十年的時候，這模糊的概念方才漸趨具體，但也仍然只是一個輪廓而已……又過了三年，民國五十三年，我終於有了勇氣著手寫第一部了。並不是我自認能夠勝任，祇是我再也按捺不住寫它的衝動了。¹²

這部以日本據台五十年為背景，人物涵括了家族的三代，藉由家族的變遷，反應時代的脈動，剖析臺灣人在日治時期不同歷史階段的遭遇和抗爭精神。

《怒濤》延續《臺灣人三部曲》的歷史敘事的方式，因此被常視為《臺灣人三部曲》的續曲。作者企圖將以前視為禁忌的「二二八事件」表達出來，為戰後的臺灣初期社會歷史做見證。從這兩部作品中，不難看出作者以文學寫史的企圖心。文學與歷史兩者的關係常是密不可分，透過文學的形式，歷史不再是平鋪直述而顯得刻板僵化的敘述，而成了真實以外的動人的紀錄，《臺灣人三部曲》是鍾肇政以歷史上真實發生的事件為背景而寫成的大作，這也有助於讀者瞭解日本殖民時代臺灣的歷史脈絡的發展與時代的動向。

⁹ 古繼堂，《臺灣小說發展史》，台北：文史哲，1992，頁 204。

¹⁰ 大河小說(Roman-fleuve)，Roman 意指小說，fleuve 則是流向大海奔流的河，Roman-fleuve 最早在法文中是用來形容長度滔滔不絕的故事。參閱楊照：〈歷史大河中的悲情——論臺灣的「大河小說」〉，《文學、社會與歷史想像——戰後文學史散論》，頁 94，台北：聯合文學，1995 年 10 月。

¹¹ 包括《沉淪》、《滄溟行》、《插天山之歌》三部作品。

¹² 鍾肇政：《沉淪》，台北：蘭開，1968，頁 1-2。

從《臺灣人三部曲》到《怒濤》，都能感受到鍾肇政透過書中人物傳遞出對統治者爲了自身實質的利益，包裹著美麗糖衣的統治政策及口號下，實則是對臺灣人的歧視，企圖改造臺灣人成爲創造統治者利益的順民，及行經濟壓榨之實。但臺灣人在日本殖民下的悲慘境遇，卻未隨終戰劃下句點，鍾肇政在〈血淚的文學、掙扎的文學——七十年臺灣文學發展縱橫談〉中，就曾提到他的想法：

隨著不同統治者不同的統治，歷史上每一個不同階段，雖然也都有過不同的社會樣相與居民的不同情狀，而統治者之剝削欺凌則始終如一。七十年臺灣文學發展軌跡，時間上雖然不算多麼長，展現出來的自然也不外是被迫虐被欺凌者的心靈呼喊之連續。¹³

因此本論文欲透過《臺灣人三部曲》、《怒濤》這兩部在時間縱軸上延續的作品，來討論作者如何透過虛構的人物、情節的安排，與真實歷史場景的鋪陳，刻畫臺灣人在日本殖民與國民政府統治的歷史經驗下，所呈現出不同時期的臺灣人形象與抗爭的精神。即使身處卑微的處境，臺灣人爲了生存與尊嚴，在必然慘敗的命運下，如何表達不同階段的抵抗精神，也逐漸形成臺灣人意識的軌跡。

質言之，本論文筆者所欲探討與研究的問題，包括：

1. 在不同殖民政策下，臺灣人從武裝抗日到非武力抗爭的轉變過程，鍾肇政透過《臺灣人三部曲》、《怒濤》如何呈現不同層次的抵抗精神？
2. 鍾肇政的《臺灣人三部曲》、《怒濤》中所欲呈現的反殖民意識爲何？其中是否存在著異同？
3. 反殖民意識在鍾肇政創作作品中的真實意涵爲何？

¹³ 鍾肇政，《鍾肇政回憶錄（一）》，台北：前衛，1998，頁 256。

第二節 研究材料、方法與限制

一、研究材料

鍾肇政先生著作甚多，其中所選取寫作背景，多源於其二十一歲（1945年）前日本殖民體制下的生活經驗。不同於《濁流三部曲》偏於自傳性小說，流露出較強的主觀性，且著重於對個人經驗中的瑣事的描繪，在歷史背景上也只侷限於終戰前的幾年，對瞭解整個日本殖民時代顯得太過薄弱。《臺灣人三部曲》、《怒濤》兩部作品，雖然許多人評論仍不脫自傳的味道，但筆者認為與其他作品相較之下，在故事內容的選擇、安排及人物的設計上，較為客觀且更能凸顯時代及歷史意義。

《臺灣人三部曲》的背景，將視界拉大到乙未割台到太平洋戰爭結束，長達五十年的日本殖民時代，正好涵蓋了臺灣人抗日的三個階段，從武力抗日、文化抗日，到皇民化運動。這樣的背景安排，正好符合了「大河小說」的概念，故事的背景含有濃厚的歷史意味，故事發生的背景也設定在某個變動劇烈的歷史大時代。而其敘述也以一個家族或一個主角為中心主軸，以其經驗來鋪陳、凸顯過去的社會風貌。其敘事方式，如同大河般，綿延不斷，好像可以和時間永續不斷一樣，一路講下去。

《臺灣人三部曲》的第一部《沉淪》描寫割台之初，臺灣北部客家族群陸家，在面臨清朝割台的變局下，陸家子弟奮起投入義勇軍行列，抵抗日軍的慘烈景況與英勇的行爲；第二部《滄溟行》則以中壢事件為背景，描寫主人翁陸維樑在經歷心智的啓蒙後，在文化協會成員的指導下，協助農民抵抗會社剝削的過程；第三部《插天山之歌》，以太平洋戰爭時期為背景，描述日本政府的特務對知識份子的嚴密監控，也反應當代在戰時體

制下，臺灣人民在物質與精神上面臨的雙重困境。

《怒濤》則延續《臺灣人三部曲》的時間軸，在臺灣光復的時間點上，一面批判來自祖國的新統治階級的醜陋面貌，一面描寫臺灣人再度淪為被殖民的苦難，最終官逼民反，而釀成「二二八事件」的歷史悲劇。在政治的解嚴後，鍾肇政企圖重建戰後初期「二二八事件」的歷史記憶，反抗的對象從日本轉為稱臺灣人認為是「同胞」的國民政府，時空也彷彿重回到乙未割台時，農民揭竿起義對抗異族的情境。筆者企圖於這兩部作品中，剖析隨著時空的轉換，一個經歷三個不同政治環境的文學創作者—鍾肇政，如何透過其作品，形塑的臺灣人形象及對統治者傳達的反抗意識。

二、研究方法：

本論文主要聚焦於研究鍾肇政這兩部文學作品中，內蘊的反殖民意識及政治現實對文學創作的影響。以傳統的文學研究方法論之，乃屬於作品主題的研究，因此本研究主要以歷史研究法中的文本分析為基礎，也嘗試從歷史—社會面向，探索鍾肇政《臺灣人三部曲》、《怒濤》這兩部作品中呈現的反殖民意識的其意義與價值。

本論文擬一方面將所蒐集的相關文獻，進行歸納、分析，找出解釋的脈絡與線索。並從小說中的人物、象徵、比喻、情節等的鋪陳及運用，著手探究反殖民意識這個主題。另一方面透過小說形成的歷史脈絡分析，呈現在歷史進程中，作家面對政治現實時，其價值理念對文學作品的影響。

三、研究限制

本論文著重於對鍾肇政作品中隱含的反殖民意識作為探討主軸，雖然作家在從事文學創作時，常將個人的意識型態或隱或現的呈現在作品中，但讀者在閱讀的過程中，對文本的解讀，也可能偏離作者的創作意識。

文學作品的創作過程中，對小說人物心理的呈現，是否能完全符合作者當下的創作意識，牽扯到心理學的層面，而這個面向的複雜性，使得筆者在剖析作品上，產生相當程度的困難性，因此筆者盡量輔以吸收當代的歷史背景及多方的論點，擷取最為客觀的論述幫助評析。

第三節 文獻探討

在臺灣的鄉土文學史上，鍾肇政可說是幾個重要人物之一，特別是他開了臺灣文學史上大河小說寫作的先河。他的作品中充滿強悍的生命力，特別在他的大河小說作品裡，看到的正是這種磅礴的生命力具體的形象化。¹⁴筆者在蒐集資料的過程中，發現在鍾肇政的文學創作生涯中，其作品之豐，已不是著作等身可比擬。從中也不難看出鍾肇政在臺灣文學史上佔著重要的地位，迄今為止，以鍾肇政作品相關的碩士學位論文，計有八篇。以下將一一的分析、整理於下文中。

民國八十二年王淑雯撰：《大河小說與族群認同：以臺灣人三部曲、寒夜三部曲、浪淘沙為焦點的分析》是最早出現有關鍾肇政作品的學位論文論述，主要聚焦在三部大河小說的作品主題與族群認同作為分析焦點，試圖探究透過小說文本，作者所欲建構的歷史圖像，以及臺灣終戰後社會變遷與族群認同可能產生的互動。而以鍾肇政為研究主軸的學位論文，最早的一篇是民國八十二年黃靖雅撰：《鍾肇政小說研究》，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以鍾肇政的作品為中心進行探討，從歷史素材、作家的個人經驗及原住民文學三大方向作為作品研究的主軸。但由於鍾肇政的作品包含長短篇，為數甚多，因此難以對單一主題做重點式討論，在兼顧

¹⁴ 葉石濤：《臺灣鄉土作家論集》，台北：遠景，1979，頁 154。

廣度與深度上的析論上較難做權衡。對以歷史素材為主的小說，如本篇欲探討的《臺灣人三部曲》、《怒濤》兩部作品則較缺乏對當代歷史背景以及作者透過作品創作意識的表現。此外，民國八十四年張謙繼撰：《鍾肇政臺灣人三部曲研究》，研究者則對本書做較偏向文學創作與技巧的討論，研究重點包括成書始末、小說類型、主題探討、寫作技巧、人物分析等進行研究探討，從作家的角度重新檢視日本殖民時代的歷史，以及作者如何透過反應當代臺灣人的生活，呈現其意識型態。在本論文中，對確立《臺灣人三部曲》在臺灣文學「大河小說」的發展史上的重要性，有深刻的論述。而本論文則在討論鍾肇政是否透過歷史事件的描繪及書中角色人物的安排，傳達作者本身的意識型態對作品的影響方面，對筆者在揣摩書中人物象徵意象方面，有極大的助益。但本論文在其論述中，未能與鍾肇政的生平背景與創作時代做一結合分析，著重於情節及人物形象的分析，在全面關照上似乎略顯不足。與黃靖雅雷同的是對部分歷史的詮釋，特別是在文本歷史背景的討論上較為不足，因此顯得不夠深入，這也是筆者在進行本篇論文時，試圖避免的。

另外，民國八十九年林明孝撰：《鍾肇政長篇自傳性小說研究》，則以探討作家與文本的關係為主軸，申論時代環境對一位作家，及其建構作品的影響，偏重於探討鍾肇政文學思想的形塑過程，及其自傳性作品對作者個人與社會產生的意義。透過書中主人翁，重新見證在時代的變動下，臺灣人民的悲喜、矛盾、掙扎與苦悶，也反應終戰前後台灣社會的樣貌，及充分表現了一位知識青年對成長中自我的追尋。林明孝以主人翁陸志龍為主要的研究重點，有助於筆者瞭解鍾肇政在其經歷殖民統治的時期，對社會及自我內心世界心理歷程轉變的瞭解。接著，民國九十年郭秀理撰：

《論鍾肇政的魯冰花》，也以論述作家與作品的關係、故事背景、結構、基調、人物刻畫及形象、主題等為主，偏於純粹對作品的賞析。由於這部作品的歷史背景與本論文並無相關之處，因此對筆者的研究主題，並無太大助益。民國九十二年林美華撰：《鍾肇政大河小說中的殖民地經驗》，則從鍾肇政的三部大河小說文本中探討終戰前，臺灣人被日本人統治的殖民地經驗，分別從認同的面向、日臺情愛、抵抗層面以及皇民化運動去探討殖民體制下的社會現象，對當時臺灣人的心理層面也有深一層的剖析，其中對抗日精神的轉化歷程，提供了筆者釐清鍾肇政大河小說中，抵抗型態的轉變有很大的幫助；同年，郭慧華撰：《鍾肇政小說中的原住民圖像書寫》，則以鍾肇政作品中，與原住民相關的內容，主要在探討鍾肇政筆下原住民圖像所呈現的思想內容，以及鍾肇政所創造出的原住民典型，從書寫中重述原住民的歷史與傳統信念，也分析鍾肇政以一位客籍作家撰寫原住民文學，其作品定位。民國九十三年曾盛甲撰：《鍾肇政小說鄉土情懷之研究——以《大壩》與《大圳》為例》，則意欲凸顯鍾肇政小說文本中鮮明質樸的鄉土情懷，及作者對臺灣這塊鄉土無怨無悔地墾拓與奉獻，其中對鄉土意識的探討，對筆者觀察鍾肇政從土地衍生的情感，對其反殖民意識的形成的因果關係，有很大的幫助。

除學位論文外，筆者在國家圖書館「當代文學史料影像全文系統」裡，找到有關鍾肇政的評論資料共有一百一十四篇、傳記文獻共有七十一筆。除此之外，收錄於各論文集、評論的專書、小說史……的篇章亦不少，都是筆者不可忽視的珍貴資料。

從1987年解嚴以來，臺灣社會發展漸趨多元化，政治、經濟、社會、文化都處於激烈轉型之中，對臺灣歷史不同的解讀，也使現今的臺灣人產

生分化與不安。而這些分歧的觀念大多有其過去的歷史根源，對歷史的錯解與應用，更造成歧見的加深。加上臺灣四百多年來，以獨特的地理位置，使其在歷史進程中，曾面對多個不同外來政權的殖民統治，這也使得臺灣的族群關係及國家意識，顯得更為複雜，卻也是臺灣人應該深刻思考的課題。

臺灣經歷了長達五十年的日本殖民統治，在日本殖民政府對臺灣人的壓迫下，使臺灣人漸漸凝聚對日本人的仇恨，將本島人的共同意識鞏固起來。當時，不論是福佬人、客家人，還是原住民，在共同的殖民統治及太平洋戰爭經驗下，對日本統治階級而言，都屬於本島人。特別是所謂戰後第一代的作家，如鍾肇政之屬，經歷了日本的殖民統治，再到國民政府的高壓極權統治下，感受更為深刻，對作家本身國家意識的形成，也有深遠的影響。一個背負歷史使命並有負有社會責任的文學創作者，不可能在經歷這樣的歷史變局與壓迫下，對執政者做完全的妥協。因此透過《臺灣人三部曲》、《怒濤》這兩部小說，筆者企圖藉由對鍾肇政文本的研究，由反殖民意識出發，重新檢視臺灣意識的真正意涵。

由於前述幾篇學位論文的選材，都是鍾肇政以日治時期為背景的創作，但其中對這段臺灣被苦悶、備受壓榨、欺凌的時代，臺灣人心理意識的反映與轉變，卻未見深入的研究與討論。本論文欲繼前人未竟之功，以鍾肇政七〇、九〇年代完成的《臺灣人三部曲》、《怒濤》為研究範疇，一則以探索臺灣在政治、社會的變遷下，知識份子的心理意識轉變，二則以鍾肇政的創作背景，與作品的背景做一時空的參照，探討在兩者間，作者如何透過人物、角色性格的鋪排，透露反殖民意識的真實意涵，也期使延續前人對鍾肇政作品的研究，使其更深入完整。

第二章 鍾肇政的生活經驗與文學創作背景

第一節 鍾肇政的生平簡介

一、求學階段

1925年出生於桃園縣龍潭鄉九座寮的鍾肇政，在家排行老么，且為家中獨子。父親原為一教員，隨著父親職業的異動，曾遷居臺北，因此鍾肇政也會講福佬話。在台北市公學校就讀時，開始學日文，後遷居桃園，就讀龍潭公學校，從頭開始學習客家話。

1938年入私立淡江中學就讀，寄宿校舍。這段期間，由於日本展開對華侵略，世界各國陸續投入戰局，局勢日益緊張。鍾肇政就在這樣的變局中，度過了中學生涯，當時為了因應日本的對外戰爭，日本當局較前期更積極的推動在臺灣的皇民化運動，使臺灣人進入完全日文化的環境中，從聽、說、讀、寫，乃至思考方式，皆成為日文模式，成為一個完全順服的「皇民」。青年時期的鍾肇政，就在日人階級嚴明及絕對服從的體制下，慢慢體認到日臺間無法跨越種族差異的宿命。

中學五年級，為掩護班上多位吸煙的同學，而遭到校方「無期停學」的嚴厲處分，在操行與名次皆不理想的情形下，升學之途頓遭拒絕。¹⁵同年，遭受日人舍監高橋無理失態的恣意毆打，甚至強硬塞予小刀要求決鬥。¹⁶受此二事的影響，鍾肇政對人生開始苦思探索，遂對自身之前途，對被異族殖民之處境，對民族家園之認知逐漸清晰。這一年，日本政府也實施臺灣陸軍志願兵制度，突然戰爭、死亡都變成了切身相關的事。在學校的強迫下，鍾肇政雖也繳交了志願書，不過在每次體格檢查時，都得想

¹⁵ 鍾肇政：《鍾肇政回憶錄(一)》，台北：前衛，1998，頁 65-66。

¹⁶ 鍾肇政：《鍾肇政回憶錄(一)》，台北：前衛，1998，頁 67-68。

辦法讓自己通不過。¹⁷

1943年從淡水中學畢業的鍾肇政，報考上級學校，但未獲錄取。因此在父親的推薦下，任大溪宮前國民學校的助教；這段期間的經歷，也成了《濁流三部曲》的主要寫作背景，因此這部小說也被視為是鍾肇政自傳性的小說。擔任助教的這段時期，鍾肇政一直生活在逃避志願兵的內心折磨裡，終於在1944年考上「臺灣總督府彰化青年學校」，成為第一屆的青年師範學生，也暫時擺脫了志願兵的壓力。因此鍾肇政辭教職，進入彰化青年師範學校就讀。

二、學徒兵時期

1945年，青年師範學校畢業，還來不及前往台中州沙山青年學校到任的鍾肇政，終究逃不過1944年頒佈的徵兵役，1945年自彰化青年師範學校畢業的鍾肇政，即因「學徒動員令」被徵為學徒兵，成了帝國陸軍二等兵，被派駐紮在海線大甲，擔任海防的工作。同年，由日本軍閥發動之東亞戰爭已近末日，戰事不利於日本之消息，隱隱在空氣中散漫，緊張氣氛日益升高，日人對臺人之暴虐行徑，以及強行植入的日本文化，引起臺人更形尖銳的心理反抗。而比起求學時期遭遇的不公平待遇及屈辱，軍隊裡的生活更是對精神、肉體更加倍的折磨。在他的回憶中：

盟軍轟炸越來越熾烈，隨時都有炸彈從天而降的可能，死亡就在鄰近的身邊。日人同學又仗其人多勢眾，對我們這些「少數民族」欺凌迫虐，無所不用其極。……這兒無法詳細戰時臺灣同胞所遭受的種種苦楚，總之，精神、肉體方面，我們都處在極端的痛苦中。¹⁸

¹⁷ 黃秋芳：《鍾肇政的臺灣塑像》，台北：時報文化，2000，頁40。

¹⁸ 鍾肇政：《鍾肇政回憶錄(一)》，台北：前衛，1998，頁176。

甚至同學都想，如果美軍登陸了，他們準備先把日本人幹掉，再跑進山裡頭，或者，能夠的話，跟美軍合作，所以一空下來，大家就偷偷研究逃跑的路線。¹⁹每天生活在這種飽受欺凌、歧視的環境中，也無形凝聚了同袍間的情誼。

在這段時間，鍾肇政，也因患熱帶瘧疾，在天天發燒的病況下，不得不仰賴「金雞霜」治療，而導致聽覺嚴重受到損害，至今一直帶著助聽器。²⁰而這無意使自認缺乏自信、又畏縮的鍾肇政，更遠離人群，也因此開啓了其寫作契機，藉由文字抒發其內心的悲苦，走進屬於自己的文學世界裡。

三、沉潛書中世界

從小學四、五年級開始，鍾肇政就開始接觸許多刊物，如《少年俱樂部》、《譚海》、《少女俱樂部》、《新青年》等，到了中學，閱讀的範圍比較寬廣，偶爾也看一些翻譯的作品。²¹就讀彰化青年師範學校時，結識了好友沈英凱，他是引領鍾肇政進入了世界文學名著的殿堂的重要人物。閱讀不再只是一種純粹的興趣，鍾肇政開始對作品有了深度的思考，閱讀有了不同的趣味，因此鍾肇政此時方覺對文學「開眼」。²²

與沈英凱交往的時間，也可說是鍾肇政閱讀最為豐碩的時期。根據他自己的描述，當時正值大戰期間，天天都會有空襲警報，在課堂上，教授的話他們是一句也不聽的，只要可以瞞過他們眼睛，他們便沒入書中。待警報響起，鍾肇政便躲進自己挖的防空壕，而這正提供了讀書很好的時間。即便晚上有「燈火管制」，他還是會利用夜間輪值守夜的時間閱讀。因此求學這段時間，鍾肇政沉溺在文字的世界裡，雖無法讓鍾肇政的學業

¹⁹ 黃秋芳：《鍾肇政的臺灣塑像》，台北：時報文化，2000，頁 53。

²⁰ 鍾肇政：《鍾肇政回憶錄(一)》，台北：前衛，1998，頁 178。

²¹ 黃秋芳：《鍾肇政的臺灣塑像》，台北：時報文化，2000，頁 22。

²² 鍾肇政：《鍾肇政回憶錄(一)》，台北：前衛，1998，頁 175。

有突出的表現，甚至還在兩次公立學校的考試中落榜，不過卻讓他在精神上找到了另一片得以沉靜思緒空間，也為將來的寫作之路打了根基。

四、跨越語言的障礙，踏上寫作之路

1945年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後，不久鍾肇政即前往沙山青年學校任教，但因病，旋即又回到家鄉。回鄉後的這段時間他努力學習中文。好學不倦的鍾肇政，於1948年考上台大中文系，但因耳疾，聽不清老師授課內容，不得不休學，回到家鄉的龍潭國民小學任職，從此展開了三十年的教師生涯。面對著臺灣光復後的「祖國」熱，時下青年對祖國滿腔的憧憬與期望，鍾肇政不得不如同兒時用客家話推翻福老話一樣，再一次面對一場自己的「內在革命」，用中國語文「革」了日文的命。²³

在獨力學習中文的過程中，鍾肇政從完全滿腦子的日文語彙、日文思考挑戰看似熟悉卻陌生的中文，其中經歷是特別的狀況。在他的回憶中，當他開始想要用中文來表達時，第一個採取的步驟就是翻譯。²⁴此後，鍾肇政就在這種日文思考、日文寫作，再用中文翻譯的狀況下，開始了寫作之路。

鍾肇政利用寒暑假，從事創作與翻譯。1951年發表第一篇文章〈婚後〉，之後，不論是長、中、短篇的小說創作，或譯、編的文學作品，其作品之多，已不是著作等身可形容了。尤其，鍾肇政在長篇小說特別擅長，具代表性的作品，如《魯冰花》、《濁流三部曲》、《臺灣人三部曲》紛紛於六〇、七〇年代完成。因此這二十年間，鍾肇政自稱這是他文學生涯中的黃金時代。

25

²³ 黃秋芳：《鍾肇政的臺灣塑像》，台北：時報文化，2000，頁 55。

²⁴ 鍾肇政：《臺灣文學十講》，台北：前衛，2000，頁 63。

²⁵ 鍾肇政：《濁流三部曲》後記，台北：遠景，2005，頁 1124。

除了文學的創作，鍾肇政對提携後進也不遺餘力，從編印《文友通訊》，到參與《臺灣文藝》的創辦，與推動「臺灣文學獎」的成立，都可看出鍾肇政在臺灣文學這塊領域上無悔的執著。

五、對臺灣文學的耕耘

鍾肇政除了在文學創作上的成績，不容忽視外，他在臺灣文學中所奉獻的心力更可稱得上鞠躬盡瘁。從1957年開辦《文友通訊》開始，鍾肇政不只幫自己開了一扇寫作之窗，也讓當代其他有志寫作的人有了切磋砥礪、相互支持的管道。從作品的輪閱、評論，讓參與通訊的這批作家，如陳火泉、廖清秀、施翠峰、李榮春、許炳成（文心）、鍾理和等能藉由彼此的切磋琢磨，提升寫作的技巧。而鍾肇政擔起這個橋樑的角色，由他統籌規劃，將作品的評論或文友動態登載在《文友通訊》，雖然只有短短的十六期，但不僅鼓勵了這些作家的創作，也聯繫起這些作家的情誼。在面對戰後「反共」文學佔領了臺灣文學的領導地位以及「白色恐怖」的陰影下，戰後的臺灣作家，幾乎成了噤聲的狀態，《文友通訊》剛好提供了一個讓臺灣作家創作與交流的平台，其最大的意義便是給臺灣文學歷史，補上「五十年代」一大段空白與缺縫。²⁶

1965年，鍾肇政利用「臺灣光復」二十週年的名義，為臺灣作家編了兩套書，分別是《本省籍作家作品選集》、《臺灣省青年文學叢書》各十本。此舉，也是他協助本土作家走入文壇的方法。1964年，吳濁流創辦《臺灣文藝》這份雜誌，鍾肇政也參與了編務的工作。

1976年，吳濁流過世後，鍾肇政也在「大家合力來承擔的許諾下，勉

²⁶ 應鳳凰：〈勤寫譯、多參賽、砥礪文友——鍾肇政與五〇年代臺灣文學運動〉，頁144。《聯合文學》，230期，2003，12月。

爲其難地接下了這份重責。」²⁷接手擔任《臺灣文藝》的編輯工作。1978年又接下《民眾日報》副刊部主任兼《民眾副刊》主編的工作。鍾肇政在這兩片園地上致力培養更年輕一代的作家。²⁸因此張良澤曾歸納鍾肇政七〇年代受的三大煎熬：一、爲《臺灣文藝》之存續而奔波。二、爲「窮」而賣命。三、爲忠實與「文學」掙扎。²⁹也可見鍾肇政對臺灣文學的盡心盡力。

九〇年代的鍾肇政，在前衛出版社林文欽支持下，結合了張恆豪、彭瑞金、林瑞明、陳萬益、施淑、高天生等人，集體編輯了《臺灣作家全集》五十冊，也完成了他爲臺灣作家盡一份心力的多年心願。³⁰由此可見，從鍾肇政投入文學這個領域後，不僅在自己的創作上堅持努力，更致力爲臺灣文學這塊領域盡己所能，默默地耕耘著。

第二節 鍾肇政的創作意識與時代感觸

1950年代的臺灣政治環境可說是動盪不安、風雨飄搖的景況，1949年國民黨對共產黨戰爭的失利，被迫從大陸遷台。因此五〇年代的臺灣，就在國民黨主導的反共氛圍，以及政府頒佈以「戒嚴令」爲基礎的反共政策下，開啓了白色恐怖的統治階段。那是一種徹底的高壓統治，完完全全用武力剷除一切可能發生的反對力量，務求在短時期內，建立起絕對的控制權。³¹，鍾肇政就在這種高壓的氛圍及一舉一動都可能被泛政治化的現實環境中，踏上了文學創作之路。就如同葉石濤所言「作家是社會的一份

²⁷ 鍾肇政：《鍾肇政回憶錄(一)》，台北：前衛，1998，頁238。

²⁸ 葉石濤：《臺灣文學史綱》，高雄：文學界，1987，頁160。

²⁹ 張良澤：〈一九七〇年代的鍾老大——煎熬與希望的中年時代〉，頁148。《聯合文學》，230期，2003，12月。

³⁰ 鍾肇政：《鍾肇政回憶錄(一)》，台北：前衛，1988，頁293。

³¹ 焦桐：《臺灣戰後初期的戲劇》，台北：臺原，1990，頁53-54。

子，他的生活不能脫離社會，因此社會轉變會影響作家的思考形態。作家的意識形態必然指導他的創作活動，不管是寫浪漫的、幻想的作品，他的根源還是外在環境和歷史根源的變動，自然作品裡就少不了社會變動的軌跡。」³²。但在戒嚴體制下，一切可能造成反動言論的都被禁止，鍾肇政在對現實無能為力下，他的文學創作主題也只能走入歷史，描寫殖民經驗下的臺灣人百態。

一、鍾肇政的創作意識

雖然處在艱辛的文學創作時代，但1951年鍾肇政發表的第一篇以中文寫作的創作〈婚後〉，仍幸運的被刊登於《自由談》，這給了鍾肇政很大的激勵。但接下來的作品發表，並不算順遂，畢竟在政府的強力主導下，「戰鬥文藝」運動才是當時文學創作的主流。就在一面倒的「反共」與「戰鬥」作品充斥下，鍾肇政屢遭退稿的命運，就如同他說的，在那個時代他們這些臺灣作家「是不合時宜的」³³，那也寫反共文學嗎？

你要我反共，我怎麼反呢？我從來沒有看過共產黨長得什麼樣子。他們殺人如麻啦！等等，人家寫的我是看過一些，可是我沒有親眼看過，我怎麼寫呢？我要反共也反不起來啊！還有歌功頌德，你要我歌頌誰嗎？真的偉大的人物當然我也願意歌頌啊！可是我覺得也不見得啊！殺人如麻的呀，獨裁的呀，我歌頌不起來嘛！³⁴

不隨波逐流的他，慢慢在自己的經驗中尋找的寫作方向。直到以太平洋戰爭末期為背景，敘述學徒兵經歷的長篇小說《迎向黎明的人們》完稿後，他慢慢體悟到自己的文學生命應走的主題。他也曾這麼說道：「也是爲了這一部作品，我才首次抓到自己所應抓住的主題。那就是爲我所經歷的時代，留下一個見證。」³⁵這篇小說，後來也成爲《濁流三部曲》的其中一部。

³² 葉石濤：《臺灣文學的回顧》，台北：九歌，1983，頁200。

³³ 鍾肇政講述，莊紫容筆錄：《臺灣文學十講》台北：前衛，2000，頁71。

³⁴ 鍾肇政講述，莊紫容筆錄：《臺灣文學十講》台北：前衛，2000，頁71-72。

³⁵ 鍾肇政：《鍾肇政回憶錄(一)》，台北：前衛，1998，頁192。

但《濁流三部曲》只是鍾肇政創作過程中的重要片斷，直到構思《臺灣人三部曲》的過程中，他才覺得自己找到了「生命的主題」他曾這麼說道：

在我的生命裡，光復前我做了二十年「大日本帝國臣民」，光復後做了中華民國國民，也滿了二十年。可是，與日本是斷絕了，大陸卻始終在遙遠的地方，因此我一直都祇是臺灣人。那是不含任何政治意識的單純想法。於是我為我的下一部著作命名為《臺灣人》。也許這是個可笑的書名，但當我這麼決定的時候，我又開始輕顫了。整個構思的階段，我都會感到那種靈魂的顫慄。不管有沒有人覺得可笑，但我是嚴肅的，正經的。因為我要寫的是日治五十年間臺灣人的遭遇³⁶

即使當時1960年代，「反共」與「戰鬥」的主題引導臺灣文學主流的態勢下，鍾肇政仍堅持走出屬於自己的創作方向。將文學與歷史做結合，以史詩的創作方式，開創了文學的新頁，也成了臺灣文學中寫大河小說的先驅。

（一）對歷史的再詮釋

鍾肇政常被認為是寫抗日小說的作家，他自己也有「寫日治時代、寫有日本人的作品，委實太多的感覺。」³⁷但事實上，那段所謂「日本經驗」、「殖民地的傷痕」的生活，鍾肇政不但親身經歷了日本統治下的暴虐兇惡，也深刻感受過被殖民者的壓迫。因此當終戰後，跳脫了殖民者威脅的禁忌，更有足夠冷靜的心情來分析那個時代，寫來自然可入木三分。在五0到七0年代，自認被監視著且被政府列為黑名單的鍾肇政，在延續個人的寫作生命的考量下，將故事觸角探到日治時代，描寫一些反日抗日的內涵，在國民黨統治的時代，是比較受鼓勵的。³⁸

跨越了語言的障礙，使鍾肇政在五0年代國民黨強制性轉換語言的創作環境下，較其他本省籍作家更容易找到寫作的位置。儘管如此，戒嚴體制下的臺灣，並沒有自由創作的環境。而長達五十年的日本殖民時代，在

³⁶ 鍾肇政：《鍾肇政回憶錄(一)》，台北：前衛，1998，頁205。

³⁷ 鍾肇政：《鍾肇政回憶錄(一)》，台北：前衛，1998，頁207。

³⁸ 鍾肇政講述，莊紫容筆錄：《臺灣文學十講》，台北：前衛，2000，頁260。

統治者毫不留情的壓迫下，衝突是必然的發展。何欣曾這麼說過：「沒有衝突便沒有故事，衝突是故事的核心。」³⁹因此，以日本殖民經驗為主題的文學創作，成了戰後第一代作家的安全的選項之一，也符應了終戰後的文學創作環境，走入歷史的題材相對是較安全的。透過這類歷史背景的選擇，鍾肇政也引領自己重新思考這段歷史的傷痛。鍾肇政曾為了自己的選擇下了一個結論：「縱使厭惡，日治時代是事實，何況我自許的「生命主題」就是做一個歷史見證啊。」⁴⁰彭瑞金也曾做了類似的解讀：

鍾肇政以面對歷史的劫難出發，咀嚼苦難進而穿過整個族羣的現實、精神層面，……我們從文學史上可以發現有一類作家，只是虔誠地把自己的見聞呈現出來，像描摩人間風景的工筆畫家一樣，認真地記載一輩子的人生真實，也自然地呈現人間真相。這類作家通常都是透過創作找到自己，在實際創作運作中，完成自己心靈世界的規模，我們應該承認這種從創作中學習、體驗、成長的創作型態。鍾肇政、李喬是這種類型的作家。⁴¹

（二）濃厚的鄉土情懷

從鍾肇政的作品中，特別是長篇的小說，處處可見作者毫不隱藏對家鄉、土地的情感。在他的書裡曾寫過這句話「土地是最誠實的，你出了多少力量，他就回報你多少東西，絲毫不爽」⁴²彭瑞金也認為鍾肇政的作品中，鄉土實是他的作品中獨具而鮮明的色彩。⁴³以《臺灣人三部曲》及《怒濤》這兩部小說來看，在作品中呈現出幾點可觀察的面向：

1.特殊的語言形式。在他的作品中，常可看到鍾肇政自然地融合運用不同的語言在寫作上，除了中文、日文，也常見許多方言的詞彙，甚至是客家的山歌。這樣的表現方式，除了符合當時的語文環境，也讓讀者更貼近與

³⁹ 何欣：〈論鍾肇政〉，《當代臺灣作家論》，台北：東大圖書，1983，頁 70。

⁴⁰ 鍾肇政：《鍾肇政回憶錄(一)》，台北：前衛，1998，頁 208。

⁴¹ 彭瑞金：〈傳燈者—鍾肇政〉，《瞄準臺灣作家》，高雄：派色文化，1992，頁 72。

⁴² 鍾肇政：《濁流三部曲—流雲》，桃園：桃園縣立文化中心，2000，頁 831。

⁴³ 彭瑞金：〈論鍾肇政的鄉土風格〉，《泥土的香味》，台北：東大，1980，頁 40。

融入作品的意境中，使得他的作品讀來更為生動。

2.客家人的傳統精神。鍾肇政以陸家作為客家族群甚至是臺灣人的表徵，從日治時代到終戰後國府統治這段時期，臺灣人面對困境時一貫的抗爭與不妥協的硬頸精神，而在「晴耕雨讀」的家訓下，從土地獲得回報中，更能珍惜土地的對人民的付出。在漢文化的薰陶下，他們對祖國的意識也顯得更為強烈，因此面對異族的入侵，能毫不遲疑的投入抗日的武裝行列中。

3.典型的客家婦女。鍾肇政筆下的女性，大部分都具備勤勞、刻苦，既堅強又熱情有活力的特質，而且都是順從且願為家庭犧牲奉獻的好妻子。這些以大地之母的形象出現的女性，雖都出身微寒，但卻充滿原始生命力，在艱困環境中，仍堅毅果敢的坦然而活，他們能自然的融合於大地之中，並帶給周遭的親人、情人溫暖、堅定的力量，且具備無私奉獻的崇高精神，因此他們也成為書中主人翁最後的依歸，也代表對土地的依歸與認同。

4.山林之美的情境。在這兩部小說中，除了傳達抗日的精神外，鍾肇政所穿插的山林場景，他都嘗試用文字描繪出這片土地的自然美感，讓這些影像彷彿栩栩如生的呈現，讓讀者有置身其境的感受。即使如《插天山之歌》裡的陸志驤，雖然一直逃避著日本特務的追逐，在深山中過著戰戰兢兢的逃亡生活，但他也常被山林之美所吸引，不忘停駐下來，感受大自然的洗禮。

因此，筆者認為唯有對鄉土有著深厚情感的作家，才能如此大自然及土地的美好融入其作品當中，這片土地的美好，除了值得我們深深品味，更需要我們投入情感，好好的珍惜。透過這些作品的呈現，也看到鍾肇政試圖以客家人勤勞、刻苦、堅忍的傳統喚醒臺灣人在面對現實壓迫，應該堅持到底的意志。

（三）發揚臺灣精神

高麗敏曾在〈論鍾肇政作品《濁流三部曲》、《臺灣人三部曲》中的客家文風〉提到，鍾肇政作品的主要文學使命，就是發揚臺灣精神。⁴⁴筆者這裡定義的「臺灣精神」意指堅毅、不服輸，以及充滿戰鬥力的抵抗精神。不管是《臺灣人三部曲》的日本殖民時代，還是《怒濤》裡國府統治的時代，都可清楚的看出鍾肇政企圖塑造一種臺灣人形象，就是面對歷史的變局或遭逢艱困的環境，仍堅守自己的意念，剛毅不屈，奮戰到底的決心。

《沉淪》裡的陸家在面對臺灣淪為日本統治的變局，即使有憂慮、畏懼，最後整個家族，仍選擇挺身而出，組成義勇軍，誓死守護這塊土地。雖然《插天山之歌》曾被葉石濤評論為「缺乏強烈的抗爭的精神」⁴⁵，書中少了激烈的抗爭場面，但面對逼迫不妥協的精神仍在陸志驤身上顯現出來。從陸志驤逃亡過程中對身心的鍛鍊，就隱含臺灣人不服輸與充滿戰鬥力的反抗精神，也是作者透過創作展現在國民黨的壓迫下，個人深刻的反抗意識。

解嚴後才完成的《怒濤》，臺灣人的精神更是清晰的在主人翁身上流露。這種精神的象徵，呈現在國府接收臺灣後的歷史脈絡中，更顯獨特。在臺灣人經歷了外族殖民的歷史悲情與不斷的反抗歷程中，在與祖國的文化接續後，也得到重新省思與解放，幾百年來與外族的抵抗與文化融合下，臺灣人所磨練出的堅毅、不妥協與抗爭的意志，以及承襲自祖國卻也在歷史的變動下所產生的獨特臺灣文化，讓臺灣人在與祖國文化交接後，更清楚意識到與祖國的差異，臺灣人在長期受外族的壓抑下，心中的鬱悶與憤怒終在此時如滾滾怒濤宣洩而出。「二二八事件」雖是臺灣人心中不可抹滅的傷痛，但也象徵了臺灣人向祖國宣告強權、威勢的統治，不但無

⁴⁴ 高麗敏：〈論鍾肇政作品《濁流三部曲》、《臺灣人三部曲》中的客家文風〉，頁 96，《臺灣文學評論》，2003，3:1。

⁴⁵ 葉石濤發言，〈臺灣文學的里程碑—鍾肇政「臺灣人三部曲」對談記錄〉，林瑞明著《臺灣文學的本土觀察》，1996，頁 96，。

法得到臺灣人的認同，在不斷的壓迫、欺凌下，臺灣人仍會選擇奮起一搏的決心與意志。

二、鍾肇政對時代的感觸

所謂的戰後第一代作家，如鍾肇政等，這些人在青年成長的階段，不論就學或就業，都飽受殖民者不平等的待遇，更經歷了戰爭的殘酷、恐懼，忍受著戰爭帶來物質生活的匱乏。當戰爭終於結束，以為臺灣從此從苦難中解放，光明的新時代即將展開之際，原來竟是舊的夢魘，仍來不及散去，新的磨難又即將開始。

除了作者的親身經歷引領了創作的背景與方向的設定之外，面對當代政治現實及環境動向，更能引發創作者對時事的所感。何欣在論及現實世界對作家影響時，就認為現實世界是構成對作家思想及感情的一部份：

一位作家在創造其作品中的世界時，使用的材料當然仍是現實世界，而不是一個空中閣樓，他使用的材料既是現實的，那麼他個人的生活經驗無疑是重要的，他能夠寫出真實動人的世界，一般說來，是以他個人在其中生活的世界為藍本。因為他生活的世界中的一切是他所熟知的，不但是熟知的，他們也構成他的思想和感情的一部份。⁴⁶

在鍾肇政的《臺灣人三部曲》就隱藏了這樣的伏筆。

《臺灣人三部曲》全書完成於1976年，寫作時間跨越了六0、七0年代。雖以日治時代為寫作背景，反抗的強權為日本殖民政府。但國民政府頒佈戒嚴令之後，五0年代為了鞏固臺灣這個「反共基地」，整肅思想、清除社會中政治反對力量的情況下，大量逮捕、監控異議份子，也包括反對份子及其所認定的危險份子，此舉對當時文學創作自由產生極大的影響。許多作品動輒遭到檢查、刪改、查禁，甚至沒收，作家更是人人自危，

⁴⁶ 何欣：〈鄉土文學怎麼鄉土〉，《中國現代小說的主潮》，台北：遠景，1979，頁200。

稍不慎的話，甚至會因叛亂最被起訴。筆者認為這種的窘迫的年代，身為一個有時代使命的作家，鍾肇政真正想控訴的對象應該是以威權統治臺灣的政府，以日治時代為主題，在某種程度上正好指向當時的主政者。

在這樣的背景下，國民政府對傳播媒體及文學領域也採取嚴密的操控。因此國民政府雖未必對作家的創作活動有直接的干預行動，但在當時那種恐怖、極權、高壓的政治體制下，作家在被限制言論自由的情勢下，不得不採取自我防範的心態，因此「統治強權與外來殖民者」在鍾肇政內心深處所指向的，無疑就是使其寫作上經歷更大壓迫的，來自祖國的國民黨政權。臺灣人反抗的強權也就是另一個比日本人還兇惡的來自祖國的極權統治者。⁴⁷

1947年「二二八事件」發生後，五〇年代以後的臺灣，瀰漫在白色恐怖的陰影下，極權高壓統治型態不下於日本殖民時代。雖然在不熟悉的文化、語言下，作家對戰後臺灣社會變遷狀況的描寫更為怯步，也因此這段時期的文學創作幾乎呈現停滯的狀態。但具有思想及批判精神的作家，仍勇於挑戰。畢竟在目睹國民政府接收臺灣後，不僅無法讓戰後經濟蕭條的臺灣重新繁榮起來，更縱容接收人員、國軍的貪污腐敗，以及主政者的對臺灣各階層利益的剝削，才會導致「二二八」這個歷史悲劇的發生。鍾肇政在一片風聲鶴唳的環境下，面臨現實的窘迫與內心思想的煎熬，選擇走入「歷史」，做象徵性的批判，未嘗不是明哲保身的方法。

走過動盪不安的五〇年代，看似平靜的六〇年代，臺灣在經濟上，雖慢慢轉型到工業社會，但在政治環境上並未產生多大的改變。雖然在文學創作上，限制還是很多，但鍾肇政卻在這個時期起筆寫了《臺灣人三部曲》的第一部《沉淪》⁴⁸，當國民黨政權試圖要腳踏著臺灣土地的臺灣人忘記

⁴⁷ 錢鴻鈞：〈鍾肇政內心深處的文學魂——向強權統治的周旋與鬥爭〉，頁 258，《文學臺灣》，34 期，1990 年 4 月。

⁴⁸ 《臺灣人三部曲》的第一部《沉淪》，原名為《臺灣人》，起筆於 1967 年。當時《公論報》剛

臺灣時，鍾肇政卻用他的筆寫出了臺灣。

值得觀察的是《沉淪》之後，鍾肇政卻是跳過第二部，先著手寫第三部《插天山之歌》，這一點鍾肇政在鍾肇政鄉土小說討論會中，也做了這樣的解釋，當時李喬告知他，他被認為是台獨三巨頭之一，在這個白色恐怖的年代，聽起來是讓人害怕的，因此他決定寫一部長篇小說，並希望能在國民黨最重要的報紙《中央日報》上刊載，⁴⁹這部小說就是《插天山之歌》。因此李喬認為《插天山之歌》裡的陸志驤就是鍾肇政自己的投射，「時代背景是二次世界大戰末期很短的一段時間，故事的主角志驤，其實是作者的化身。……鍾肇政先生的《臺灣人三部曲》可以說是自敘傳，然後加以擴充……」⁵⁰

作家經過戰後二十年的調適，也累積了對新政權的瞭解，七〇年代國民黨在臺灣的政權已趨穩固，雖然在經濟上，已開始發展，人民漸趨富裕，但在政治上仍是保守的。即使有定期的地方選舉，但政治的主導權仍掌握在少數的外省籍菁英上，本省人在被剝奪參與政治的情緒下，仍存在被「外省人」統治的感覺。加上發展經濟，及以國防為優先的政策下，臺灣內部在社會上也潛藏了許多的問題。在外部的環境，則是中共取得中國在聯合國的代表權，並得到西方國家的承認，臺灣被迫退出聯合國。

從日治時代以來，知識份子一直以向西方學習，西化為走向現代化象徵，在這樣的迷思下，不論在文學、藝術，還是在經濟發展方向上，都可看到一面倒的模仿西方的現代主義。但在七〇內外交逼的情勢下，卻也迫

好復刊，同鍾肇政邀稿後，鍾肇政以這篇以臺灣人為名的小說刊登，卻在試刊第一天後，就遭到停刊，原因就是《臺灣人》這部連載小說要交由警備總部審查，作品也因此被扣留。後來因《臺灣日報》提供鍾肇政長篇連載的版面，他也就把這部要回的舊作改名《臺灣人三部曲第一部沉淪》，才順利刊登出來。參閱鍾肇政講述，莊紫容筆錄：《臺灣文學十講》，台北：前衛，2000，頁217-220。

⁴⁹ 彭瑞金：〈《插天山之歌》背後的臺灣小說書寫現象探索〉，陳萬益主編，《大河之歌—鍾肇政文學國際會議論文集》，桃園：桃園縣政府，2003，頁217。

⁵⁰ 彭瑞金：〈《插天山之歌》背後的臺灣小說書寫現象探索〉，陳萬益主編，《大河之歌—鍾肇政文學國際會議論文集》，桃園：桃園縣政府，2003，頁227。

使知識份子開始反思在一味外求的過程中，是不是應該迴向面對本土，重新找出本土傳統的價值，因此在文學上，鄉土文學的發展，這是一個很重要的表現。在這股潮流的引領下，「代表中國政治立場遭逢前所未有的挑戰，使臺灣作家針對戒嚴體制鬆動之際，開始投入鄉土文學，表達他們對這塊土地的關切。」⁵¹許多作家透過描寫殖民下的鄉土人物性格，表現農、工階級生活的困境。而鍾肇政的寫作風格也意外地搭上了這股潮流，《臺灣人三部曲》也是以農人爲背景的小說。

鄉土文學的潮流，也給了國民黨政權一個警訊。因此於1977年，由外省籍作家發動攻擊臺灣文學，而引發了「鄉土文學論戰」。雖然，最後在輿論壓力下，鄉土文學與反共文學取得了法定的地位。曾經在臺灣文學盡心盡力及提攜後進不遺餘力的鍾肇政，雖未曾加入論戰，卻仍被視爲在論戰背後的推手，也讓當局對他採取更嚴密的監控。但也因此讓他在這段時間，完成了許多代表性作品。從六〇年代到八〇年代，或許因爲現實的壓力下，也或許鍾肇政覺得太接近現實，而看不真切，更或許是對來自中國的統治者瞭解不夠深入，沒有足夠的冷靜與分析能力，鍾肇政雖未寫出正面的挑戰或對時事批判的作品，但如《插天山之歌》這類型作品，雖將筆觸指向歷史，表面上雖以對祖國懷念遙想來避禍，卻仍真實的表現出個人在面對壓迫的反抗意識。錢鴻鈞尤其有深一層的體悟：「……文學的創作是需要自由的環境的，爲了達成某種自由，只好逃入歷史，處理抗日題材與祖國意識的覺醒，已成爲某種包裝與保護。」⁵²

而異於《臺灣人三部曲》內斂、隱喻式的寫作風格，充滿批判性的、以二二八爲背景的《怒濤》則是九〇年代才出現的作品。1987年蔣經國宣

⁵¹ 陳芳明：〈臺灣文學史分期的一個檢討〉，頁 22，《臺灣文學發展現象—五十年來臺灣文學研討會論文集（二）》，台北：文訊，1996 年 6 月。

⁵² 錢鴻鈞：〈插天山之歌與臺灣靈魂的工程師〉，《戰後臺灣文學之窗—鍾肇政六百萬字書簡研究》，台北：文英堂，2002，頁 52。

佈解嚴，臺灣開啓了民主自由的另一篇章。九〇年代的臺灣，隨著政治的解嚴、社會開放，站在經歷了日本殖民統治到戰後祖國對臺灣同胞無情的對待的歷史洪流中，鍾肇政覺得臺灣人受到太多的委屈。二十年前先進吳濁流以《無花果》一書，首先試圖透過文字紀錄戰後臺灣歷史上重要的二二八事件，接著更以《臺灣連翹》⁵³補足二二八缺漏的部分，當時的鍾肇政心中早已泛起了漣漪。二十年後，鍾肇政終能擺脫心裡恐懼的陰影，著手記錄下這件歷史大事，而成《怒濤》一書。這本書的起筆，代表著為隱藏在心裡四十多年的痛，找到抒解的出口。他曾這麼說道「我是多麼希望能夠在筆下重現那個時代，以及那個時代的臺灣人，尤其年輕的一代……我明知在星移斗換之後，那個時代，那個時代的年輕人，他們的心情，他們的想法，這一代的人，尤其這一代的年輕人，究竟有幾個能理解呢？」

54

鍾肇政正因其對文學的堅持、對政治的敏感度，在這段艱困且暗潮洶湧的局勢下，不斷能持續的創作，在文學領域上功成身退，並在臺灣的文學史上留名。

第三節 承繼新文學運動的精神的文學創作

隨著西來庵事件⁵⁵的結束，臺灣對日本殖民的武裝抗日運動也劃下休止符，在日本對台的殖民統治也漸趨穩固，臺灣人民覺醒武力抗爭的窮途

⁵³ 《無花果》與《臺灣連翹》二書，都以日文寫成，吳濁流交由鍾肇政的翻譯成中文，而後印行。

⁵⁴ 鍾肇政：《怒濤》後記，台北：草根，1997，頁 400。

⁵⁵ 西來庵事件，又稱噍吧年事件，是臺胞大規模武力抗日的最後一次，由余清芳、江定、羅俊在台南的西來庵，集結群眾，宣導抗日，並以修廟為名，廣募捐款，準備舉事。其後余清芳被推為「大名慈悲國」大元帥，革命聲勢迅速壯大，後因事蹟洩漏，羅俊被捕下獄處死，余清芳乃倉促發難，自七月在臺南廳噍吧年（即今台南縣玉井鄉）與日人首次交鋒，迄次年五月江定所部被誘出降為止。結果余清芳等八百多人被判死刑。參閱柯惠珠著《日治初期臺灣地區武裝抗日運動之研究》，高雄：前程，1987，頁 263-275。

末路，因此改以政治、文化及文學作為抗爭的基本武器與手段，啓蒙群眾、揭露日本殖民統治的惡行。而當時的國際社會，正處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殖民地民族自決呼聲高漲之際，在這樣的時空背景下，臺灣的知識份子與留日學生在以文化啓蒙及民族解放運動的訴求下，成了文化抗日的先聲。

《臺灣青年》、《臺灣》、《臺灣民報》等啓蒙刊物的發行，不但提供了知識份子評論時政的平台，也成了文學論爭的戰場，⁵⁶因此刺激了臺灣新文學的發展。1920 年代，臺灣新文學就在民族運動的牽引下，與臺灣民族自救行動與反抗運動做了緊密的結合，這也成了臺灣新文學的重要性格。因此日治時期臺灣的新文學作家，如賴和、楊雲萍、張我軍、楊守愚、陳虛谷、郭秋生、葉榮鍾等，其作品多傾向對日帝統治下的臺灣封建社會進行抨擊，呈現的內容和主題包括揭露日本警察的兇暴和壓迫民眾的情形、殖民者、地主、和資本家對工農群眾的經濟剝削、舊禮教束縛下的家庭生活與婦女悲劇，以及封建地方勢力和御用身世對殖民當局的妥協。⁵⁷

1937 年受到中日戰爭的影響，總督府不但下令報刊禁用漢文，更禁止一切反動言論，對漸趨成熟的新文學運動產生極大的衝擊。戰時體制下，「皇民化運動」的推動，更是把殖民統治的黑手從政治、經濟，延伸到臺灣人的思想意識、家庭生活、社會文化裡，文學創作者在承受日本當局的限制及壓力下，或是轉向響應皇民化運動，作為歌頌戰爭的工具；或是離開臺灣，潛渡大陸；或是封筆表示抗議。但彭瑞金認為：

絕大部分的臺灣作家，即使為自己的文學和行為披上迷彩加以偽裝，都還沒有喪失作家的良知、癡傻到出賣自己的地步，則是事實。只是作家未再積極擔負起民

⁵⁶ 1923 年，黃呈聰、張我軍等人就曾在《臺灣》《臺灣民報》掀起白話文改革論和新舊文學論爭，將矛頭指向阻撓改革的舊勢力，加以抨擊。參閱彭瑞金：《臺灣新文學運動四十年》，高雄：春暉，1997，頁 12。

⁵⁷ 古繼堂編：《簡明臺灣文學史》，台北：人間，2003，頁 80-82。

族解放運動鼓手的任務，只能消極、迂迴地將反抗的情緒宣洩、反應戰時體制下，被殖民統治下的苦悶和困境，運動的精神傳統因此受到挫傷。⁵⁸

總而論之，1930 年代臺灣新文學的發展，雖在戰爭的影響下，呈現衰落之象，但對日本殖民統治的抗議，則是貫穿了整個新文學運動的歷程。

身為戰後的第一代作家，鍾肇政從日本文學以及世界文學裡吸收了延續日治時代新文學運動批判寫實主義的精神。因此，當終戰後，來不及享受掙脫日本殖民統治後的自由創作環境氛圍的臺灣作家，隨即陷入了二二八以後的「白色恐怖」泥沼中時，鍾肇政仍以濃厚鄉土色彩的寫作風格及作品的強悍生命力，重塑日本殖民時代整個臺灣、社會的動向。回憶二二八事件到五 0 年代白色恐怖的這段時間，戰前最後一代作家的葉石濤曾這麼形容：

日治時代的噩夢再度出現，臺灣又淪為豺狼橫行、魑魅魍魎跋扈的黑暗世界。臺灣的知識份子和作家奮力抵抗，想維持臺灣新文學的傳統香火於不墜，但這些抗議和控訴在巨大的統治力量下逐漸崩潰。臺灣作家同殖民地時代一樣，被囚禁、被放逐、被處決。終於被迫沈默，大地一片寂靜和漆黑。在這樣的法西斯統治下，文學只是執法者統治下的工具。作家必須依附權力機構才能苟延殘喘，同執政者的既得利益背道而持的一切文學活動或歧異思想是執政者用盡手段要予以撲滅的對象。⁵⁹

五 0 年代的鍾肇政，克服語言障礙的他在文學創作上尚屬初試啼聲的摸索階段，在反共文學為主流的環境下，發表作品的機會也有限。十年來透過翻譯文學作品，以及主持《文友通訊》的機會，對從事文學創作都是很好的磨練。六 0 年代的鍾肇政在寫作上開始呈現不同的風貌，《魯冰花》的引起迴響，帶給鍾肇政很大的鼓舞，他開始透過文學作品關懷社會現象，

⁵⁸ 彭瑞金：《臺灣新文學運動四十年》，高雄：春暉，1997，頁 28。

⁵⁹ 葉石濤：《臺灣文學的悲情》，高雄：派色，1990，頁 15。

雖然委婉卻具批判性。矛盾的是具批判性的作品能在當代那樣惡劣的政治環境下發表嗎？筆者認為也許就是這樣透過包裝的批判作品形式，讓鍾肇政找到了寫作的方向。經歷了二二八事件、反共戰鬥文學的衝擊後，鍾肇政也從寫實的、歷史的、生活的，以及生養自己土地的角度，發展出屬於自己的文學。

《臺灣人三部曲》選擇走入日本殖民時代的背景，與當時反共戰鬥文學並無抵觸之處，批判日本殖民的惡行，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下，也是安全的。筆者認為書中的主人翁雖對祖國都有一份遙望的期盼，但對土地的感情與執著，才是他們抗爭的真實意涵。而戰後臺灣人所經歷的一切，從回顧日本殖民統治時代的軌跡中，就如同歷史再一次的重演，也是對國民黨統治的強烈控訴，也許當代負責搜查、審核這些作家作品思想的人，並未深一層的理解到這一點吧！如果再對照解嚴後才完成的《怒濤》，對祖國形象的負面描述，更可從中得到映證。因此雖然有論者認為鍾肇政是抗日的作家，筆者認為不管是《臺灣人三部曲》還是《怒濤》，都可充分看到鍾肇政延續了新文學運動以來一貫地抗爭精神。

第三章 《臺灣人三部曲》、《怒濤》的殖民體制下之衝突與現象

第一節 異族的統治與種族的歧視

一、巨變下的掙扎

在文化傳承下，屬於漢人移民的臺灣人，在傳統的「華夷之分」觀念中，對於外來統治者，亦即種族文化上被視為「夷」的日本人，當然不會有好感，甚至存著鄙視的心態。因此，當甲午戰後，割台消息傳出後，除了引發臺灣住民的惶恐外，對清朝兵的不堪一擊，更顯憤怒。《沉淪》中的這段描述，即反應當時大多數臺灣人的不安與無奈的心境。

大好河山平白地送給異族，於是日本蕃就會來管臺灣了。受那可恨的東洋人統治，簡直是叫人不忍設想的事。……那些先人們都是用無數的血汗才奠定今日家業基礎的，這樣建立起來的家，難道能夠雙手捧著送給人家嗎？如果不呢？⁶⁰

……他們為什麼要臺灣？當然那是為了清朝兵打輸了，可是打輸了為什麼就要把自己的土地送給人家？⁶¹

雖然滿清政府對漢民族而言，仍屬外族，但滿清政府以漢人的官僚及制度統治臺灣，對一般庶民階層的生活，並不會有太深刻的轉變。但日本是一個外來的統治者，雖受過漢民族文化的洗禮，但終究不同於滿清政府。而且佔領臺灣後，一切依日本制度，並以日本官僚直接管理臺灣。其中的轉變，就易滋生衝突與排斥的情緒。

加上臺灣從荷據時期以來，移民的湧入，漢人的移民已成為臺灣社會的主要構成部分。在移民的過程中，在經濟利益的衝突下，族群間彼此難

⁶⁰ 鍾肇政：《沉淪》，台北：遠景，2005，頁8。

⁶¹ 鍾肇政：《沉淪》，台北：遠景，2005，頁16。

免有相互對立與排斥產生，「三年一小反，五年一大亂」這句臺灣諺語，就是清初以來臺灣社會的最佳寫照。因此在滿清政府看來，臺灣一直屬於「化外之地」，從未有心加以建設，只一味以防患嚴懲的消極心態，來統治臺灣，平時就以「貪官腐兵」來維持其統治權，以致公權力不彰，人民有冤無處可求。「自力救濟」就自然變成當時臺灣社會族群能活下去的來源。⁶²

因此當割臺成為定局後，臺灣人在認清滿清政府對這塊土地的無能為力，及政治的現實後，同樣採取「自力救濟」的方式，抵禦日本的佔領。《臺灣人三部曲》的第一部《沉淪》中以龍潭九座寮的陸家為主軸，由來台祖榮邦公，遠從廣東梅縣渡海來台墾拓，拉出故事的序幕，後代子孫在面臨割台的巨變下，經過去留的掙扎，最後仍選擇守著這塊土地，構成了這部故事發展的架構。

面對這樣的變局，陸家人挺身而出，加入抗日義勇軍，誓死守護這塊土地。誓師前夕，以莊嚴肅穆的儀式，由象徵陸家的精神支柱以及大家長的信海老人，帶領陸家義勇軍，唸出祭拜列祖列宗的祝禱詞，充滿捍衛這塊土地的決心。

皇清光緒二十一年歲次乙未潤五月初六，九座寮庄信民信海禱告于在天諸神暨列祖列宗之靈曰：惟我臺土，神州之邦，倭奴覬覦，賊軍猖狂，掠我桑梓，侵我勝疆，天人共憤，黎民倉皇，惟我神州，豈容淪喪，信民子弟，仁勇、綱青、綱嵩、綱岱、綱嵩、維秋、維建及家僮廖阿庚等六名，執戟攘夷，誓與存亡，伏祈庇佑，諸事吉祥，滅彼醜虜，日月重光，此禱。⁶³

⁶² 簡炯仁：〈清治初期清廷治臺政策的卻立即臺灣民變的社會性格〉，《臺灣開發與族群》，台北：前衛，1995，頁73。

⁶³ 鍾肇政：《沉淪》，台北：遠景，2005，頁218。

象徵臺灣抗爭精神的陸家，對異族統治的排拒，顯而易見。也正如林瑞明在〈且看鷹隼出風塵——論鍾肇政的《沉淪》〉所言，他們的力量施放於土地，也從土地獲得回報；深愛泥土的感情使得他們在日人侵入臺灣時，爲了保護鄉土，可以拿起土製的原始武器，坦然面對現代化裝備的日軍，慷慨赴義。⁶⁴日本接收臺灣，遭遇臺灣農民及民兵的頑強的反抗，日本採取高壓及武力的方式鎮壓，更讓臺灣人心生反感。即使，最後臺灣人在日本的優勢武力下臣服了，但心底深處不輕易屈服的骨氣，仍存留著。抗爭平息了，結束逃難的日子，陸家人回到祖堂前，遇到大批蝗蟲來襲，信海老人眼見蝗蟲飛到，看著祖堂被掩蓋住。

老人沒有動一下，風也奇異地止住，所以那飄拂的銀髯也靜靜地垂下去。仁智拿了一條手帕，想蒙住父親的頭和臉，也被輕輕地拂開。蝗蟲雨點般地落下，落在老人頭上、肩上、胸上，可是他仍沒有動一下身子。⁶⁵

象徵日本的蝗蟲，與象徵臺灣人精神的信海老人在這樣的情境下做了強烈的對比。這樣的硬頸與反骨精神成了臺灣人在日治時代對抗異族統治的原動力，也可看出這樣的精神象徵，一直延續到鍾肇政以「二二八事件」爲背景而成書的《怒濤》中仍鮮明可見。

走過殖民統治，在臺灣人歡慶日本投降，終於擺脫異族統治，重回祖國羽翼後，無奈卻面臨比戰時更嚴重的經濟蕭條，物價膨脹。眼見國府接收過程中，官員的貪腐、不公，以及陳儀政府政策的失當，招致民怨。失序的社會、不同文化的激盪，……諸多戰後的亂象，使得曾對祖國滿懷希望的臺灣民眾期待破滅。《怒濤》書中便常見到臺灣人對此亂象的憤怒與

⁶⁴ 林瑞明：〈且看鷹隼出風塵——論鍾肇政的《沉淪》〉，《臺灣文學的本土觀察》，台北：允晨，1996，頁92。

⁶⁵ 鍾肇政：《沉淪》，台北：遠景，2005，頁459。

無可理解的心境。其中一段身為醫生的陸志麒要求一名到醫院看病卻不願排隊支那兵，按次序等待，卻反被帶槍士兵架離，他的父親陸維林得知後腦中浮出了這樣的想法：

這是什麼世界！橫行霸道，土匪。還是一名少將呢！對啦，戰後出現的一個新的說法：特權，也許正是指這個。他們自認有權隨心所欲。他們自以為高人一等。臺灣人也因而成了低等人。日本時代，日本人也有那種優越感，把臺灣人壓在下面。……如今光復了，臺灣人仍然是被統治者、被壓迫者。可是這新的統治者，壓迫者卻是更惡劣更霸道的人種。⁶⁶

而另一個對日本降伏後，懷著光明期待的主人翁陸志駿，在目睹祖國過來的軍民在臺灣的行止後，總在與同事飲酒作樂的當下，心裡卻懷著落寞與空虛感，因而產生了這樣的感觸：

臺灣回到祖國的祖國的懷抱後，必定會給整個國家帶來光明與進步。臺灣不再是日本的，臺灣人也不再是日本人。可是初出社會，一下子就被擲進那種把貪瀆、賄賂視為常識的結構當中。一個字懂得人事起就被灌輸正義、潔白、守法精神的純潔青年，又如何能不滿懷失望與幻滅。⁶⁷

究竟，帶著歡欣鼓舞的心情回歸祖國懷抱的臺灣，是開創新時代的契機，亦或是另一個殖民統治的開始？大概是書中的主角陸志駿在經歷光復初期的那段景況後心中難解的困惑，也是當代的鍾肇政心中解不開的心結吧！

二、統治者歧視下的差別待遇

割台確定後，臺灣理應屬於日本帝國的一部份，在滿清時期，未受清

⁶⁶ 鍾肇政：《怒濤》，台北：草根，1997，頁240。

⁶⁷ 鍾肇政：《怒濤》，台北：草根，1997，頁142。

政府太多關注的情況下，對臺的行政措施並未對臺人造成太大的差異與改變。然而日本在臺灣的殖民統治，不論在政治、經濟、文化、教育任何一方面，都表現出明顯的「差別待遇」與「歧視」。在自以為優越的殖民者面前，所有臺灣人都被矮化，都成為被歧視的族群。因此《滄溟行》裡維樑在書局工作與日本人的接觸經驗，內心就有這樣的想法：

早就感覺出他們絕大多數抱著一種優越感，認定臺灣人確乎是劣等的民族，懶惰、骯髒、迷信、貪婪、膽小、懦弱、卑屈、狡猾、陰險，這些惡習與低劣品行，都集中在臺灣人身上，因而根本不放在眼裡。⁶⁸

因此當雇主松崎頭家能顛破維樑對日本人的刻板印象，鼓勵其上進、對他工作的指導、與不吝出借其珍愛的書籍時，對維樑而言是滿懷感動的。但這樣的形象，在他得知女兒松崎文子與維樑的愛戀時，便從可親的日本人轉換成殖民者形象的日本人。

「張科羅就是張科羅！」他竟然也會這樣說。近三年間的相處，他從未聽到過從他嘴裡說出這句話。甚至想都不能想像他也會說這句話。一直以為他根本就不知道有這麼一句話的。他的鼓勵、他的溫情、他的慈祥，這一切原來都是假的一不，原本也許是真實的，但當他的女兒開始考慮要嫁給一個臺灣人的時候，「張科羅就是張科羅」了。他，原來也祇是個「日本人」……⁶⁹

這些話打破了維樑曾經對日本人的幻想，也真實反映了在臺日本人對臺灣人歧視心態的根深柢固。在日本人一方面刻意隔絕臺灣與中國在各方面的聯繫，另一方面，以同化、皇民化運動來教育臺灣人以成為皇民為最高的榮耀的同時，他們仍只是把臺灣人視為受奴化的族群與製造殖民利益的工

⁶⁸ 鍾肇政：《滄溟行》，台北：遠景，2005，頁 49。

⁶⁹ 鍾肇政：《滄溟行》，台北：遠景，2005，頁 60。

具罷了。因此，表面日本人表現出殖民臺灣是對落後民族進行教化的工作，幫助臺灣走向近代化，然而事實上卻只是透過教育政策，培養一群為殖民者服務的順民。

日本人在強調同化的同時，卻在族群關係上，明確地區分「本島人」（即臺灣人）與「內地人」（在臺的日本人），採取雙軌的統治方式。不但在政治措施上，臺人、日人各有不同的處理法；在任何公私機關的待遇也不平等。在經濟上，採取「工業日本、農業臺灣」的政策；在教育上，學校制度則採日本進「小學校」，本島人進「公學校」的雙元制度，兩者間得到的教育資源卻是天差地別。

諸此種種對臺人歧視的政策與現象，常成為戰後第一代作家，描寫以日本殖民為背景的常見題材。《臺灣人三部曲》以農民的角度來回顧這一段五十年日本的殖民臺灣史，日本殖民當局對臺灣人玩弄的兩面手法，對一般的人民也許達到某一程度的成效，但對經歷武力抗日階段的臺灣人，及對當代社會有反省及洞悉力的知識份子，卻無法達到預期的效用，反更強化了臺灣人與日本人的歧異，也讓臺灣人從日本人編織的謊言中覺醒。

終戰後，戰勝的同盟國委由中國派軍接收臺灣，臺灣人終於苦盡甘來回到祖國的懷抱。在日治時期被視為「清國奴」的臺灣人，原以為終擺脫日本人壓抑與歧視，滿心期待殖民地位的轉變。從祖國過來的官員卻以一副征服者姿態，承接原由日本人擔任的政府要職，而取代日本人成為新統治者的中國軍民，及伴隨而來的是素質不良的軍隊、唯利是圖的財閥及投機客，這一批數量龐大的新移民，只是將臺灣人視為被奴化的日本人。在這樣的心態下，臺灣人在政經方面仍屈於被統治的結構中，國民政府還是像日本政權一樣的欺壓臺灣人。

因此，戰後初期，臺灣經濟還處於混亂之際，國民政府不但無法抒解這樣的景況，反而濫發紙幣，導致物價飛漲。臺灣生產的稻米大量被徵收運往大陸，反使島內缺糧，稻米價格暴漲。通貨膨脹也使得遭受戰爭破壞的工業生產，無法恢復。在這種惡性循環下，臺灣社會更形混亂，社會低階層的農民生活更加貧困。鍾肇政在《怒濤》中就有這樣的描述：

戰時日本實施「統制經濟」，民生必需品全面配給，……日本降伏，統制瓦解，「闇米」⁷⁰成了歷史名詞，願買多少便有多少，米是確實有的，其他物資也都一樣，……。然而，料想不到的事發生了，樣樣不缺固然沒錯，卻也樣樣貴，貴得匪夷所思，……。沒有人相信米會貴成那個樣子，可是事實就擺在眼前，不由得你不面對。大部分的人都買不起米了，只好恢復戰時的方式：吃粥，或者摻大量蕃薯籤。⁷¹

從戰前受日本殖民者壓迫、剝削的悲慘境遇，竟延續到戰後被自己的同胞欺凌，這樣的心理衝擊，在臺灣人心中是難以接受與想像的。

當戰後臺灣人自主性的維持著以往的社會秩序，等待祖國帶來新氣象建設新臺灣，目睹的是國府接收人員到來後，對臺灣社會製造的亂象。從大陸過來的新移民帶來的政治及文化衝擊，臺灣人才發現，心中嚮往的祖國，在臺灣吸收不同的階段的大陸移民，經歷過不同殖民文化，以及日本計畫性的同化政策與皇民化運動的影響下，已發展出獨特卻異於傳統漢文化的特質。就如簡炯明所言，不同的族群，各自帶著彼此不同的生活方式，亦即各個族群各自攜帶大陸性的文化來到島嶼生態的臺灣，時過境遷，必須要「本土化」融入在地文化，以形成另一種具有島嶼獨特性的文化。⁷²因

⁷⁰ 即黑市。另也有一稱「壓米」。

⁷¹ 鍾肇政：《怒濤》，台北：草根，1997，頁30。

⁷² 簡炯仁：《臺灣開發與族群》，台北：前衛，1995，頁57。

此，大陸雖是多數臺灣人的原鄉，但在歷時幾百年的文化融合，兩者間的變異性是必然的結果。

鍾肇政《怒濤》一書，以不同的人物角色呈現出臺灣、祖國、日本三者不同的文化樣貌，透過這些角色的互動，重現戰後初期臺灣的亂象，對當時的臺灣人的困苦生活與心理煎熬都有深刻的描寫。而其書中刻劃出的長山人樣貌、接收臺灣官員的惡霸形象與軍人的亂無法紀，都讓讀者能深刻理解二二八事件前夕，臺灣民眾已幾近忍無可忍的情緒，而面對國府人員粗率的處理方式與暴行，二二八事件也注定是悲劇的開端。

第二節 殖民統治下的農民生活

臺灣是個傳統的農業社會，廣大的民眾幾乎都是以依土地維生。但在封建的體制下，大部分的農民沒有自己的土地，只是受地主欺壓與剝削的佃農或半自耕農，屬於社會底層被壓迫的族群。從日治時期的新文學運動開始，土地和農民就是臺灣新文學的重要主題之一。⁷³誠如葉石濤所言：

「新文學作品中常出現的是農民悲歡離合的生活，日本殖民地政府的橫暴苛斂以至於大自然與土地之間的密切關係。這種傳統寫實的農民文學的香火一直沒有中斷，佔了臺灣文學最豐饒的一方領域。」⁷⁴戰後第一代的作家，除了經歷同樣地殖民經驗外，大多數也來自廣大的農村。因此，寫實的農民生活必然成為其創作題材的重要選項。鍾肇政的《臺灣人三部曲》也被視為是一部屬於廣大範圍的農民小說。⁷⁵以下將分別從殖民之初，日本當局從對臺灣農民土地的掠奪，到與日本資本家合作對農民經濟的榨取

⁷³ 葉石濤：《臺灣文學的困境》，高雄：派色，1992，頁9。

⁷⁴ 葉石濤：《臺灣文學的困境》，高雄：派色，1992，頁9。

⁷⁵ 葉石濤：〈恢復優秀的臺灣農民文學傳統〉，《走向臺灣文學》，台北：自立晚報社文化出版部，1990，頁84。

的情況，對當代農民的生活做進一步的瞭解。

一、土地的收奪

在日本「農業臺灣，工業日本」的政策下，殖民之初，臺灣總督府即開始進行有計畫的土地調查，期使這塊新得的殖民地能為日本帶來最大利益。1895年，即發佈「官有林野取締規則」，其中第一條規定「如無地卷或其他確證足資證明所有權之山林原野均屬官有」。⁷⁶土地調查時，在許多的農民無知、怕事，也不知如何插標的情況下，土地也自然成了無主地。而總督府對無主地及手續證明不完備的，也一律收歸國有，同時對擁有私人土地者也課以重稅。此外，為了懲戒參與抗日的義勇軍，如有土地者，也一概收為國有。《滄溟行》裡，陸維樑的堂叔的阿四叔，他們靠雙手開闢出的田園，就在「走反」的影響下，原本屬於自己的土地，也成了「官有地」。

如此一來，收成不好的土地，由於入不敷出，所有者也就不敢申請所有權。臺灣人的土地，就在總督府精心規劃下，名正言順落入日本人的手中。短短幾年間，總督府攫取的臺灣土地，官有地佔91萬6775甲，而民有地為5萬6961甲。⁷⁷其比例之懸殊，也昭揭日本欲榨取臺灣農業的目的。而總督府為使土地發揮最大的效用，同時討好日本大資本家及製糖會社，一大筆一大筆的放領給資本家，由資本家取得其利益，卻讓臺灣農民陷入殖民者與資本家的雙重剝削的處境。

二、會社的剝削與經濟的掠奪

由於地理位置及氣候條件的配合，臺灣的物產可說相當豐富，除了稻

⁷⁶ 矢內原忠雄：《日本帝國主義下之臺灣》，台北：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2004，頁 36。

⁷⁷ 矢內原忠雄：《日本帝國主義下的臺灣》，台北：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2004，頁 35。

米以外，蔗糖、茶、樟腦等，也是重要的經濟作物。爲了增加稻米的產量，日本政府成立「農業試驗所」，全面改造臺灣地區傳統的耕作方式及生產條件，引進優良的品種，並進行品種的改良，增施肥料、擴大灌溉面積，甚至依靠地方官吏、警察，強迫臺灣農民增種水稻、防風林。一連串的政策配合下，臺灣水稻的產量激增，但日本政府的終極目的，並非爲了改善農民的生活，只是爲了適應日本本土的需要，而以臺灣做爲日本農產品的生產基地，致力發展日本本土的工業。

除了成爲日本本土的「穀倉」外，臺灣的製糖業更是成爲日本掠奪的對象，矢內原忠雄就曾這麼說過，十九世紀的殖民活動地則名爲棉花時代，至於重商主義下的殖民地活動應可稱之爲砂糖時代。⁷⁸根據矢內原忠雄在《日本帝國主義下之臺灣》中的記載，1894年（明治27年），日本砂糖消費量爲四百萬擔，而生產額則僅八十萬擔，大部分有賴輸入。⁷⁹因此日本於佔領臺灣之時，即注意到臺灣的砂糖。其後，雖經過政府的大肆獎勵、推動與甘蔗品種的改良，但產值反而減少。其中原因，就是蔗園的荒廢與蔗農的窮困。然而，窮困的不僅是蔗農，日本佔領臺灣後，大部分的農民，都淪爲佃農，負擔沈重的租稅，遇土地物作欠收時，根本無力負擔，農民最終只是資本家（即會社）的奴隸，《滄溟行》阿四叔家裡情況，正可印證當時農民生活的窘境。

父子倆辛辛苦苦耕了二十多年的地，至今猶貧窮異常，最近還因為欠「會社」的租穀，面臨絕境，說不定可能遭撤田的命運。……十幾年前阿四叔母和阿浪哥的兩個弟弟相繼得了奇病，先後過世，因了這變故，他們第一次舉債，以後就陷溺在困窘的境地之中。……像他們父子那麼勤快的人，就是打零工做長年，幾十年

⁷⁸ 矢內原忠雄：《日本帝國主義下之臺灣》，台北：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2004，頁 240。

⁷⁹ 矢內原忠雄：《日本帝國主義下之臺灣》，台北：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2004，頁 252。

下來也可以掙得一份家產，無虞溫飽。……遭的是他們耕的土地是「官有地」。
官方早已把那些土地拂下（註：類如放領）給「會社」了。他們必須照租約向「會社」繳納租穀，這是天經地義的事。他們衣食不繼，而且拖欠租穀，越拖越多，這不是命運不繼，又是什麼呢？⁸⁰

在殖民者對土地的巧取豪奪及對臺灣農民的壓迫下，不得不激起臺灣農民反抗的鬥志，臺灣的農民運動即在反抗殖民者及會社的土地收奪及經濟剝削下展開。

三、皇民奉公會

日本統治臺灣末期，在太平洋戰爭的壓力下，爲了因應戰時體制及皇民化運動的迅速推展，1941年成立「皇民奉公會」。以此爲中心，「臺灣產業奉公會」、「臺灣青少年團」、「大日本婦人會」、「文學奉公」等，均納入「皇民奉公」的體系，全臺人人都爲日本聖戰下的一份子。1944年還成立「皇民鍊成所」，全臺各州廳共設立三千多所，以短期集訓班，訓練未受教育的民眾。⁸¹就這樣，戰時體制下的臺灣人，無分男女老幼全民動員支援日本的所謂聖戰，納入動員組織之中。在全民皆兵的政策下，臺灣人必須加入各種戰時組織，如壯年團、青年團等，接受嚴格的基本軍事訓練，這在人力上對臺灣農村的影響及家庭的經濟收入，是非常嚴重的。除此之外，還有所謂的奉公與供出，更加重農民的負擔，以下則舉例說明之。

《插天山之歌》裡就提到日本當局壓榨勞力的苛刻的「奉公」。所謂的「奉公」就是從事馬路馬路工作（註「馬路馬路」爲日語〇〇譯音。戰時日閥凡須保密之地點、工作名稱、部隊名稱，皆以〇〇代替）」⁸²當時

⁸⁰ 鍾肇政：《滄溟行》，台北：遠景，2005，頁 65。

⁸¹ 楊建成：《臺灣仕紳皇民化個案研究》，台北：龍文，1995，頁 A-2。

⁸² 鍾肇政：《插天山之歌》，台北：遠景，2005，頁 121。

的青年們被召集，從事訓練與強迫勞動，那些日本指導階級完全是採取日本軍隊作風，即猛打狠揍，稍有失誤，便拳打腳踢，絲毫不留情面。屢次不出席的人，警察還會出面抓人，甚至在「留置場」關幾天。⁸³即便心裡充滿憤恨，還是只能默默忍受。

除了「奉公」外，還有所謂的「供出」，即是日本當局要人民每年幾次繳出一些物資，像是山裡的馬草、柴、月桃、山芙蓉、相思樹皮等，這些東西從採集到曬乾、運出等，都需要花很多的人力，卻是一點報償也沒有。一般農民已為生活汲汲營營，在平常的負擔上又要增加額外的負擔，對農民的影響可見一般。因此書裡的陸志流（志驤伯父陸維昂之長子）就有這樣的抱怨：

那些臭狗仔，實在太可惡！不時地，又是青年召集啦，奉公啦，還有一會兒要柴，要月桃，要相思樹皮全都是白幹的，一個錢也不給。真是豈有此理。什麼皇國青年，根本就是鬼話，叫人做牛做馬罷了。真想把那些四腳仔統統幹掉……。⁸⁴

從殖民初期對農民土地的強取豪奪，到日本當局配合會社對農民生活經濟的剝削，使農民一直無法從困境中掙脫出來。進入戰時體制後，農民更在日本動員全民支持「聖戰」的口號下，不僅在勞動力及民生物資上進行更瘋狂的掠奪。農民在這塊土地上的許多可歌可泣的故事，常成為作家關注的焦點，而作家透過描寫農民的困苦、被欺凌的狀態，站在農民的立場去抗議與控訴異族政權的剝削與摧殘，正是對曾經哺育過我們生存的土地與農民的回饋。

⁸³ 鍾肇政：《插天山之歌》，台北：遠景，2005，頁 121。

⁸⁴ 鍾肇政：《插天山之歌》，台北：遠景，2005，頁 121。

第三節 知識份子的使命與宿命

爲了強化殖民臺灣的基礎，日本當局在1896年就成立國語傳習所與國語學校，前者是爲了「向土人傳習現行國語，作爲地方行政設施的準備，以奠定教育的基礎」；後者分爲師範部、國語部和實業部，師範部旨在培養日本人與臺灣人爲公學校教員，國語部則是授與臺灣以國語爲主的中等普通教育，實業部則對臺灣人授與農業、電信及鐵路有關中等程度的技術教育。⁸⁵而在台日本人的教育則是另成一系統，程度也較臺灣人高。雖然在1919年頒佈的臺灣教育令，都對臺灣的教育體制做了修正，但兩者間受的教育內容及資源分配仍存在著明顯的差異，臺灣人還是處於日本人附庸的地位。及至1922年新教育令頒佈後，中等學校以上實施「內台共學制度」，採日本教育制度，取消日本人與臺灣人的差別教育。然而，共學卻只是殖民者粉飾教育均等的伎倆而已，只不過用表面上的平等，掩蓋事實上的不平等。

雖然日本對臺灣住民的教育以考慮殖民者利益爲優先的前提下，培養出一批能爲殖民者創造財富即便於推動殖民政策的順民，因此以強制性及差別性的教育移植進行達到對臺灣人教化的目的。但持平而論，在日本的殖民教育體制下，對提升臺灣人整體的教育水平及引進西方新知識啓發島內住民仍有某種程度上的助益。在日本殖民之初推動日語教育的同時，對大多數的臺灣人仍接受私塾的漢文教育並未採取強制的取締措施，因此，當代大部分的知識份子仍懷有強烈的祖國意識，他們不斷號召群眾，透過武力的抗爭，爭取回歸祖國的可能。但在日本當局長期強制性的教育移植下，知識份子對漢文化的執著仍抵不過接社會現實下的壓力，雖然在長輩

⁸⁵ 矢內原忠雄：《日本帝國主義下之臺灣》，台北：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2004，頁 183。

的口述中，延續其抗爭的精神，但在接收外來思想與西方文化的刺激下，對祖國意識也產生某種程度的變化。

因此，不管出於自願或被迫，經過二十多年的殖民教育，造就了一批臺灣本地的新知識份子，這些接受了世界新思潮、新文化洗禮的知識份子，從武力抗爭的過程中，意識到敵我間的實力差距與成為日本殖民地不可改變的事實，對政治的敏感性變得也較強。在日本殖民中期，轉以非武力抗爭及合法的政治活動對抗日本的殖民體制與總督府的統治，謀取自治的可能，並等待恢復與祖國關係有利的時機到來。從臺灣議會設置運動，到臺灣文化協會的創立，知識份子積極的透過文化啓蒙或政治活動的方式，挑戰殖民統治的權力機構。這些具有先進思想的知識份子，面對異族的差別統治，與祖國的隔離，在日本殖民政府刻意區別「內地人」（日本人）與「本島人」的反抗心理下，以及對自己居住土地的認同感，除了祖國意識外，也漸漸刺激了臺灣意識的成長。

進入皇民化運動後，日本殖民當局對臺灣人更是強力地防範與壓制，同時也對臺灣菁英份子展開籠絡人心的收編工作。一方面將曾領導民族運動的主要人士編入皇民奉公會，強迫其為殖民統治及戰時體制服務；一方面則以改善政治待遇作為籠絡手段。在殖民後期，日本當局以強制的手段強迫臺灣人放棄原有的民族觀、文化觀，並無條件地接受殖民者的語言、文字、思想。在民族及社會運動幾近停擺的情況下，背負著時代重任的知識份子只能以抵制皇民化運動、堅守漢民族的傳統文化來與日本殖民當局對抗。

在《臺灣人三部曲》、《怒濤》這兩部小說中，陸家代表的是臺灣人抗爭精神的靈魂所在，所有的故事也圍繞著這個家族發展，在「晴耕雨讀」

的家訓下，陸家的後代子孫除了以農耕為生外，也都是受過教育的，鍾肇政對這些主要角色的設定，也都符合那個時代中有知識份子的背景與特質。截至目前為止，有關知識份子的研究與定義多得不勝枚舉，但對他們的形象特質、實際表現的論述卻未必完整。後殖民批評家薩依德(Edward W. Said)的說法是目前為止較被普遍採用的，他於《知識份子的再現》

(Representations of The Intellectual) 中對知識份子的看法如下：

我堅持主張知識份子⁸⁶是社會中具有特定公共角色的個人，不能只化約為面孔模糊的專業人士，只從事自己那一行的能幹成員。……知識份子是有能力「向」公眾以及「為」公眾來再現、具現、表達訊息和觀點、態度、哲學或意見的個人，而這個角色也有尖銳的一面，在扮演這個角色時，必須意識到其處境就是公開令人尷尬的問題，對抗(to confront)(而非產生[to produce])正統與教條，不能輕易被政府或集團所收編，其存在的理由就是去再現所有那些慣常被遺忘或棄之不顧的人們和議題。⁸⁶

以此評論《沉淪》的綱崑、綱崙、綱嵩等角色、《滄溟行》裡的維樑、《插天山之歌》中的志驤、《怒濤》中的志鈞、志駿所呈現的形象，皆符合此定義，他們秉持一定的原則與堅持，對國家與社會局勢有超越一般人的認知與使命感，生活在外來政權與動盪局勢下，知識份子面對的主要選擇是「要和勝利者與統治者的穩定結合在一起，還是選擇更艱難的途徑？」⁸⁷而顯然地，他們選擇了後者，對主政者的不義採取排拒抵抗的態度。

鍾肇政透過書中所安排的知識份子對時代的使命，把心中的反抗思想化為具體行動。從故事一開始，割台的消息傳出，陸家年輕一輩即綱崑、綱崙、綱嵩等，他們在面對往後將在異族統治下生存的想像，他們毅然決

⁸⁶ 轉引自宋國誠：《後殖民論述—從法農到薩依德》，台北：擎松，2003，頁 508。

⁸⁷ 艾德華·薩依德(Edward W. Said)著，單德興譯《知識份子論》，台北：麥田，1997，頁 72。

然地投入抗日義勇軍的行列，這一批完全沒有戰爭經驗的知識份子，在面對異族的威脅時，他們表現卻比一般人更急進、更顯出捨我其誰的氣概。

《滄溟行》裡的維樑，在母親堅決地反對下，無法進國語學校就讀情況下，與哥哥維棟走向不同的道路。較之維棟對命運所表現的屈從與無可奈何，即使意識自己在生活、學校工作受到的壓迫與不公平的待遇，但面對強勢的統治者，維棟只能顯出「一個被征服的民族，還能奢求什麼？」的卑微姿態。對煽動農民的維樑的心態，活在屈從於殖民統治的維棟是不可理解的，因此他曾試圖勸服維樑：

你這麼做，到底可以得到什麼好處呢？你說正義，我很明白，我們是受著人家的榨取剝削，甚至也受著宰割。可是，我們是被征服的，我們抗不過他們，那就祇有尋求自存的路子。我們要生存啊！維樑，我們總不能拿生命去跟人家拼啊！⁸⁸

在維棟與弟弟的爭辯後，維樑的想法，對他來說是可怕且匪夷所思的。維棟曾在維樑心中的崇高影像，也在維棟昧於時勢的轉變，身為一個知識份子卻跳脫不出求自我生存的框架中，甘於忍受殖民者的迫害，缺少抵抗的意志的認知下，產生動搖。

而維樑的轉變，起於上臺北進入書局工作後，書店的工作讓他有機會接觸各類的書以及從報章雜誌得到更多的訊息與世界動態，維樑開展了與以往不同的視界。而與日本頭家女兒松崎文子的感情受到阻礙，讓他體認到日本人友善的假面下，對臺灣人不變的歧視本質。因此回到故鄉後，重新面對殖民統治下原以為是生活常態的現象，便產生不同想法轉而投入農民運動的行列，鼓吹農民勇於爭取自己的權益。轉變後的他，雖仍過著不務正業的生活，卻因其對日本的抗爭行為，得到母親的認同。

⁸⁸ 鍾肇政：《滄溟行》，台北：遠景，2005，頁24。

《插天山之歌》中的志驤，一個胸懷大志、意志堅強、且不畏困難的留日學生，在日本參與抗日秘密組織，回鄉打算組織民眾，給予日方打擊，但也因此被日本當局視為「要注意的人物」。回台後，即被迫展開一連串的逃亡行動，在受到嚴密的監控與追蹤下，仍堅持與日本特務對抗意志。從一介書生，經過山林生活的磨練，轉變成一個實質的男子漢。從《沉淪》到《插天山之歌》裡的知識份子代表人物，雖然都沒有直接接觸祖國的經驗，但經歷與殖民者的不同型態的抗爭過程中，除了刺激其對祖國情懷的幻想與期待，也醞釀出臺灣意識的形成，也在時代變局下，維持了一個知識份子應有的風骨。

相較於《臺灣人三部曲》中從抵抗殖民者所產生的祖國意識及認同本土的臺灣意識，《怒濤》裡安排的志駿，則以一個完全受日本教育成長的背景，在實質接觸祖國的經驗後，產生的認同掙扎後，透過自我心理反省的歷程、認同意識的覺醒，最後選擇抵抗國民政府暴力鎮壓同胞的行為，也延續了陸家一脈相承面對壓迫的抗爭精神。從回歸祖國之初的熱切期待，到認清祖國的真實樣貌與對待同胞不下於日本這個外來的殖民者的殘暴行徑，期待的落差，對當代的知識份子而言心裡的感受是煎熬、痛苦與掙扎的。

鍾肇政筆下的主人翁大都是受過教育的知識份子，儘管從小接受日本教育，但他們從長輩的口中得以瞭解臺灣被殖民的真相，也透過生活中日台不平等的情形，逐漸摸索、進而明白臺灣人民被殖民的悲哀，產生反抗的意志。而這些知識份子在與強權抵抗的過程中，即使面對現實的無力感，他們的思想觀念與價值取向，也都符合了身為一個知識份子在社會中所扮演的角色。因此在明知不可為的情況下，他們仍肩負起與統治者抗爭

的角色。對比鍾肇政的成長經驗與曾經歷的時代變化，以及他投入文學創作的艱辛歷程，筆者認為鍾肇政企圖以這類型的人物形塑一個知識份子在社會上應有的典範，即使面對強權的欺壓，依然能保有對時代的自覺、堅決奮鬥與不妥協的精神，方能引領社會往光明面移動，由此也足見鍾肇政相信知識份子對社會的影響是有舉足輕重的份量。

小 結

綜合上述所言，《臺灣人三部曲》和《怒濤》這兩部小說，刻畫在不同階段的歷史進程中，臺灣人的生活經歷、抗爭的精神風貌，以九座寮的陸家大家族，作為整個臺灣人的代表和縮影。從前期的武裝抗日，轉為以政治、文化的非武裝抗爭形式，到最後在皇民化運動如火如荼進行下的精神抗爭，直到臺灣光復，「二二八事件」發生，讓人們彷彿又回到日治初期的景況，正好與《臺灣人三部曲》產生了呼應，原來光復只是另一次殖民的開始。鍾肇政即企圖透過真實的歷史事件，重現臺灣人民在異族統治下及回歸祖國後所受的歧視與壓榨，進而從抗爭的過程中，更深刻的體會臺灣人對這塊土地的熱情與堅忍不屈的精神。

從《沉淪》開啓臺灣被迫接受日本統治的序幕，從武裝抗爭的過程中，看到臺灣人即便受挫或犧牲，仍抵抗到底的決心。然而臺灣人也深深地體認到，面對這群武器精良的異族入侵，武力的對抗，在無外援的情況下，所做的抵抗終會銷聲匿跡，這是必然的結果。隨著時代潮流的轉變，一次戰後「民族自決」聲浪的蔓延，不管是臺灣人抑或日本人，在武裝對抗的接觸後，都學到了經驗。臺灣人改以政治、文化運動的抵抗型態，爭取日本對殖民地差別待遇的改善；日本政府也被迫重新思考對殖民地的政策。儘管如此，臺灣人被殖民的地位並未產生太大的改變，臺灣人仍屈辱地忍受著日本在心理上、精神上及經濟上的不平等待遇。非武裝的抗爭，雖仍遭到日本人的鎮壓，但也因此慢慢刺激了臺灣人的民族意識的覺醒，有助

於臺灣人意識的成長。日治後期，受到中日戰爭的影響，而臺灣在地緣及血緣上與中國又有深厚的關係，為維持臺灣島內的治安，日本政府扼殺了一切臺灣的民族運動，企圖以「皇民化運動」讓臺灣人不管是事實上還是精神上都變成完全的「皇民」，利用臺灣人作為侵略戰爭的兵力和勞動力，和日本站在同一陣線，幫助日本對抗中國。諷刺的是，更徹底的摧毀臺灣傳統的文化、習俗，並未使臺灣人更像一個「皇民」，反越發使得臺灣人的「臺灣」意識凝結起來。在因應戰時體制下的臺灣人，受到殖民者組織化及更多的剝削與壓榨，反使民族意識更為增長。

雖然在日本殖民體制下，臺灣人享有的教育資源遠低於日本人，在以日本教育體系為主的教育政策下，臺灣人在升學上也處於不利的地位。不過在日本增設公學校、中學、高等學校的情況下，臺灣人受教育的人數確實增多，對民智的開啓也有所助益。雖然日治時代，雖然僅有少數臺灣人有機會接受高等教育及出國留學，但這些少數的社會菁英，在與世界接觸，吸取世界潮流及西方思想的刺激下，面對日本殖民臺灣的不公平待遇及對殖民地無止境的壓榨，也試圖喚醒或引領民眾，改變臺灣人民擺脫不平等境遇的境遇。鍾肇政就曾這麼說：

在掙扎、徬徨當中，我常常以此自解：我投身社會運動，我上街頭，我開會，我演講……我有社會責任啊！我累了，我累了大半輩子。不！根本是一輩子。以前那些歲月，我只能利用假日寫、譯。尤其寒暑假。……幾十年間我幾乎沒有休過假啊……⁸⁹

鍾肇政讓這些知識份子扮演著反抗者的角色，親身的經歷與親眼所見的不公不義，使鍾肇政筆下的知識份子更能堅持良知與公平正義，對不合理現象發出不平之鳴，他們自然成為群體苦難的代言人，也是反抗壓迫與不義的發聲者，成為社會中流砥柱的力量。同時也呼應了鍾肇政在國民黨的威權統治下，為自己的社會上應扮演的角色找到定位及對自我的期許。

⁸⁹ 鍾肇政：《鍾肇政回憶錄（一）》，台北：前衛，1998，頁3。

第四章 《臺灣人三部曲》、《怒濤》中的反殖民意識的觀察

第一節 角色性格的塑造

人物是小說中的重要元素，人物的塑造雖是用來呈現小說主題，但塑造出來的人物形象卻能深深影響這部小說的風格與氣質。鍾肇政在談論創作長篇小說的技巧時，曾說過：「他創作長篇小說的其中一秘訣，即是列出人物表，一定要有一個人物表，要讓這個人在小說裡出現，不論人物、男女、老少，他都要先做一個表，這個表包括他的年紀、外貌、臉像上的特徵。當這些形貌構成後，這些人物就清楚的在腦子裡面形成。」⁹⁰而如《臺灣人三部曲》這部背景長達五十年的大河小說，其中出現的人物，更不可勝數。因此鍾肇政也說「其中夠得上稱為主角的，大概不出四五位、五六位，也許集中在一個兩個身上，其餘的也許有十個或二十個就是所謂的配角。」⁹¹，因此筆者認為書中角色的探究，是觀察鍾肇政反殖民意識可選擇的方向，以下將由四種不同抵抗樣貌的人物形象，分析作者蘊含其中的反殖民意識。

一、《沉淪》中的抗日英雄

《沉淪》一書的時代背景為臺灣割讓日本時，日軍鎮壓臺灣義勇軍武裝抗日的時期。因此在書中出現許多充滿抵抗異族入侵的英勇角色，也顯示面對即將受異族統治，臺灣人的不甘心。祖先多年移墾累積的心血，面臨異族統治後，不可測的未來，即使不甘卻又無可奈何的心境，激起臺灣人捍衛自己家園的決心。從九座寮陸家長輩與子弟討論割台後，陸家人的

⁹⁰ 鍾肇政：《臺灣文學十講》，台北：前衛，2000，頁 203-204。

⁹¹ 鍾肇政：《臺灣文學十講》，台北：前衛，2000，頁 204。

去留臺灣問題，主人翁相繼出場，表達對問題的想法。當保守的兄長仁烈、仁智仍猶豫是否回長山重新開始時，仁勇對自己的意向是相當確定的。

仁勇總是不發一言，老是嘴角泛著似笑非笑的表情。看他那樣子，彷彿這種討論根本就是多餘的。……他的回答還是那麼不著邊際：「看看吧。」……仁勇有他的打算。他還沒向家裡的人說過，不過也可以猜出來。⁹²

而當他買回兩大擔硫磺和一擔鉛條，並表示要和日本蕃打時，後輩如綱崑、綱崙、綱嵩也都給予熱烈響應，還因此遭到仁智、仁烈的譴責「你們這些後生人，開口一戰，閉口一戰，暴虎馮河，於事無補。堂堂大清帝國都敵不過他們，我們這個蕞爾小島，能有什麼作為？」⁹³仁勇對抗日的表態，也讓他成為帶領陸家後生晚輩參加抗日義勇軍的領袖。當時當然也有很多人，和仁智、仁烈一樣是採保守態度，不主戰的，如阿熊師。他是一個生活失意且整日沉迷酒鄉的人，現實生活本就困頓的他，政治環境的轉變，當然對他不造成太大影響，因此對於那些要去打日本蕃的人他是驚訝的「打什麼？反正誰來管我們還不是一樣。」⁹⁴，塑造這種對比形象，也正可凸顯陸家人在精神領袖信海老人的支持下，抵抗異族勇往直前的勇氣。就如鍾肇政在書中寫的一段話：

生為一個臺灣人，命中註定要與臺灣共存亡，否則你就祇有丟下了你辛苦經之營之，好不容易才建立起來的田園廬舍，以及列祖列宗的墳塋，回原鄉去！⁹⁵

因此陸家的子弟，在異族踏上這塊土地時，選擇以武力抵抗和土地共存亡。

陸家人的抗爭精神，表現在積極的投入抗日的準備，並可說是家族總動員，在農暇之餘，收買武器、製造銃藥、鉛彈。此外，還準備米糧、銀

⁹² 鍾肇政：《沉淪》，台北：遠景，2005，頁189。

⁹³ 鍾肇政：《沉淪》，台北：遠景，2005，頁189。

⁹⁴ 鍾肇政：《沉淪》，台北：遠景，2005，頁253。

⁹⁵ 鍾肇政：《沉淪》，台北：遠景，2005，頁189。

元捐贈胡老錦領導的義勇軍。在飽受旱災之苦，幾乎都沒有收成的景況下，陸家人可說盡了最大的力量，來支持抗日的行動。投入義勇軍的行列後，陸家人也立即投入突襲日軍的行動，儘管沒有作戰的經驗，拿的武器也是土製的刀銃，但在面對武器精良的日軍，鍾肇政筆下的陸家人，卻無絲毫的畏懼。雖然突襲的日軍行動，最終仍在日軍的強勢武力下失敗了，陸家人還死傷慘重，然而陸家人也因這樣英勇的行動，贏得鄉民的敬重。當這些返鄉的陸家子弟，回到祖屋時，鍾肇政描寫的景況是悲壯的：

走在前頭的是仁勇，左手腕縛著布條，有發黑的血跡。緊接其後的是綱崙，昂首闊步著。人們看到這兩人，氣宇那麼不凡，而且有著一股自然的威勢，正就是那種令人一看就會聯想到英雄、勇士、壯士這一類字眼的樣子。祇是他們的衣服都髒而且爛，脖子也沒洗淨，是被硝煙燻黑的。其後是綱振與綱嵩，兩人傷了腳，跛著，有人扶著走。顯然是由於失血不少和疲累過甚，面孔都蒼白著。⁹⁶

即使陸家人在第一次參與的抗日戰役中受到挫折，更犧牲了幾個子弟，但故事的尾聲，鍾肇政仍安排陸家人再度聚在一起為陸家人送行的場景，做為陸家人對異族永不妥協的抵抗精神的註腳。

而另值得一提的人物，是陸家的精神支柱信海老人與長工張達。信海老人是陸家來台墾殖後的第三代子孫，也是陸家第一個讀書的人，儘管十六歲才入私塾讀書，但及至五十年後，仍勤奮向學，漸漸也成為庄內子弟的老師。教學嚴格又一絲不苟的性格，讓他成為一個聞名的嚴師，同時也因為他的為人公正清廉，更是族裡排解紛爭的最佳人選，因此得到人們的敬重與崇拜。當臺灣割讓消息傳得沸沸揚揚時，在家裡引起熱烈爭論時，信海老人不僅未反對他們去打日本蕃，反勉勵兒子仁勇：「陸家子弟應該

⁹⁶ 鍾肇政：《沉淪》，台北：遠景，2005，頁 475。

有下卵的。你要多準備些銃藥，將來陸家子弟少不得要你來領導。」⁹⁷即便在陸家人因為突襲日軍而死傷慘重時，他仍忍痛支持陸家子弟繼續為這塊土地奮戰。信海老人的性格塑造，除了讓他成為陸家的精神象徵，也成為臺灣人民民族精神的縮影。⁹⁸

張達則是個有別於陸家子弟精實健壯體魄的柔弱小白臉型的青年，沒有從事農務經驗的他，做起工來總是顯得吃力、笨手笨腳，在陸家人眼裡是個沒用的人。但他確有不凡的野心，為了賺更多的錢，他默默忍受別人輕視的眼光。為了擺脫窮困，用盡心機誘騙陸家小姐鳳春失去了清白，因此鳳春得知族裡的年輕人要打日本蕃消息後，在自己心計下，鼓勵張達參加義勇軍，表現出男子漢的氣概，在不得不的情況下，答應投入義勇軍。之後張達在突襲日軍行動中，被日軍俘虜，施以嚴刑拷打，而供出義勇軍藏匿的地點。一個他人眼中懦弱無比也被人瞧不起的人，在經歷這樣的磨難後，最後他選擇回到鳳春的身邊向他她告罪，他這麼說道「我要感謝妳，是妳使我懂得怎樣做一個人，……一個臺灣人……一個陸家的人……」⁹⁹動亂的年代，喚醒了臺灣人對土地的愛，就是這樣的情感，讓他們為了這塊土地慷慨赴義，鍛鍊了人的心智，讓臺灣人粹鍊出更堅忍的意志。

二、《滄溟行》中的農民形象

相較於《沉淪》抗日英雄角色的塑造，以二〇年代農民運動為寫作背景的《滄溟行》則著墨在農民面對會社與資本家的任意剝削下，生活窘迫的描寫，最後屈居弱勢的農民，終挺身為爭取應有的權益，與日本當局抗爭。其中最主要的角色是陸維樑。一個在升學路上因母親反對而中斷求學

⁹⁷ 鍾肇政：《沉淪》，台北：遠景，2005，頁190。

⁹⁸ 林瑞明：《臺灣文學的本土觀察》，台北：允晨，1996，頁99。

⁹⁹ 鍾肇政：《沉淪》，台北：遠景，2005，頁470。

的年輕人，前往台北一家日本籍頭家松崎先生的書店工作，在頭家的鼓勵下，展開他的苦讀生涯，除了參加檢定的考試科目外，他也涉獵月刊、雜誌，也開啓了他的智識大門，成了「一個有思想、有眼光、有毅力，也有崇高理想的現代青年」¹⁰⁰

因此當民族運動如火如荼展開時，維樑也曾想拋開一切投入這偉大的行列，最後他選擇先充實自己，培養更多的實力，更高遠的眼光，再完成這遠大的理想。這些計畫卻在認識了松崎夫婦的女兒松崎文子後，發生重大的變化。在朝夕相處下，與松崎文子發生感情後，卻受到松崎夫婦的反對，這帶給維樑很大的震驚與打擊，即使明白松崎文子愛的堅真，維樑還是帶著破碎的滿足感與滿心的依戀離開台北，回到家的懷抱。

回鄉後的維樑，受到臺灣議會請願設置運動的鼓舞，重新燃起實現理想的意志，他開始在附近的茶園走動、觀察，發現農民的生活是窮苦的，幾乎還或多或少背著債務。日本的殖民統治，他們被迫接受新的主人，雖然從遠古開始，這些農民已習於順從命運的安排，忍受著殖民者的剝削，「因為那一片焦土，一場刀光劍影的血腥記憶，還歷歷猶在眼前。」¹⁰¹但在會社毫無人性及無止境的剝削下，現在農民覺醒了，生活不祇是忍受而已，他們開始向會社爭取應得的權益與利益。維樑就在在這種情況下，開始鼓勵農民對人爲的壓迫、欺詐與剝削，用和平的手段，爭取基本的權利。

投入農民運動後的維樑，開始奔走於農家之間，鼓勵農民起來跟會社爭取權益，要求他們降低租穀、肥料價錢，也要改訂租約，在農民碰到天災時，會社應降低租穀。這樣的鼓吹，漸漸引起農民的認同，更有些農民

¹⁰⁰ 鍾肇政：《滄溟行》，台北：遠景，2005，頁 41。

¹⁰¹ 鍾肇政：《滄溟行》，台北：遠景，2005，頁 116。

因為維樑的鼓動加入了農民運動的行列，但他們也因此遭受會社的報復，不僅這些農民受到牽連，連維樑自己都因此被關進郡役所。在文化協會人士的協助下，維樑幫了其他人被放出後，也成了庄內的名人，及令人敬重的年輕人，也得到母親對他的讚許與認同。被列為暴民、不逞份子的他，雖在哥哥維棟的請託下，意外得到會社的工作時，他卻斷然拒絕，並視為這是會社對他的「收買」。母親還因此責難維棟「吃日本仔的飯，你一個就夠了。我們窮一點也沒關係，不必教弟弟也去吃日本仔的飯。」¹⁰²陸家的抵抗精神在維樑身上又再次重現。

而在參與農民運動的過程，維樑並未因挫折而退縮，反而更積極投入，勇往直前，即便在過程中，身陷囹圄，遭受日人的屈辱與凌虐，仍不屈服的意志。漸漸影響其他人投入農民的運動，雖然最後仍是未竟全功，但已讓日本人不得小看農民團結的力量。維樑的堅持，在日本推動同化政策同時，也代表臺灣人抗爭精神的延續。

三、《插天山之歌》裡磨練心性的逃亡者

在本書中，並未出現如同《沉淪》、《滄溟行》中的激烈抗爭景象，全書看來一直圍繞在陸志驤的逃亡中打轉，但黃娟的就提出不同的觀察，指出了主角陸志驤很重要的表現：

論者有謂本書以主角的逃亡作主線，很難寫出這個階段的抗日運動。但是在日本嚴密統治下的臺灣，當時的臺灣人能做的抗日運動，大概也只有鍛鍊耐力與韌性吧！？

也有認為陸志驤性格懦弱，不適合做抗日運動的主角，但是陸志驤真的懦弱嗎？

103

¹⁰² 鍾肇政：《滄溟行》，台北：遠景，2005，頁334。

¹⁰³ 黃娟：《政治與文學之間》，台北：前衛，1987，頁81。

筆者認為陸志驤確實給人一種懦弱又遇事猶豫不決的印象，而這種性格就是鍾肇政賦予他的真實形象嗎？肯定不是的。一個陸家子弟，又是留日的高知識份子，回台準備組織民眾，給予日方打擊，日軍能早日戰敗，就代表臺灣能重光故土的希望，也是為祖國盡一份力量。因此他深信「日本必敗，那是歷史的必然，強權、霸道，終究逃不過時間的考驗。而這也正是他此番冒萬死回返故鄉的任務。」¹⁰⁴這樣的意志，不會使他成為懦弱的人。由於《插天山之歌》的故事背景是太平洋戰爭時期，與中國為敵的日本，在這段其間臺灣人的活動更是嚴密監控，避免與中國產生聯繫。而陸志驤就在日方特別高等刑事桂木警部的追蹤下，重回故鄉這塊土地。

在日本留學期間，志驤早因為加入秘密抗日組織，而被日警當局列為「要注意的人物」。父親在得知志驤回台從事的是打擊日本的秘密任務，所給予他的稱讚、鼓勵，讓志驤是感到安慰的，但回台前家裡已受到警察、刑事的注意，也使他未能展開完成偉大使命前，就得開始逃亡的生活。這樣一個可說會帶給別人危險的人物，仍被大山裡的網雲叔公收留，從此也可看出陸家人一直是以先輩的抗爭義舉為榮的。投入山林的工作對志驤這個知識份子而言，卻是另一個磨練的開始。從伐木、鋸木到搬運鋸好的料仔、木頭，著實讓志驤吃了不少苦頭，看似簡單的工作，卻是大有學問。憑著耐力與決心的支撐，志驤漸漸適應了做料仔的生活。

而志驤逃亡的第二站，則來到湳仔溝的遠房親戚阿端姑家，雖然姑丈對志驤惹上的麻煩有著顧忌，但仍對他伸出援手。躲藏在山中腦寮裡的期間，開始了隱居苦讀的日子，還跟著一個原住民青年學會了鉤鱸鰻的技

¹⁰⁴ 鍾肇政：《插天山之歌》，台北：遠景，2005，頁8。

術，因為他高超的泳技及強壯的體力，更成了出色的釣點人。¹⁰⁵

而在逃亡的最後一站一新柑坪，志驤在做過「支那兵」的張凌雲協助下，靠著在深山裡習得的技能，最後還心愛的女子奔妹共同在山中開墾荒地，過著稱得上愜意、平靜的生活。一年半的逃亡日子，志驤在奔妹臨盆前，終究還是讓桂木警部追蹤到他的行蹤。經過這段時間的磨練，就如同桂木警部所說：「你更強壯了，更像個男子漢，了不起。」¹⁰⁶作為對志驤不屈服意志的肯定。

雖然志驤以一個逃亡者的身份，過著東躲西藏的日子，但逃亡的過程中，志驤靠著不服輸的戰鬥精神，不斷磨練自己的能力，直到能夠完全發揮的時候，這些能力與意志的養成也成了與桂木鬥智和競賽彼此的耐力及韌性的籌碼。而志驤逃亡期間，鍾肇政所安排對志驤伸出援手的臺灣人形象，也成了支撐志驤抵抗意志最重要的支柱。

四、《怒濤》中的日本精神

寫作背景拉到國民政府接收臺灣的初期，鍾肇政以幾個不同型態的知識份子形象，在面對與祖國文化接續後的感受，來敘述這段1945—1949年間受到國府壓抑的戰後初期歷史記憶。李喬就曾指出：「鍾肇政此作採用為臺灣人精神史而寫的筆法，並不特別著重在血淋淋場面的重現，而是在捕捉那逝去的、令人哀傷的年代中，臺灣年輕人的感受。」¹⁰⁷

故事開始於戰後曾任庄長的陸維弘宴請族人的晚宴。戰爭結束，陸家族人紛紛從海外歸來，而有了這場親族聚會。與會的人物，包括留日返台的、大陸歸來的，以及待在原鄉的。根據故事的發展，陸家中這三種典型

¹⁰⁵ 鍾肇政：《插天山之歌》，台北：遠景，2005，頁 263。

¹⁰⁶ 鍾肇政：《插天山之歌》，台北：遠景，2005，頁 391。

¹⁰⁷ 李喬：〈那時代的感受——介紹《怒濤》〉，《新觀念》，1997，頁 106。

的主要代表人物分別是，留日返台的陸志麟、大陸歸來的陸志鈞，而原鄉的陸志駿。而黃秋芳以西方神話裡爭奪金蘋果的三個女人的生命原型，對這三類人物作了這樣的分析¹⁰⁸：

1. 「意見的」志鈞：出場時和人羣在一起的悲憤，緊盯著動盪的時勢有精闢的分析，周旋在眾人間的支配引領，勸阻志麟的感情、導引志駿的行動，在「二二八」前夕的敏感觀眾，而後又毫不猶豫地投入這場巨大的變動中。
2. 「感覺的」志麟：優渥的家世，讓他衣食無虞的成長，不必憂慮國事、費心工作。也不必介入一般市井小民的悲哀痛苦，得以用最純粹的感覺和愛情，去見證兩岸出相接時，困窘、眩惑、著迷、幻滅的各種情緒。
3. 「行動的」的志駿：因實際介入（工作、貧窮、愛），真正見證了那個年代大部份並不那麼意見凜然，感覺澎湃的「行動的大眾」。表現出對於特權矛盾不得不然的日常妥協，在無可退的關鍵投入怒濤巨浪的行動力，以及堅持在內心底線的一種精神愛的溫柔。

但筆者認為，比起志駿，志鈞更具備行動型的特質。志駿和志麟的性格特質是較為接近的，當環境逼迫而不得不勇往直前時，才更會激起其戰鬥的精神。因此在延續《臺灣人三部曲》形塑的陸家人的具抗爭特質的臺灣人精神的主軸下，志鈞、志駿的角色設計，則較延續這樣的特質。而同樣是抗爭性格的描寫，志鈞則傾向於剛強具行動力，與志駿的妥協謹慎性格是有著程度上的差異的。而作者塑造志駿這個代表「日本精神」¹⁰⁹的年青人，較志鈞更符合戰後臺灣普遍知識份子的形象。

兩人之間性格的差異筆者擬從下面幾個場景來做觀察。在「二二八」

¹⁰⁸ 黃秋芳：〈解讀鍾肇政的《怒濤》〉，《臺灣文藝》，1993，頁 61。

¹⁰⁹ 即《怒濤》一書中所提到的正義、潔白、守法的精神。

事件前夕的衝突，很快引起志鈞的注意，當他邀志麟一起前往觀察時，志麟的反應立刻引起志鈞的惱火，「蠢話！什麼看熱鬧的？我在說可能變成一件嚴重的事啊！臺灣會怎麼樣呢？你好像從來也不曾去想過。你這樣算得上一個知識份子嗎？」¹¹⁰而整個觀察民眾抗議的過程，志鈞的情緒是熱烈的，他不願離開，他要當一個歷史的見證者，他要好好的把這歷史的一幕烙印在腦膜上。¹¹¹而當衝突一觸即發時，志鈞仍不顧危險堅持留在現場，他也立即做出行動，帶領一群年輕人攻擊預科練基地。

而志駿在聽到學生軍陷入苦戰的消息後，沒上過戰場的他，並未立即做出反應，倒是他的同事托西卻鼓勵志駿一起投入。他的心情是猶疑的「要去救援嗎？這又怎麼可能呢？」¹¹²從他與托西的對話，可多少看出他性格的端倪。

「你怎麼啦？好像沒了主意。人家在拼命作戰，我們卻好像什麼事也沒有做，只是在喝酒作樂，花天酒地，這應該嗎？」

「我當然懂。我就是在想啊！」

「還在想，這有必要嗎？我們去就是了。乾乾脆脆的幹他一場。」

你說去，去當然是要去。但是，你打算去哪裏？嘉義嗎？怎麼去？」

看似退卻軟弱，背後的心思卻是縝密的。如果貿然的行動，只換得無謂的犧牲，對支援學生軍實質上是沒有意義的，眼見同胞不斷的犧牲也堅定了志駿堅定的投入戰事的信念。志駿這種處理事情的謹慎性格與下定決心後就勇往直前的特質，無一不是日本精神的展現。也因此志駿在林管所同事眼中，始終散發出獨特的氣質，凡事按部就班，能在同事花天酒地、萎靡

¹¹⁰ 鍾肇政：《怒濤》，台北：草根，1997，頁 236。

¹¹¹ 鍾肇政：《怒濤》，台北：草根，1997，頁 279。

¹¹² 鍾肇政：《怒濤》，台北：草根，1997，頁 198。

度日時，還守著最後一道防線。

角色的塑造，在一部小說中佔重要的位置，當作家塑造出一個人物形象時，也往往本於他的創作意識與時代氛圍，或是呈現某種感覺印象的投射。誠如李喬所言：

每個人有他獨具的生命歷程與生活經驗，加上稟賦心性傾向不同，自然，不同作家就塑造屬於它的獨特人物來。這些人物，往往是作家生命的投影，所處時代的縮影，同時又是作家理想期盼的反應。¹¹³

因此筆者歸結了《臺灣人三部曲》、《怒濤》這兩部作品中，主要人物的性格，發現鍾肇政一直企圖藉由這些人物的形象，形塑出臺灣人面對困境不屈服的意志，並能在困境中越挫越勇、自我磨練、反省的精神。從臺灣多年來歷史的發展進程來看，臺灣人一直扮演著被外來者剝削角色。外來政權的壓迫，除了帶給臺灣住民政治、經濟與文化上絕大的影響外，也成就了臺灣人的反叛性格。

第二節 與命運的搏鬥

從《臺灣人三部曲》、《怒濤》這兩部作品，我們可以強烈地感受到鍾肇政所要傳達的反抗精神，不管是對土地、對異族的反抗，鍾肇政都試圖營造一個不對命運妥協的意象，就如同鍾肇政在《沉淪》楔子中所描繪的臺灣人「爲了生存，他們開疆闢地，與大自然爭鬥，亦與大自然共存。爲了生存，他們拋頭顱灑熱血，與敵人周旋，從不低頭屈膝。」¹¹⁴

一、武力抵抗的一代

如前所述，以漢人爲主的臺灣移墾社會，對華夷之分的態度，是很明

¹¹³ 李喬：《臺灣文學造型》，高雄：派色，1992，頁212。

¹¹⁴ 鍾肇政：《沉淪》，台北：遠景，2005，頁3。

確的。即便，臺灣與日本在滿清時代雖與日本並無太多的接觸，但在語言、文化及生活方式，與漢族仍有所區分的日本，在漢人的優勢文化傳統觀念下，日本在臺灣人的印象中仍只是個蠻夷之邦。《沉淪》裡就有幾段描述，可代表臺灣人對日本的態度。當綱崑擔心今年的茶菁是否會因時局的動盪，而影響大陸對茶的收購時，綱崑的反應是「日本蕃，哼，日本蕃要買，我也不賣。日本蕃休想吃到我們做的一片茶，我們種的一粒米。」¹¹⁵等確認滿清割台後，陸家的去留問題，即使信海老人的兒子們，不如子執輩支持全力迎戰，但他們也是抗拒這樣的改變。「不必搬出什麼大道理，單就不能在異族鐵蹄下做個順民——其實那可能是奴隸——這一點來說，他們就非走不可。」¹¹⁶

我們不是清朝兵，我可不要回長山，我要跟滿叔和日本蕃……¹¹⁷

打得過打不過，我想是另外一回事，不管如何終得一戰，我們不能白白地把自己的土地交給人家。……¹¹⁸

我們臺灣人是不會這麼簡單就會低頭的，還是要幹的，不過不是像清朝兵那種幹法，是要真真實實幹一場。……我也要幹，勇叔這幾天正在準備大量銃藥，我們
要叫日本嚐嚐我們臺灣人的厲害！¹¹⁹

整個陸家子弟年輕的一輩，就在這樣的氛圍下，勇氣凜然的傾全力備戰。而以乙未割台作為歷史背景的《沉淪》，就充滿著臺灣人抵抗殖民者的決心與屢挫屢戰的決心。

日本統治臺灣之初，各地掀起的抗日活動，讓臺灣總督府倍感壓力，

¹¹⁵ 鍾肇政：《沉淪》，台北：遠景，2005，頁 16。

¹¹⁶ 鍾肇政：《沉淪》，台北：遠景，2005，頁 183。

¹¹⁷ 鍾肇政：《沉淪》，台北：遠景，2005，頁 185。

¹¹⁸ 鍾肇政：《沉淪》，台北：遠景，2005，頁 195。

¹¹⁹ 鍾肇政：《沉淪》，台北：遠景，2005，頁 196。

這個時期的總督府就在鎮壓抗日游擊隊的日子中度過。而《沉淪》中，胡老錦領導的義勇軍，即是其中的一支，胡老錦就以安平鎮作為義勇軍的基地，這裡除了鄰近南北交通要道，兩面又有山，是個很好的藏匿地點。陸家子弟在追隨胡老錦後，就開始由仁勇帶著這一群子弟熟悉地理環境及察看日本蕃的動靜開始，從中學習突擊日軍的技巧與方法，雖然他們拿的只是落伍的刀、鳥銃之類的武器，卻無損於他們迎戰日本這支有先進武器的軍隊，每一次的戰鬥讓他們的熱血更加沸騰，他們在戰鬥中學習，也在戰鬥中成長。就如胡老錦對綱嵩講的一番話「你不想輸給別姓的人，想跟娘盛學武功，實在可佩。我以前好像也這樣說過了，假如中國人都像你這樣，臺灣就根本不用割給日本。以咱們中國之大，你說還會輸給日本蕃嗎？想起來真可嘆可痛！」¹²⁰即使在面對軍容整齊、武器完備且為數眾多的日軍已進入安平鎮，他們還是選擇迎戰而不退卻，激烈的奮戰帶來了死傷的景況，心裡的沉痛與哀傷，仍阻止不了陸家子弟抵抗到底的決心，陸家義勇軍的領袖陸仁勇，就這樣勉勵他們「你們都不愧是陸家子弟，我也可以像你們信海叔公做個交代了，記住，艱苦的還在後頭，我們還要打，要反攻新竹，搶回台北，直到把日本蕃趕下海為止。」¹²¹從《沉淪》中，我們不只透過故事重見乙未割台後，臺灣人浴血抵抗的激烈、慘痛的場面，也感受到鍾肇政試圖形塑臺灣人形象的第一步。。

二、非武力對抗的一代

根據黃昭堂在《臺灣總督府》書中的記載，日本從領有臺灣開始到1902年為止的八年間，就只憑日本政府一方的統計顯示，臺灣人被殺戮的人數

¹²⁰ 鍾肇政：《沉淪》，台北：遠景，2005，頁 339。

¹²¹ 鍾肇政：《沉淪》，台北：遠景，2005，頁 423。

就已達三萬二千人，這個數目超過了臺灣人口的百分之一。¹²²西來庵事件後，臺灣人也從過去的慘痛經驗上，領悟了以血肉之軀對抗現代化軍隊及大砲、機槍的不智。加上第一次大戰結束後，民權思想、民族自決意識的興起，臺灣也因在異族的統治的差別待遇下，刺激了臺灣人的民族意識，因此臺灣的知識份子，開始尋求武力以外的途徑減輕臺灣人所受的壓迫。在知識份子的號召下，從「臺灣議會設置運動」¹²³、「六三法案撤廢運動」¹²⁴，以及「文化協會」的成立，到逐漸深入被壓迫最深的農工階層。

知識份子從帶領少部分農民爭取應有的權益，並開始從事對民眾啓蒙的活動，以致到後來發展為全島性的農民組合，掀起各地的農民運動。這一段轉變的過程，正好藉由《滄溟行》中陸維樑這個人物成長的過程表現出來。鍾鐵民認為，鍾肇政透過陸維樑的成長過程，由鄉下無知的青年，慢慢的知道時代的使命，這都是非常有序、非常自然的安排。讓我們可以一步一步跟著他走，跟著他看，結果終於找到一個方向。¹²⁵

以「中壢事件」為寫作背景的《滄溟行》，維樑就是在目睹日本資本家不僅壟斷臺灣的土地還不斷壓榨農民的情況下，又深被領導民族運動的人士及作為感動下，決定貢獻一己之力，展開對農民啓蒙的行動。開始為

¹²² 黃昭堂：《臺灣總督府》，台北：前衛，1994，頁 93。

¹²³ 臺灣議會設置運動，是以《臺灣民報》為中心的臺灣人政治活動，1921 年 2 月，由林獻堂等 178 人連署，向日本議會提出請願書。目的在要求衡量臺灣歷史特殊性，設置一個無論其為住在臺灣的日本人、臺灣人或在行政區域內的「熟蕃人」，均可經由選舉選出代表，組織一個根據臺灣特殊環境訂立法規及對臺灣的預算具有決議權的特別代議機構。前後歷經十四年，反覆進行了十五次的請願活動。參閱王乃信譯《社會運動史第二冊政治運動》，台北：海峽學術，2006，頁 11-113。

¹²⁴ 所謂「六三法」即 1986 年的法律第六十三號規定「臺灣總督得在其管轄區域內，發布具有法律效力的命令」。本來規定三年為期，卻一再延長，新民會成員在東京集結二百多名留學生協議推動撤廢此法律規定，林獻堂、蔡惠如等臺灣士紳以及彭華英、林呈祿、黃呈聰等留日學生紛起響應，組成「六三法撤廢期成同盟會」。參閱王乃信譯《社會運動史第二冊政治運動》，台北：海峽學術，2006，頁 4-6。

¹²⁵ 鍾鐵明發言，〈臺灣文學的里程碑—鍾肇政「臺灣人三部曲」對談記錄〉，林瑞明著《臺灣文學的本土觀察》，台北：允晨，1996，頁 229。

被欺壓的農民寫請願書，請求降低租穀，並要求會社同意農民分期攤還積欠的租穀；爲了改善農民的貧苦，還擬寫直述狀，想直接地交給到臺灣訪問的日本太子；另外也在黃石順的指導下，帶領赤牛埔、淮子埔等地的農民抵抗會社的壓榨及抵抗會社對農民農作的查封。一連串的抗爭行動後，雖使維樑遭到恐嚇、被抓到留置所，甚至遭受日本的拳打腳踢等屈辱，也讓他成爲所謂的「不逞份子」或「叛亂者」，但農民的問題也因此得到廣大民眾及日方的注意，也成功塑造了維樑成爲農民抵抗運動的領袖形象。

三、戰時體制下的一代

隨著1937年中日戰爭爆發，臺灣社會也起了重大的變化。爲了使同屬漢民族的臺灣人認同這場戰爭，防範臺灣人對祖國的情感聯繫，並支持日本帝國持續對外的擴張侵略，除了傾全力的防範與鎮壓臺灣島內的抵抗運動，日本也在臺灣實施了戰時經濟統制，將農業、工業、交通、貿易、金融、勞務及物質等都納入政府的統一管理，以確保戰時能提供必要的軍需物質和民生必需品的供給。此外，在社會文化上，也展開了更徹底的同化政策，即所謂的「皇民化運動」，如強制的推行日語、日常生活日本化、皇民化思想教育，以及強迫臺灣民爲日本帝國侵略戰爭服務，企圖將臺灣人的心靈、思想及文化徹徹底底改造成爲一個「皇民」。諸此種種，在鍾肇政以太平洋戰爭爲背景的《插天山之歌》裡也屢見臺灣人在因應戰時體制下，以聖戰爲名，強行壓榨臺灣經濟及改變臺灣人的生活情況描述。

（一）貧困的生活

志驤逃亡時投靠的綱雲叔公，一家人是靠山吃飯的，山裡的茶園，受戰爭的影響，幾乎也在半停頓的狀態，田的收成，也僅夠家裡的伙食。因此除了綱雲叔公外，即使已五十三歲的阿昂伯，仍要出外做料仔的工作。

大兒子被徵召當了志願兵，剩下二、三兒子能跟著他去工作，大女兒也要和母親割草、採月桃，全家幾乎爲了生活全投入了勞動的工作。

而山上的另一戶人家阿萬夫婦則住在腦寮（製樟腦工人住的地方），志驤對它的描述是「全部都是觀音竹搭蓋而成，屋頂和牆全是大茅草。看起來勉強可以住，……簡直比乞丐寮都不如。」他曾經還在心裡想過「人到了必需住這樣的房子，可真是人以下的動物了。」¹²⁶但在這樣的時局下，也不得不往山裡討生活。而另一件令志驤吃驚的事，山裡的大人或小孩，衣服不但都破破爛爛，甚至在山上這種濕冷的天氣下，大部分的穿著也顯得很單薄。以綱雲叔公家而言，就只有老叔公有保暖衣（即衛生衣），遇到天氣轉冷，大家只是把棉布一件一件的往上加。

（二）戰時體制下的無奈

志驤這一代的年輕人，都是在日本教育體制下成長的，沒有經歷悲壯慘烈的武裝抗日行動，也沒有對祖國的實質經驗，他們最直接的感受是投入戰爭的日本，讓臺灣人過著比戰前更窮苦的生活。在統制經濟下，任何物資幾乎都要配給，也要有配給證，才能買到，量也是很少的。逃亡的陸志驤，父親就把家裡的現款都給他，以備在需要時買幫助綱雲叔公家買壓米。在這種物資缺乏的時局下，在平地有錢也不一定買得到東西。就如阿昂伯對志驤說的「現在的東西，黑市價格一直在看好，有人說一粒花生仁值一分錢了。雖然是誇大其詞，不過比“公定價格”貴兩三倍以上是真的，祇要有東西賣，就不愁沒有錢入手。」所以志驤才會看到伯父不做料仔時，總是努力地種東西。¹²⁷

¹²⁶ 鍾肇政：《插天山之歌》，台北：遠景，2005，頁 66。

¹²⁷ 鍾肇政：《插天山之歌》，台北：遠景，2005，頁 97。

而山中同志驤一般年紀的年青人，不是被徵召做志願兵，就是要參加青年召集，把一群最有活力的年青人，給予純軍隊式的訓練，除了灌輸皇民化思想，就是要做為徵兵前的預備工作，等兵員不足時，隨時可以徵召。連救了陸志驤的漁夫四十八歲的年紀，也被迫參加志願兵，家裡的三個兒子也早已被徵去當「軍夫」。因此奉公、供出更是全部人力的總動員。層層的剝削，讓這些勞動的臺灣人，除了努力養活自己，還更增加負擔，引起的民怨，當然是不少的。此外，另一項臺灣人很難接受的是不能過臺灣年。陸志驤回憶在他中學時，日本官方早已開始禁止臺灣人過舊曆年，而要過「日本年」，不過臺灣人仍照過不誤。但進入了戰時體制後，日本人卻是強迫大家過日本年，不准人們再過另一個年，說這是皇民化的第一步。¹²⁸因此進入山中的志驤，看到臺灣人為了過自己的年也要偷偷的準備、祭拜的辛酸。

為了過這個偷過的「臺灣年」，家家戶戶都得煞費苦心。糯米，在鄉下較容易弄到手，當然是昂貴的「壓米」價。還有雞鴨也是「壓米」。糖是沒辦法了。祇有存，從三四個月前就要把配到的東西存下來。

年關到了，就偷偷地蒸年糕，偷偷地宰殺鴨雞。大除夕那天一大早起來就得展開活動。前此大家都已看好時辰，多半是卯時，先拜家裡的諸神和祖先靈位，還有灶君爺，到門口拜天公，其次到土地公和廟裡去拜。這天，還有一個重要的行事，就是一家團聚吃年夜飯。晚上是守歲，子時一到，又是開門鳴炮拜天公。這一切，都在偷偷摸摸裏進行的。¹²⁹

而為了怕臺灣人偷過「臺灣年」，派出所的巡查，也會四處突擊檢查。而反觀「日本年」的時間景象，書中是這樣描寫的：

根本就沒有過年的氣象，街道上的人不多，更看不到一個盛裝的女人。如果說有

¹²⁸ 鍾肇政：《插天山之歌》，台北：遠景，2005，頁 134。

¹²⁹ 鍾肇政：《插天山之歌》，台北：遠景，2005，頁 134-135。

什麼點綴著年景，那就是家家戶戶插著的太陽旗，以及掛在門上的「注連繩」（註：日本年俗，過年時在門上裝飾的稻草紮的飾物）和一些「門松」（註：亦為日本過年時的飾物）之類了。不錯，這祇是「日本過年」而已，大家不得不裝飾一下門面，虛應故事一番，人們真正要過的，是「臺灣過年」。¹³⁰

臺灣人在日本殖民下，在身心上都遭受極大痛苦，被迫為殖民者服務、被迫放棄自己的語言與文化，更在皇民化運動的美名下，強逼臺灣人成為皇民，但大部分的臺灣人仍不對命運低頭，以各種形式的抵抗，挑戰殖民者的統治。在鍾肇政筆下的主人翁，就從未在一波波的逆流中投降，即使在1937年後的臺灣，日本空前地強化對臺灣資源掠奪的時代，也只是更激起臺灣人這股抵抗的意志。

第三節 土地之愛的堅持

中國自古以來就是以農立國的社會，「安土重遷」是傳統農業社會的重要觀念。雖然在政治或經濟的壓力之下，大陸沿海的閩、粵等漢人不得不往臺灣尋求新的契機，但重視鄉土的情誼，卻不因此而改變。根據黃昭堂《臺灣總督府》中記載，在日本領台之初，曾給予臺灣住民選擇國籍的機會，但住民如選擇舊國籍（清國籍），則必須離開已有生活基礎的舊居住地，並把不動產的所有權轉讓給日本的臣民，對他們而言，不只帶來精神的痛苦，生活上也是極大的冒險。因此當時臺灣住民選擇舊國籍的比率是異常的低。《沉淪》裡已經在這塊土地上住了一百多年的陸家，在面臨這樣的變局時，陸仁烈心裡所想：

這麼一個大家庭，回去了原鄉，沒有土地，沒有田園靠什麼過活？果真回去，那麼一家人祇好分開來各自謀生了。仁智也許可以靠他的醫術來維持，可是那還只

¹³⁰ 鍾肇政：《插天山之歌》，台北：遠景，2005，頁102。

是一個可能而已。能不能用來支持他一家的生活，很成問題。仁勇還年輕力壯，靠自己勞力大概也能圖個溫飽，但是那就得叫他去替人家幫傭打零工了。陸信海的兒子去跟人做工，莫說做爸爸的，就是做哥哥的也受不了。¹³¹

而面臨日軍的掃蕩，陸家舉家逃亡時，信海老人若不是在眾多子姪的勸說下，原是不肯走的，他認為「假如祇是他一個人，他是寧願被日本蕃砍去了頭也不肯丟下祖堂離開的。」¹³²

從第一部的《沉淪》，鍾肇政就開始營造愛鄉愛土的人物形象，和土地並肩作戰，抵抗外來的異民族入侵的臺灣人。就如葉石濤所說的「這塊土地永遠屬於漢民族後裔生存的空間，我們立誓建設這塊土地為人間的樂土。」¹³³彭瑞金也曾對鍾肇政的作品做過類似的評論：

鍾肇政肯定的是鄉土、肯定的是土地，從鄉土、土地延伸了感情、延伸了喜悅，也延伸了悲哀。在方法上是拙樸的，但在意義上卻是深刻的，土地是不變的，鄉土是不移的，從土地延伸的一切或許已滄海桑田，但他們的根是相同的，鍾肇政能回到這一個根，尋到這一個根，挖掘出來而加以發揮，加以小心地呵護，他至少否定了文學是無病呻吟的惡意攻訐。¹³⁴

以下筆者將從兩方面做觀察：

（一）土地的無限付出

陸家的來台祖天貴公在九座寮庄蓋了一做莊宅，由於這莊宅屋場好，又蓋得富麗堂皇，也就成了陸家的祖堂。這祖堂前面的環境有一這樣的天然景觀，地理先生曾為他們分析了這環境的風水：

平地盡頭有一條天然溝槽，一彎三折，在屋前剛好成一弧狀，四時都湛著清澈的水，大旱不涸。平時雖是靜水，一旦天降雨水，立即成為奔騰的怒流。陸家人給

¹³¹ 鍾肇政：《沉淪》，台北：遠景，2005，頁 183。

¹³² 鍾肇政：《沉淪》，台北：遠景，2005，頁 445。

¹³³ 葉石濤：《沒有土地哪有文學》，台北：遠景，1985，頁 2。

¹³⁴ 彭瑞金：《泥土的香味》，台北：東大，1980，頁 38。

這條天然水溝取了個名字叫峨嵋溝，……放眼望去，對面聳立者中央山脈的連峯，層巒疊嶂，蒼翠欲滴。最高的是大雪山，近些的是李棟山、烏嘴山等巍峨崇嶺。而最重要的則是最前面的那座山，山頂成筆架型，名為筆架山。主屋正好是正面朝這做筆架山的。這座山為他們陸家人帶來很多文人墨士，子子孫孫書香不斷。¹³⁵

但乙未割台的這一年，以往春天都有足夠的雨水的時期，卻遭逢大旱，連一滴雨也沒下過。往年茶園遇乾旱時，峨嵋溝裡夠用的水，水量也不多，連溝裡的陽潭也出現旱象，抽水的工作顯得吃力。

因逃亡而走入深山的志驤，更親近了這塊土地，也學習在險惡的環境中謀求生存。從開始投入伐木、鋸木的工作，接著在做料仔、拖木馬的勞動工作中鍛鍊自己，學習釣魚的技巧，成為個中的翹楚，甚至投入開墾土地，從土地中得到報酬，與土地越來越緊密的結合，讓他更能體會土地的價值，也磨練出更堅毅的意志。連他自己也深切的感受到，自己已不再是從前的自己，已經是從文弱書生脫胎換骨的陸志驤。

而從事林務工作的陸志驤，他的工作更是與山林更親近的保護者。與山林的親近，讓他開始對山產生了傾倒與憧憬。從學校老師的教導中，他早已領略森林對臺灣的重要性，對他來說，山林就像大地的母親一樣，所以當他走入山林時就有這樣的心境：

當你走進到它的懷抱裡，你會感受到它的安詳、靜謐。那是一種無法形容的寧謐與安詳——遙遙遠遠的、不可數計的那麼遙遠的太古。可是，另一方面你卻又不得不深深去領會它無時無刻不在翻騰的生機。每片葉子、每絲嫩芽，以致必須凝神才能看見的小小生物，到大小走獸、飛禽。沒有一分一秒，它們不是在成長、在騷動。¹³⁶

¹³⁵ 鍾肇政：《沉淪》，台北：遠景，2005，頁 42。

¹³⁶ 鍾肇政：《怒濤》，台北：草根，1997，頁 78。

然而，對這片美麗又生氣蓬勃的山林的喜愛，卻在開始入山巡視林班後，產生了轉變。進入山林的他，看到的是酒家林立、夜夜笙歌；盜伐橫行，目無法紀，即使巡山員在場，都是視若無睹，只要和山林沾上一點關係的人，不管是官方還是民間的，也不管是不是申請可砍伐的，枯的、活的都是任意的砍。他心裡的疑問更擴大了「這就是新生的臺灣嗎？」這也讓志驤對祖國帶來的亂象與惡習更顯不滿。

（二）大地之母形象的塑造

在鍾肇政的小說中，我們常可見到穿插其中男女情愛的糾葛，也提高了小說的可看性。彭瑞金就認為《插天山之歌》裡的奔妹是女性角色中寫得最成功的。歐宗智也認為鍾肇政筆下的銀妹¹³⁷與奔妹「塑造出勇敢、熱情的可愛形象」¹³⁸。奔妹，一個剛開始被陸志驤看作只是一個動人的山村女孩，卻那麼自然地進入了他的心裡。奔妹這個女孩是那麼不同，一個會在深山裡吼叫、喊號令的女孩，表現出對他這個異於山中青年的知識份子不屑一顧，卻又默默的關心著他。在志驤受到日本警官追蹤時，義不容辭的帶領他逃亡，這樣的舉動，讓志驤重新看見了眼前女孩的真實形貌，沒有浪漫情節的鋪陳，卻從簡單的生活，真實地表現出不輸男子的勇氣與堅毅，陪著他冒險逃亡、與他共同墾殖田園，即使懷孕時，也一起忙著田園的工作，獨立又自主的規劃著屬於他們的生活，就像陸志驤心裡想的：「奔妹會是個堅強的妻子，堅強的母親，即使萬一他被逮，她照樣會好好地活下去，而且活得熱烈。」¹³⁹。

《滄溟行》裡的玉燕、松崎文子與陸維樑之間的感情糾葛，也有異曲同工之妙。對一個從小就是養女身份，一路陪伴、照顧著陸維樑的玉燕，

¹³⁷ 《濁流三部曲》第三部《流雲》裡的女主角。

¹³⁸ 歐宗智：〈塑造臺灣女性勇敢熱情的形象——談鍾肇政三部曲中的銀妹和奔妹〉，頁 138，《明道文藝》，309 期，2001，12 月。

¹³⁹ 鍾肇政：《插天山之歌》，台北：遠景，2005，頁 380。

一直未能得到維樑的認同，甚至是逃避的。但玉燕仍像傳統的女性一樣，默默地工作，並認命的接受命運的安排。而認清了與松崎文子的愛情終究是不能結合的事實後，維樑勉強接受母親安排，與玉燕結婚，但仍對她是冷落的，她默默的等著維樑的接受，這樣的執著，終於等到維樑的領悟：

「原來自己所期待的是個虛幻的愛情，不著邊際的羅曼史。那也就是松崎文子。其實，玉燕的幽香，還有柔情、蜜意，豈不是也一樣羅曼蒂克的嗎？何況玉燕的一切都是實在的。她的愛，她的生活方式，她的堅強，她的毅力，及連她的這柔情與蜜意，還有這撩人的幽香，沒有一個不是實在的。」

¹⁴⁰雖然對玉燕的形象描繪的不如奔妹這樣的生動鮮明，但陸維樑在經歷與松崎文子熱烈又絕望的愛情後，重新的領悟，林瑞明曾有這樣的解讀：

維樑與玉燕的結合，廣義而言，是進一步落實了鄉土之愛。大地是力量的泉源，肯定了玉燕愛，說明了經過一番心路歷程的維樑，更加成熟了，……作者刻化玉燕這個角色，蘊含了相當豐富的意義。她的「擊敗」松崎文子，也意味著臺灣人最後的勝利。¹⁴¹

在鍾肇政筆下這些看似無知、盲從於時代改變的女性，確有著勇敢、堅毅與不和現實妥協的意志，能靜靜地支持維樑、志驤等所謂知識份子的理想抱負。鍾肇政形塑這樣的女性形象，彭瑞金認為是土地的象徵，因為這樣的女性特質，讓人想到母親，想到溫暖的懷抱。由女性轉換成大地之母這樣的意涵是深刻的，因為當人民不管在殖民者的統治下，遭逢多大的苦難，心裡承受多深的煎熬，土地總是沈靜地接受，默默地給予。這樣的知識份子最終選擇了土地，認同了土地，志驤的觀念因之落實成熟了。¹⁴²

土地對依以為生的農民而言，有著無可言喻的感情，也是文學創作的

¹⁴⁰ 鍾肇政：《滄溟行》，台北：遠景，2005，頁 383。

¹⁴¹ 林瑞明：〈人間的條件——論鍾肇政的《滄溟行》〉，《臺灣文學的本土觀察》，台北：允晨，1996，頁 134。

¹⁴² 彭瑞金發言，〈臺灣文學的里程碑——鍾肇政「臺灣人三部曲」對談記錄〉，林瑞明著《臺灣文學的本土觀察》，台北：允晨，1996，頁 233-234。

根源所在。鍾肇政除了透過書中角色傳遞出對土地的濃厚感情，也藉由對異性戀慕的轉變，傳達作者本身對生命追尋方向的變化，選擇大地之母的形象的女性，也象徵對土地之愛的落實。而這份對土地的情感，足以抵抗外來強權的壓迫，以及作為抗爭的原動力。

第四節 文化交錯下的矛盾

臺灣的光復，意味著臺灣與祖國關係的再次銜接，但歷經日本五十年來的殖民統治，臺灣與大陸的文化上已產生某種程度的質變。「祖國」的存在，在《臺灣人三部曲》是提供陸家一種超越現實意識的文化認同對象。¹⁴³「長山」這經常出現的詞彙，雖然對當代的人其實是虛幻缺乏真實體驗的，但《滄溟行》裡的維樑最後在現實環境已無可作為下，靠著簡溪水醫生的資助，選擇前往原鄉繼續深造；《插天山之歌》裡的志驤在研讀「漢書」的過程中，心裡充滿激動與喜悅，期待與祖國產生更深層的聯繫，也透過與張凌雲對談中，重構了祖國的形象。

那兒有可愛的同胞，美麗的大地，而它們正是與他血肉相連的。他第一次體會到古以色列人對迦南之憧憬與懷慕。在敵人無情的追擊下，屍橫遍野，血染黃沙；而橫亙在眼前的，依然是一片西奈的不毛曠野，以色列人仍舊不畏縮地前進。¹⁴⁴就是這樣的孺慕之情，他自我勉勵要支持下去，用更健壯的身子與堅毅的心智和敵人對抗。而在他被釋放，步出郡役所，得知臺灣地位或將改變的事實時，他心裡悸動著「所熟悉的那個在胸臆裡噴湧而出的東西，又一次來了。不過這次可不再是噴湧，而是爆發了。」¹⁴⁵那是一種經過長久桎梏下，解放後的激動。因此他藉著對著插天山大聲地歌唱，抒發心中的激情。

¹⁴³ 陳建忠：〈後戒嚴時期的後殖民書寫：論鍾肇政《怒濤》中的「二二八」歷史建構〉，陳萬益主編《大河之歌—鍾肇政文學國際學術會議論文集》，桃園：桃園縣政府，2003，頁161。

¹⁴⁴ 鍾肇政：《插天山之歌》，台北：遠景，2005，頁310。

¹⁴⁵ 鍾肇政：《插天山之歌》，台北：遠景，2005，頁401。

《怒濤》在一開場，即是陸家為歡迎回到故鄉的子弟而辦的晚宴，晚宴氣氛是熱烈的，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全部在此聚集。有從大陸回鄉的伯叔輩，也有從日本留學歸國的同輩。曾經被志駿羨慕著的日本留學生志麟等，與從長山歸來的人相較之下，卻在臺灣地位改變後，也顯得相形見绌。筆者試圖從《怒濤》一書中，男女主角愛情的發展做為觀察鍾肇政反殖民意識呈現的主軸。探究作者如何透過不同的文化生活背景下的男女，表現對祖國意識的轉變。筆者擬以日本留學生陸志麟與跟著姊姊韓怡從長山到臺灣的韓萍、陸秀雲與長山中尉，以及陸志駿與由美三段愛情的發展，比較文化差異對反殖民意識的影響。

一、悲劇的愛戀

韓萍，這個代表祖國形象的角色。在一次聚會中帶給日本帝大的留學生陸志麟很深刻的印象。同樣是漢民族，但韓萍卻讓志麟覺得根本是不同的族類，「……外表、舉止不用說了，連對事物的看法、想法，似乎都有著奇異的差異，並且首先語言就已經不同，幾乎無法溝通。」¹⁴⁶此外，即使對人隨和親切，表現落落大方，在同個場合韓萍總讓這個優秀的帝大生在別人眼中似乎矮了一截，這對志麟而言無疑是個打擊，也無形中讓他產生自卑。對志麟而言，由陌生引發的好奇心，也在韓萍的主動接觸下，加快了感情的進展。志麟與韓萍的戀愛，引起故鄉間的騷動討論，連陸志鈞也曾對志麟提出警告「你真的會被吃掉」。娶了韓萍的志麟，也真的在陸家引起了波瀾。

在傳統的社會中，女性在父權為上的體制下，女性一直是處於受壓迫的族群，所謂的「三從四德」、「男尊女卑」等觀念，以男性為中心的親屬體系，仍深烙於承接中國文化的臺灣漢民族中。到了日本殖民臺灣時期，

¹⁴⁶ 鍾肇政：《怒濤》，台北：草根，1997，頁 177。

這些觀念並未隨異族統治而有所轉變，在日本強調服從的殖民教育體制下，反而是強化了。書中提到兩個觀察點，一是「輪煮」，二是「屈從」。

成為陸家媳婦的韓萍，是不下廚的，而是由跟來的使女代勞。因此，原本該由大、小媳婦輪流負責的廚房工作，在韓萍的提議下，全由使女扛下陸家家務的工作，飲食習慣也跟著韓萍的喜好而改變，這種轉變卻與陸家傳統的家庭生活形態是大相逕庭。傳統的客家女性「從小即須從事勞動，接受男人的安排，男人給妳什麼，妳便是有什麼，否則妳什麼也沒有。妳只有默默地忍從。」¹⁴⁷在志麟的印象中，原是千金小姐的大嫂，嫁到陸家後，也要依陸家的規矩。因此，表面上大家似乎都適應了韓萍為陸家帶來的轉變，但志麟卻也為這平靜表象背後隱藏的變化憂心，而這個變化就是父母的威權在家中消失了。

儒家思想影響中華文化深遠，是不容置疑的。因此，傳統儒家的禮教教育下，三綱五倫是中國社會的主要人際關係及規範。以男性為中心的家庭，女人不僅要服從權威，也要服從男人。但從「輪煮」這件事開始，志麟的父母卻對韓萍言聽計從的，在志麟的眼裡，父母的態度似乎還隱含者「屈從」的味道。在志麟的印象裡，父親就是這樣對待日本人的。就連他自己，從與韓萍相識開始，也一直順著韓萍的想法、做法走，學習她的語言、改變生活的細節……。對陸家而言，韓萍是個外來者，可是全家卻自然而然地接受她帶來的改變，志麟的心裡常會出現這樣的矛盾：

臺灣是「光復」了，「回到祖國懷抱」了，學祖國語言也是應該的，這一點他不但接受了，也在盡可能地抽出若干時間苦苦學習。問題是在他們這寄居台北多年的陸家來說，她是個外來者。豈不是應該由她來學他們陸家的語言才對嗎？事實上，這許多日子以來，也並不是沒有學過他們的語言，然而充其量也不過是片言

¹⁴⁷ 鍾肇政：《怒濤》，台北：草根，1997，頁 245。

隻字吧了。¹⁴⁸

而這樣的矛盾不只存在志麟的心底，隨著兩人越深入的接觸後，也真實的出現在兩人的思想上。就在台北發生衝突的暴動的情事上，讓表面上相安無事的兩人，有了嚴重的爭執。

在志麟來說，降伏後（說正確一點，應該是他從日本回來以後）所見所聞，都那麼明顯地表露著政軍人員為首的那些支那人只能說野蠻的。而在韓萍的意識裏，立場恰恰倒反過來了。這些臺灣人才是落後的、沒有文化水準的一若有，也只是皇民文化、奴才文化，易言之就是野蠻。小攤販不應該違犯禁令，查緝是應該的、正當的，即使有人因此受了傷乃至出了人命，也不過是芝麻大小的事。就是因未皇民化、奴化太深，所以才會為了這種小事鬧成那個樣子，還要顯出對祖國人士的激烈排斥。這就是野蠻，就是造反。¹⁴⁹

志麟在面對一連串衝擊後，對與韓萍關係產生新的體悟「他感到自己最親密的女人，竟是這麼陌生。……她肉體的每個部分，他都那麼熟悉。原來，他從未進入過她的心中，進去的只是身體而已……」¹⁵⁰最後韓萍離開，兩人失去了共有的孩子，志麟也重赴日本繼續為完成的學業，兩人的愛戀終究劃下一個悲劇的句點。

從志麟與韓萍的結合，就如同重新投入祖國懷抱的臺灣人與祖國的新關係，臺灣人擺脫日本殖民統治後，積極地學習祖國的語言，並熱情地迎接同胞的到來，然而臺灣人如此屈就逢迎的祖國，卻以另一個統治者的姿態，經營這段新關係，並視臺灣人為一群受日本殖民主義奴化的族群，剝削、壓迫無一不施加於臺灣人身上，更甚於日治時期。這短暫的文化接觸體驗，讓臺灣人認清了祖國的面貌，對祖國的期待也產生幻滅。原來臺灣人終究未能擺脫被殖民的惡夢，故事的最後安排志麟重回日本，似乎也意

¹⁴⁸ 鍾肇政：《怒濤》，台北：草根，1997，頁 246。

¹⁴⁹ 鍾肇政：《怒濤》，台北：草根，1997，頁 333。

¹⁵⁰ 鍾肇政：《怒濤》，台北：草根，1997，頁 336-337。

涵了作者對祖國意識的轉向。

二、無疾而終的愛戀

擔任小學教員的陸秀雲與長山中尉在姜家平安戲的宴會上邂逅，宴會上比鄰而坐的兩人，有了交談的機會。自稱梅縣人的中尉，講著秀雲懂的詞彙，卻無法懂得含義，熟悉中卻又帶著陌生，讓秀雲對兩人對話的情境，產生奇異又微妙的感受。用日語表達，她會說得又得體又高雅，順暢自然的。這也正是殖民地兒女的一般狀況。她內心也激起一種近乎無助的感覺。¹⁵¹在殖民教育下，被日本人視為卑劣人種的祖國同胞，在臺灣地位轉變後，卻讓秀雲在面對長山中尉時產生一種自卑的心態，加上語言的隔閡，更無法將兩人的關係拉近。

長山中尉接著雖對秀雲展開熱烈的追求攻勢，幾乎無時無刻都在她的附近出現，並且試圖親近她的生活。

他差不多是無時無刻地都可能在國校出現。有時候是開著吉普車，一陣風也似地駕到，有時則是安步當車……碰到上課時間——當然，多半是在上課時間，他可以為了等下課後的十分鐘休息時間而在辦公室裏窮泡，然後利用那十分鐘的休息時間跟一些同事聊聊。¹⁵²

不過秀雲家裡人對長山人是無好感的，維弘祖父雖在表面上對這位同鄉的軍官是親切、熱絡的，但背後卻是另一種想法。秀雲也在耳濡目染親戚鄰居對支那兵的謾罵譴責中，受到影響。對中尉從敬畏又憧憬的心態，轉為猥瑣、邋遢、貪污、腐敗的印象，她也在陸家視嫁給長山人為禁忌的情況下，對中尉敬而遠之，終究這段戀情是無疾而終了。或許是女性的矜持，也或許是女性對婚姻無自主的權力，卻讓秀雲更能在認清兩人間的差異後，選擇放棄。這段插曲式的愛戀，雖不如志麟與韓萍來得熱烈，作者做

¹⁵¹ 鍾肇政：《怒濤》，台北：草根，1997，頁 73。

¹⁵² 鍾肇政：《怒濤》，台北：草根，1997，頁 211。

了這樣的安排也和志麟的婚姻做了對照，秀雲在這場文化銜接的戰場中，得以全身而退，似乎做了正確的抉擇。

三、純潔的愛戀

志駿則在阿姨的介紹下，認識了由美。因個性的木訥，加上日本教育下的由美羞澀矜持的態度，兩人間總是存著距離。儘管兩人都不擅言詞，卻意外由書信的往來讓，情愫在兩人間漫開來。雖然只是淡淡的情愫，但這樣的愛戀方式，也讓志駿在精神上得到滿足。當台北的暴動後，決心投入戰鬥的志駿，第一次主動找由美，不是因為思慕之情，而是為了道別。即使沒有解釋、言語的交流，但由美從志駿的裝束，她是懂的，而且肯定志駿的選擇，他對志駿這麼說道：「……我在家裡常常聽廣播，常常聽得哭起來。我還有了一種預感，志駿桑也一定會去。可是，你一定會回來的。我會每天禱告著。」¹⁵³她選擇默默地支持與祝福，這樣的心靈相通，讓志駿堅定了自己對生命方向的選擇，也明白了由美的心，志駿與由美的愛戀得到美好結果。作者透過這樣的情節安排，更凸顯在沒有文化衝突下的兩人，才能得到真正的幸福。

由三對不同的愛戀中，志駿與由美的愛顯然較其他人是完美的。留日學生志麟與象徵祖國文化的韓萍，代表著不同文化在短時間接觸下，不同的生活形態，不同的思考邏輯與行為準則，如果只跟著瞬間吸引力走，缺乏深入接觸、瞭解的過程，並靠時間慢慢融合彼此差異，最終也是注定悲劇的發生。志駿與由美，同是受日本教育下成長的臺灣人，兩人相似的背景，減少了衝突的可能，更能產生心靈的交流，得到完美的愛戀。筆者認為，鍾肇政藉由這些情愛糾葛的鋪陳，傳遞了一種訊息，即不管日本人或長山人，他們以一個統治者之姿態，強勢地將其文化與生活形態導入臺灣

¹⁵³ 鍾肇政：《怒濤》，台北：草根，1997，頁 311。

社會，對臺灣人是格格不入的。志鈞對志麟講過這段話，正好可作為映證。

在我們這邊也還有蕃薯和豬的不同，就是本省外省啦。我覺得，蕃薯本來好像就有一種排他性，這也許是由於出外人根性，加上過去都是被欺負的歷史所造成的。也許這也是一種防衛本能吧。……所以外省人來了，起初大家都說是同胞啦，手足啦，末了是領悟到阿山的卑劣，結果感到無可比擬的幻滅。¹⁵⁴

不管是日本、還是國民政府，他們都試圖以強勢的作為，來導正臺灣人民，更符合其統治所需。對臺灣人而言，長期被殖民者所壓抑的心靈，只是渴求一個獨立、自主的生活空間，對臺灣強行植入的文化入侵，與不公平待遇，臺灣人的隱忍終會爆發。

小 結

鍾肇政在這兩部小說中，創造了符應不同時代抵抗精神的角色人物。從日治初期陸家人面對異族統治揭竿起義的英勇形象到中期的維樑喚醒遭受會社無情地壓榨的農民，為爭取自己的權益而抗爭的農民運動，再延伸到末期臺灣人在戰時體制下，受到日本當局全面性的嚴密控制下，仍堅持意志抵抗殖民者的全面同化。臺灣光復後，人民面對祖國軍民帶來的社會亂象、經濟的蕭條、及對臺灣人權益的漠視，作者再度安排陸家子弟投入反抗的軍事行列，與日本初佔臺灣的武裝抗爭行動做了呼應，當臺灣人面對強權的壓迫時，他們一貫的抵抗精神。

日本人是外來的族群，但回歸祖國的臺灣，原本應該充滿重回母親懷抱的喜悅與擺脫被殖民地位的期待。然而在文化相接之後，與祖國種種的矛盾一一浮現，統治者從日本的臺灣總督府轉換為國民政府，但在政治、社會、經濟上仍延續日治時代的壟斷、歧視、壓制與剝削，甚至在衛生醫療及農工業發展上，反而較日治時代更為落後。當臺灣人仍以日本殖民時

¹⁵⁴ 鍾肇政：《怒濤》，台北：草根，1997，頁 258。

代教育下的邏輯、行為模式去因應這些變化時，更顯得祖國與臺灣之間的距離感。異族的欺凌是臺灣人無法擺脫的命運，但重回祖國懷抱後，卻仍遭受殖民般的待遇，臺灣人無法跳脫被殖民的命運，心裡所受的打擊與煎熬，是更甚於被異族殖民的。

日本經驗仍活生生的烙印在臺灣人的腦海裡，光復後，臺灣人目送戰敗的日本軍民離開，迎接臺灣人心中那個虛幻、沒有真實經驗卻滿懷期待的祖國，但留這塊土地上的的是這群承受日本五十年殖民教育與剝削的臺灣人，不管臺灣人是自願或被迫，在長期同化教育下，他們無可厚非的已經與祖國在思想意識、生活文化上都或多或少產生了改變。在日本統治時代，臺灣人在日本人眼裡是被殖民者，只是成就日本帝國的工具；回到闊別祖國的懷抱，卻被祖國人視為被日本人奴化的族群，臺灣人一直是二等公民的地位，就如同吳濁流《亞細亞的孤兒》一書中的胡太明處境，接受皇民化後，沒有變成日本人，投入反日的行列中，也得不到祖國的信賴，不管統治臺灣的是異族還是同胞，臺灣人卻仍是處在這種尷尬的境遇中，也就在這種歷史重演的悲情中，臺灣人養成了與困境搏鬥、堅毅不屈的心靈。

《臺灣人三部曲》是在戒嚴時期所完成，第一部《沉淪》原以《臺灣人》為名，而被限制出刊，可見當時在戒嚴體制下，對可能造成反動的字眼或作為，都是被嚴密監控且禁止的，也因此鍾肇政在被高層列為可疑的異議份子而受監控的情況下，他先著手完成第三部《插天山之歌》，藉由志驤的逃亡作為作者本身當時受心理壓迫下抒發的窗口，雖然安排了許多對祖國文化傾慕的情節，實則控訴當時的國民黨同日本殖民政府一樣對知識份子無所不在的監控與壓迫。

《怒濤》這部以二二八為主題的作品，則是在解嚴後完成。從作品的

風格，讀者不難看出其中明顯的轉變，小說中充滿對當時接收國民政府軍民負面形象毫無隱諱的描寫，也許有論者會認為這是作者在經歷將近五十年的思想壓抑後對國民黨的反撲與控訴，但筆者以為從小說內容及對應呈現的史實，鍾肇政只是以一個旁觀者且經歷過那段悲慘歲月的過來人身份，重新透過故事的安排展現在讀者面前，也是作者在經歷日本殖民及國民黨統治經驗後，走過兩個殖民時代，透過文學創作再反省的歷程。

綜合以上所述，筆者認為鍾肇政這兩部小說中，不論是對日本或國民政府的統治，他所傳達的反殖民意識是一貫、沒有衝突的。鍾肇政成長於日本殖民後期，經歷過戰時體制下殖民者嚴酷的殖民方式，在他的心理上一定烙印著深刻的殖民傷痕；同樣地，在鍾肇政的創作歷程中，面對國民黨戒嚴體制及處於主流地位的反共文學，不願隨波逐流寫歌功頌德之作，不願屈從潮流創作自己不曾經驗、難以發自內心感觸的反共小說，以自己的經驗作為出發，去追憶一個動盪的時代，並藉此抒發對現實環境的無奈與反抗意識，對他而言是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下所能獲得的迴轉空間，也找到寫作的新方向。面對不同的抵抗對象，臺灣人以武力、非武力的型態對殖民政府做抗爭，爭取臺灣人應有的地位與尊嚴，鍾肇政則以文學的方式來抵抗國民黨的暴行，在面對戒嚴體制下的嚴密思想控制，作家不得不稍做讓步，藉由走入歷史，抒發心中的苦悶，但其一貫的反抗殖民與統治強權的意識，卻從未從作品中消失。

第五章 結論

自1987臺灣解嚴後，在政治環境的轉變下，也帶動文學創作領域有了新的樣貌，作家長期被禁錮的心靈，終於得到自由舒展的機會。從《臺灣人三部曲》、《怒濤》這兩部小說中，可明顯的對比出來。鍾肇政從《臺灣人三部曲》隱喻的批判主政者到《怒濤》直接的挑戰與嚴厲的批判國民黨戰後接收臺灣的醜陋樣貌，反映了在高壓極權的統治型態對文學創作者壓抑的釋放。儘管那一時代的悲劇已經過去，但刻畫在心中的記憶，卻緊抓住走過那一代歷史的每個人，特別是同時經歷兩個時代變局的作家。

鍾肇政這個跨越了日本統治時代與國民黨統治時代的戰後第一代作家，親身經歷了侵略者的惡行、感受了臺灣受異族統治的無奈。終戰後，在國府的戒嚴體制下，較之日本殖民時代總督府體制，毫不遜色的威權統治型態，以及白色恐怖下，對知識份子更加嚴密的控制。鍾肇政承繼了在日本治時代臺灣新文學運動反封建、反殖民的寫實精神，對一個身處戒嚴統治下的文學創作者，其經歷的日本殖民經驗，正好為他在寫作的創作題材上提供了很鮮明的材料。藉由這些真實的體驗，可看出在《臺灣人三部曲》、《怒濤》這兩部著作中，不管是對時代背景的選擇、角色人物的編排、角色特質的塑造，以及情節的鋪陳都或隱約或顯明的傳達出對時代的批判、個人的反省，與對土地執著的情感，也符合了鍾肇政在小說中企圖形塑的知識份子對時代中應有形象。以下筆者將從幾個面向總結鍾肇政這兩部小說中，反殖民意識的真實意涵與其代表意義。

一、走出悲劇，對日本殖民的再思考

臺灣人經歷了日本長達五十年的殖民統治，在終戰前的大太平洋戰爭時期，臺灣人更在日本瘋狂的侵略美夢下遭遇更嚴厲的剝削與壓迫以及改造。在長期身心的壓迫下，臺灣人抵抗日本殖民的意志，卻未因時間而有所轉變，不管是激烈的武裝抗爭，抑或文化協會領導的溫和抗爭型態，甚至是意志上的對抗，臺灣人一

直延續著不變的抵抗精神。

這段被日本統治的歷史記憶，活生生的存在經歷過這一段歷史的臺灣人心中。對戰後第一代的作家而言，當他們尚未從舊的傷痕中復原，卻又目睹與祖國接續後，統治當局政策的倒行逆施、經濟的蕭條、人民的貧困，在社會動盪不安、人民生活不安定的情況下，二二八事件的發生，更使這些作家抑或知識份子對光復後的亂象感到絕望。因此透過走入歷史的書寫，從鍾肇政的《臺灣人三部曲》所深刻表現出對殖民者欺凌、壓榨與剝削臺灣人的控訴，除了為自己所經歷的殖民傷痕找到宣洩的出口，也是對當時的國民黨以殖民心態統治臺灣做嚴厲的控訴，在國民黨高壓的統治下，他仍選擇以文學做為抵抗強權的堡壘。

解嚴後才完成的《怒濤》，雖見到在掙脫思想箝制後，重新面對二二八事件，鍾肇政表現出對當政者更直接、具體的批判與控訴。黃秋芳曾對他這部小說做了這樣的評論：「和以前的作品比起來，最特別的是，收起了壓抑猶豫，強烈責張的情緒到處都是，可以說，他是上了年紀以後，才瘋狂地去宣洩年輕時的縱恣和激情。」¹⁵⁵因此對祖國形象的醜化與批判、對長山人惡習樣貌的細膩描寫，都反映了他直接挑戰統治者的決心與勇氣。這兩部小說雖都以走入歷史的書寫方式呈現，卻代表著以前的統治時代結束，另一個殖民經驗的延續，筆者認為這是鍾肇政透過重現歷史樣貌，在走過激情後，對歷史的重新解讀，與個人自我成長的歷程。

因此《臺灣人三部曲》、《怒濤》兩部小說可觀察到作者除了揭發日本與國民政府對臺殖民的暴行外，也隱約可見到鍾肇政對日本經驗的新領悟。如《滄溟行》裡的書店頭家以及松崎文子的安排則代表對日本人印象的顛覆。松崎文子的深情與真誠守候，並未因兩民族的差異而有改變，也未因家人的阻撓而放棄，甚至肯定維樑領導農民抗爭的行動。《插天山之歌》中安排的桂木警部，也被黃娟評

¹⁵⁵ 黃秋芳：《鍾肇政的臺灣塑像》，台北：時報，2000，頁 154。

論為「頗有磊落豪放之風」¹⁵⁶，甚至讓志驤陪妻子奔妹生產後，才帶走他「使志驤不得不佩服這位警部大人，還是蠻有人情味的。到底是東京的幹員，與臺灣的那些作威作福慣了的四腳仔大有不同。」¹⁵⁷不管是松崎文子或桂木警部，他們形象的建構，也代表了鍾肇政透過小說，傳達出對日本經驗的新體認。這種新的思考方向在《怒濤》中更清晰可見。由志驤這個代表臺灣土生土長的人物，常因其本身自然散發出的日本精神而得到同事的讚揚與肯定，這樣的日本精神表現在生活中是凡是一絲不苟、規規矩矩、守正不阿、不偷懶，一切照規矩來。對比光復後，祖國軍民對臺灣人民帶來的影響包括花天酒地、夜夜笙歌、揩油、歪哥的風氣，日本精神在更顯得獨特與珍貴。

鍾肇政自己在提到戰後臺灣的情況時，也曾說過：「臺灣有進步的尖端科技，有日本人留下來的工業基礎，各方面的建設都相當進步，已經完全現代化。不說別的，教育方面，臺灣人在日治時代雖然受到很大的差別待遇，但至少各級學校都已齊備，受到教育的人數也增加得很快。」¹⁵⁸筆者認為鍾肇政在書寫這段從乙未割台到二二八事件這段歷史事實時，除了真實的呈現當時臺灣人被壓迫的景況外，能以正面的態度重新審視這段臺灣被殖民的慘痛歷史，是不容易的。歷史的使命，使這一代的作家在戰後寫出被殖民歲月中的悲慘經驗，但如鍾肇政等能堅持臺灣人傳統的抵抗精神，不願隨波逐流投入「反共」、「戰鬥」主題的書寫，而寫出臺灣人精神的堅持，且能跳脫「反日」意識，重新思考臺灣人的價值與方向的企圖，這是值得後代的讀者肯定的。透過文學書寫，鍾肇政凝聚出來的反殖民意識，透過拋出殖民時代令人深思的問題，才能體悟唯有自主方能擺脫被支配的命運，不再陷入背情的輪迴中。

二、重塑臺灣人的形象

特殊地理位置、豐饒的物產，為臺灣四百多年來的歷史發展，帶來了不同文

¹⁵⁶ 黃娟：《政治與文學之間》，台北：前衛，1993，頁 80。

¹⁵⁷ 鍾肇政：《插天山之歌》，台北：遠景，2005，頁 393。

¹⁵⁸ 鍾肇政講述，莊紫蓉筆錄：《臺灣文學十講》，台北：前衛，2000，頁 57。

化的激盪。隨著西班牙、荷蘭、明鄭、滿清、日本、國民政府的政權遞嬗，也帶來了新的文化、種族的刺激與融合，在這樣的背景下，造就了臺灣多族共融共存的社會型態，磨練出對環境與異族不妥協的意志。在這種歷史脈絡下成長的臺灣人，在面對日本全面且有計畫的殖民統治，社會文化的衝突與語言的隔閡，凸顯了兩個不同種族的差異性，也激起臺灣人重新思考自己的角色與定位。

鍾肇政在日本殖民教育的體制下成長，在面對回歸祖國懷抱後的漢族文化激盪下，他們這一批完全置身於日語環境的戰後第一代作家，在日語的思考邏輯下，要重新面對國民政府對臺灣住民強制漢文化，就如同日本殖民時的強制接受臺灣人日語教育一樣，顯得格格不入。因此有論者認為，鍾肇政在《怒濤》中對日本經驗非常具體且弔詭的充滿肯定與認同並援引日本精神抵抗國府殖民。¹⁵⁹但筆者認為這樣的書寫意涵著鍾肇政從真實面對日本殖民臺灣的史實，重新塑造在不可抗拒的命運下，日本的殖民統治對臺灣人精神或形象在文化交融下的轉變。因此當五十年的殖民統治，已將臺灣與祖國的文化做了區隔後，重新與臺灣產生連結的祖國所帶來的貪污、賄賂等負面的樣貌，鍾肇政所形塑的臺灣人形象也只能以日本精神教育下所養成的清白、磊落、守法、痛恨不公不義特質，去理解這些「同胞」的行為，這也代表了經過日本文化洗禮的這一代，在臺灣人精神的表現上，和日治前已產生了變化。

因此鍾肇政在呈現這種不同文化衝擊下的臺灣人形象的轉變，除了肯定日本精神影響下的特質外，也批判了那些牆頭草性格的人物，如日治時代出現的三腳仔（意指日本人的走狗），及國府接收後，那些馬上質變的臺灣人，因此在他的《怒濤》中和志駘一樣從事林務工作的同事就是以這樣的形象出現。因此鍾肇政在批判外來的長山人時，也對臺灣人做了嚴厲反省，在面對強勢的祖國文化，大部分的臺灣人很快地沉淪其中，這應該是鍾肇政心裡的痛。從祖先延續下來的抗

¹⁵⁹ 陳建忠：〈後戒嚴時期的後殖民書寫：論鍾肇政《怒濤》中的「二二八」歷史建構〉，陳萬益主編，《大河之歌—鍾肇政文學國際學術會議論文集》，桃園：桃園縣政府，2003，頁162。

爭精神，經過殖民統治的粹練，應該是更為執著、堅持的，但大部分的人仍選擇淹沒於時代的巨浪中，不可自拔。

三、解開族群的情節

有論者認為鍾肇政能成為本省籍作家中，獲獎最多的原因，無疑是其作品中強烈的抗日精神。¹⁶⁰在鍾肇政的另一部作品《濁流三部曲》中，主角陸志龍對存在臺灣人與日本人間的對立關係有著很大的困惑，也因此主人翁在日本殖民統治的生活中，常顯得自卑、苦悶與沮喪，這樣的情緒也延續到《滄溟行》之中。施正鋒曾提出這樣的解讀：「癥結是在殖民者無法提供起碼的認同，讓臺灣人找不到合理的自我定位。在剝奪自我選擇的壓抑下，徬徨、焦慮、沮喪是正常的反應。」¹⁶¹日本殖民時代，在官方不斷強調一視同仁的前提下，臺灣人感受到的仍是差別的待遇與對種族的歧視，在日本人以高壓、暴力的手段將臺灣納入日本的一部份時，並未顧及到民族的差異性產生的衝擊。雖然在日本糖與鞭子雙管其下的政策下，收服了部分臺灣人的認同，但對大部分的住民而言，仍只是表象上的屈從。

從《沉淪》中日本人以殘暴壓制臺灣義勇軍的形象出現，到《滄溟行》中松崎文子的出現，打破維樑對殖民者的刻板印象，到《插天山之歌》中，對日本警部人格的正面肯定，最後出現的《怒濤》毫無避諱對日本精神的讚揚。其中的轉折，筆者認為除了反應作者在文學創作歷程中，自我追尋的轉變，也代表作者在反殖民意識下對祖國意識與臺灣意識的釐清過程。而這裡所指稱的臺灣意識，意指臺灣人在共同的歷史經驗中，經過長期對抗殖民者的歷程，所啟發的意識覺醒。鍾肇政走過日本殖民、白色恐怖，以及戒嚴的時代，在這段歷史進程中，深切體認到臺灣人與這塊土地已產生不可分割的命運，對日本精神的肯定，已明確表示作者揮別了日本殖民的陰影，對戰後初期國民政府的批判，與其認為是一個知識份子對國民黨高壓統治的反撲，筆者認為是鍾肇政藉由歷史的重述過程，建

¹⁶⁰ 施正鋒：《臺灣人的民族認同》，台北：前衛，2000，頁 118。

¹⁶¹ 施正鋒：《臺灣人的民族認同》，台北：前衛，2000，頁 119。

構出所有臺灣住民在經歷共同受難的歷史記憶中，臺灣意識的形成歷程。

在殖民者刻意分別本島人、日本人、長山人的差異，是臺灣人這段集體殖民記憶中，不可承受之重。歷史雖不可抹滅但也已經過去，在臺灣人與這塊土地共同奮戰的過程中，所產生無法分割的情感，是應該跳脫族群的分別的。特別是在1970年代，臺灣遭遇退出聯合國、中美斷交等重大政治危機時，國民黨正統中國的地位也面臨嚴重挑戰的當下，中國人與臺灣人的認同問題也浮上台面，在當代的知識份子開始重新將目光聚焦在自己生長土地上時，也重新喚起臺灣意識的成長。因此筆者在這兩部小說中，覺察到的是鍾肇政試圖拋開殖民的傷痕，與其悲觀地沈溺於歷史的苦痛，不如以積極樂觀的心態，建構臺灣人的新未來。

四、在教育上的啓示

鍾肇政在臺灣文學上的地位是不容置疑的，除了開啓大河小說的寫作先河，更從《文友通訊》到《臺灣文藝》，以及擔任民眾日報副刊主編其間，對鼓勵及提攜後進上更是不遺餘力。在其長、短篇不可勝數的文學作品中，更可發現在其文學世界中，從未脫離臺灣社會的創作題材，除了反映日本殖民下人民的艱困生活，也引領後代人重新回顧臺灣人經歷過的血淚辛酸史。

在現今民主、自由、開放的時代，我們擁有自由的思想意識與充分言論的言論自由，因此當我們回顧鍾肇政在其文學創作歷程中，曾經經歷的白色恐怖，與戒嚴時代受到國民政府對本土文學的打壓與對人民嚴密的思想控制，身在現代的我們能做的，除了肯定走過這段坎坷歷程的臺灣作家的貢獻外，對其身處戒嚴體制下，在文學上所做的妥協，也能有更寬容的理解。因此鍾肇政這兩部小說能從抗日精神作為出發，讓讀者在欣賞其文學創作的藝術與技巧時，也能體會作者反諷國民黨的野蠻與暴力統治的意涵，同時也讓讀者能重新回顧這段日本殖民到二二八事件間的歷史，對傳統官方的歷史記述，有了不同的理解方向，藉此體會文學創作的寶貴價值。

近年來臺灣教科書內容，雖有從大中國主義，走向去中國化的趨勢，並強調本土或鄉土教育，社會領域教科書強調「臺灣」的議題，更引發朝野的論戰，且常伴隨著政治上族群及統獨的意識型態之爭。身為教師的我們在這樣紛亂的環境下，能做的努力不應是去強化統獨意識的對立，而是導引學生透過認識臺灣這塊土地的文化，讓學生由心發出對土地共存共榮的認同。筆者觀察鍾肇政的反殖民意識中，伴隨的臺灣意識的成長，他透過文學形塑臺灣人的新形象，這種意識是植基於對土地深厚的情感。因此，雖然鍾肇政一直被認為有著台獨傾向，但筆者的解讀是這樣的臺灣意識，應是非關統獨，而只是對這塊土地的認同與珍惜。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鍾肇政作品中反殖民意識的呈現，不只是代表對威權統治的反抗，凸顯的應是對歷史的再反省。從鍾肇政筆下創作的知識份子典型，再印證到他自己的文學創作歷程或是對臺灣文學投注的努力，都可明確感受他對身為一個知識份子對時代應負的責任一貫地堅持堅持態度，以及面對社會現實時，知識份子應對時代有的敏感度及反省能力。

臺灣人的自省自覺意識，應該不只是存在於作家的文學作品中，遠離了殖民統治與戒嚴時代，身處自由、民主的這一代臺灣人是很難理解曾經受壓迫者的煎熬，因此我們學習珍惜前人為這塊土地犧牲奮鬥後得到的果實。特別是在現今這個政治渾沌不明、朝野對立的政治亂象、統獨意識爭論不休的社會環境下，更值得我們去深思「臺灣」問題，每一段的歷史記憶，都是這塊土地上的每一個人共同經歷的一部份，相互地攻訐謾罵，都無法帶領我們走過這個過渡民主的難關，也許就如鍾肇政書裡的主角一樣，重新用心去感受這塊土地的付出、投入土地的懷抱，我們自然會找到臺灣人應該走的方向。

參考文獻

一、專著

王詩琅著，張良澤編：《三年小叛五年大亂—臺灣社會變遷》，台北：海峽學術出版社，2003年4月。

王乃信等譯：《臺灣社會運動史（一九一三～一九三六）》，台北：海峽學術出版社，2006年6月。

矢內原忠雄，林明德譯：《日本帝國主義下的臺灣》，台北：財團法人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2004年2月。

古繼堂：《臺灣小說發展史》，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2年3月。

古繼堂編：《簡明臺灣文學史》，台北：人間出版社，2003年9月。

艾德華·薩依德（Edward W. Said）著，單德興譯《知識份子論》，台北：麥田出版社，1997年11月。

江自得主編：《殖民地經驗與台灣文學》，台北：遠流出版社，2000年2月。

何欣：《中國現代小說的主潮》，台北：遠景出版社，1979年3月。

何欣：《當代臺灣作家論》，台北：東大圖書出版社有限公司，1983年12月。

宋國誠：《後殖民論述—從法農到薩依德》，台北：擎松出版社，2003年11月。

李喬：《臺灣文學造型》，高雄：派色文化出版社，1992年7月。

林瑞明：《臺灣文學的本土觀察》，台北：允晨文化出版社，1996年7月。

林瑞明：《臺灣文學的歷史考察》，台北：允晨文化出版社，1996年8月。

周慶華：《臺灣文學與「臺灣文學」》，台北：生智出版社，1997年8月。

- 施正鋒：《臺灣人的民族認同》，台北：前衛出版社，2000年8月。
- 柯惠珠著《日治初期臺灣地區武裝抗日運動之研究》，高雄：前程出版社，1987年4月。
- 陳萬益編：《大河之歌—鍾肇政文學國際學術會議論文集》，桃園：桃園縣政府，2003年12月。
- 黃秋芳：《鍾肇政的臺灣塑像》，台北：時報文化出版社，2000年12月。
- 黃娟：《政治與文學之間》，台北：前衛出版社，1993年5月。
- 焦桐：《臺灣戰後初期的戲劇》，台北：臺原出版社，1990年5月。
- 彭瑞金：《泥土的香味》，台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80年4月。
- 彭瑞金：《文學評論—瞄準臺灣作家》，高雄：派色文化出版社，1992年7月。
- 彭瑞金：《臺灣文學探索》，台北：前衛出版社，1995年1月。
- 彭瑞金：《臺灣新文學運動四十年》，台北：自立晚報社文化出版部，1991年3月。
- 楊建成：《臺灣仕紳皇民化個案研究》，台北：龍文出版社，1995年10月。
- 葉石濤：《臺灣鄉土作家論集》，台北：遠景出版社，1979年3月。
- 葉石濤：《臺灣文學的回顧》，台北：九歌出版社，2004年11月。
- 葉石濤：《沒有土地哪有文學》，台北：遠景出版社，1998年2月。
- 葉石濤：《臺灣文學史綱》，高雄：文學界出版社，1987年2月。
- 葉石濤：《走向臺灣文學》，台北：自立晚報社文化出版部，1990年3月。
- 葉石濤：《臺灣文學的困境》，高雄：派色文化出版社，1992年7月。
- 葉石濤：《臺灣文學的悲情》，高雄：派色文化出版社，1990年1月。
- 錢鴻鈞：《戰後臺灣文學之窗—鍾肇政六百萬字書簡研究》，台北：文英

堂，2003年6月。

鍾肇政：《沉淪》，台北：蘭開出版社，1968年6月。

鍾肇政：《怒濤》，台北：草根出版社，1997年4月。

鍾肇政：《鍾肇政回憶錄(一)》，台北：前衛出版社，1998年4月。

鍾肇政：《鍾肇政回憶錄(二)》，台北：前衛出版社，1998年4月。

鍾肇政：《濁流三部曲一流雲》，桃園：桃園縣文化局，2000年12月。

鍾肇政講述，莊紫蓉筆錄：《臺灣文學十講》，台北：前衛出版社，2000年11月。

鍾肇政：《沉淪》，台北：遠景出版社，2005年1月。

鍾肇政：《滄溟行》，台北：遠景出版社，2005年1月。

鍾肇政：《插天山之歌》，台北：遠景出版社，2005年1月。

簡炯仁：《臺灣開發與族群》，台北：前衛出版社，1995年8月。

二、期刊

沈鐘：〈台灣文學的使徒—鍾肇政〉，《綜合月刊》，1981年2月。

林瑞明：〈文學從土地與人民出發〉，《鄉土與文學》，台北：《文訊》1994年3月。

高麗敏：〈論鍾肇政作品《濁流三部曲》、《臺灣人三部曲》中的客家文風〉，《臺灣文學評論》，3:1，2003年1月。

陳芳明：〈臺灣文學史分期的一個檢討〉，《臺灣文學發展現象—五十年來臺灣文學研討會論文集（二）》，台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1996年6月。

黃秋芳：〈解讀鍾肇政的《怒濤》〉，《臺灣文藝》，18：138，1993年8月。

張良澤：〈一九七0年代的鍾老大—煎熬與希望的中年時代〉，《聯合文

學》，20:2，2003年12月。

壹闡提：〈女性的追尋—鍾肇政的女性塑像研究〉，《臺灣文藝》，第75期，1982年2月。

彭瑞金：〈論鍾肇政的鄉土風格〉，《臺灣文藝》，40期，1973年7月。

彭瑞金：〈傳燈者—鍾肇政〉，《聯合文學》，第18期，1986年4月。

彭瑞金：〈比較鍾肇政與葉石濤小說裡的殖民地經驗〉，《殖民地經驗與臺灣文學》，台北：遠流出版社，2000年2月。

彭瑞金：〈《插天山之歌》背後的臺灣小說書寫現象探索〉，頁8-1~8-14，發表於「鍾肇政文學國際學術會議」，桃園縣政府文化局主辦，2003年11月。

楊照：〈歷史大河中的悲情—論臺灣的「大河小說」〉，《文學、社會與歷史想像—戰後文學史散論》，《聯合文學》，1995年10月。

劉慧真：〈大河之歌，訪鍾肇政〉，《台灣評論》，1993年8月。

錢鴻鈞：〈鍾肇政內心深處的文學魂—向強權統治的周旋與鬥爭〉，《文學台灣》，第34期，1990年4月。

錢鴻鈞：〈論陳火泉、鍾肇政的戰後文學歷程〉，《臺灣文學評論》，2:1，2002年1月。

歐宗智：〈塑造臺灣女性勇敢熱情的形象——談鍾肇政三部曲中的銀妹和奔妹〉，《明道文藝》，309，2001年12月。

歐宗智：〈本土小說裡的族群情結--以「怒濤」、「埋冤一九四七埋冤」、「浪淘沙」為例〉，《臺灣文學評論》，2:1，2002年1月。

應鳳凰：〈勤寫譯、多參賽、砥礪文友—鍾肇政與五0年代臺灣文學運動〉，《聯合文學》，20:2，2003年12月。

三、學位論文

王淑雯：《大河小說與族群認同：以《臺灣人三部曲》、《寒夜三部曲》、《浪淘沙》為焦點的分析》，台北：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4，未出版。

林明孝：《鍾肇政長篇自傳性小說研究》，高雄：國立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1，未出版。

林美華：《鍾肇政大河小說中的殖民地經驗》，台南：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03，未出版。

張謙繼：《鍾肇政《臺灣人三部曲》研究》，台北：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6，未出版。

黃靖雅：《鍾肇政小說研究》，台北：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4，未出版。

郭慧華：《鍾肇政小說中的原住民圖像書寫》，台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碩士學位論文，2003，未出版。

附 錄

鍾肇政生平記事及寫作年表

年代	年齡	生平記事	寫作年表
1925 (大正 14 年)	1	1 月 20 日生於桃園縣龍潭鄉九座寮祖厝。四月隨父任所遷居大溪鎮內柵。父親鍾會可，母親吳氏。4 月隨父任所遷居大溪鎮內柵。父當教頭。	
1929 (昭和 4 年)	5	父辭教職，遷居台北市。學會講福佬話。	
1931 (昭和 6 年)	7	4 月入台北市太平公學校就讀，開始學日文。八月遷居桃園市，轉桃園公學校就讀。	
1932 (昭和 7 年)	8	遷回故鄉龍潭，就讀龍潭公學校二年級，從頭學習客家話。	
1937 (昭和 12 年)	13	3 月，畢業於龍潭公學校，報考新竹中學未錄取。	
1938 (昭和 13 年)	14	4 月，入私立淡江中學就讀，住校。	
1939 (昭和 14 年)	15	父親任五寮分教場主管(大溪鎮八結)，全家自故鄉搬來此。	
1943 (昭和 18 年)	19	3 月，畢業於淡水中學，報考上級學校，未獲錄取。 9 月，任大溪宮前國民學校助教，讀書興趣轉向日本古代的詩(和歌)	
1944 (昭和 19 年)	20	4 月，辭教職，入彰化青年師範學校就讀，結識同學沈英凱，誼同莫	

		逆，經他的引介，試讀世界文學名著，並作了一厚冊劄記。	
1945 (昭和 20 年)	21	3 月畢業於彰化青年師範學校，隨及因《學徒動員令》，服日本兵役學徒兵，駐守大甲。 4 月被任命為青年學校教官，派任彰化縣沙山青年學校任教，唯仍服日本兵役。 8 月，日本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 9 月，復員返鄉，開始讀祖國語文，如《三字經》、《百家姓》、《昔時賢文》、《幼學瓊林》……等。 10 月，赴沙山青年學校任教，旬因病離開沙山，辭職返家。	
1946 (民國 35 年)	22	5 月，任龍潭國民小學教師，初習ㄅㄆㄇㄋ，從頭學習祖國語言、文字。	
1948 (民國 36 年)	24	10 月，就讀臺灣大學中文系，因耳疾，旋輟學，返回龍潭任原職，決心獨學自修，苦讀國語文不輟。	
1949 (民國 37 年)	25	11 月與同鄉三汴村張九妹訂婚	
1950 (民國 39 年)	26	1 月，與同鄉三坑村張九妹結婚。陸續育有二子三女。 3 月 15 日結婚 45 天後，搬到九龍村。	
1951	27	3 月，長女春芳出生。此	生平第一篇文章〈婚後〉，

(民國 40 年)		時住九龍村祖屋。 11 月，春芳八月大時， 搬到東勢與父親住。	刊於《自由談》第二卷第四 期（1951 年 4 月）。此後亦 寫亦譯，頗覺吃力，但勤奮 學習讀寫，並開始投稿生 涯。
1952 (民國 41 年)	28		本年寫作甚多，開始試譯西 洋詩篇（經由日文），並撰 寫兒童讀物，刊出者數十 篇，惟創作稿均遭退。
1953 (民國 42 年)	29	2 月長子延豪出生。	首部長篇作小說《迎向黎明 的人們》完稿，投寄中華獎 金委員會，未獲發表。
1954 (民國 43 年)	30		寫《圳旁一人家》。
1955 (民國 44 年)	31	10 月，次子延威出生。	短篇小說〈老人與山〉刊於 《文藝創作》；翻譯日本作 家的創作理論，長短計數十 篇。 〈石門花〉獲晨光每月小 說。 7 月 15 日〈迎向黎明的人 們〉遭退回。
1956 (民國 45 年)	32		1 月，短篇小說〈老人與山〉 入選虞君質主編《現代戰鬥 文藝選集》(中華文化出版委 員會印行)。 3 月，中篇小說〈阿月的婚 事〉獲《豐年》半月刊小說 比賽第三名，自一日起分三 期刊載(第六卷五---七期)。 9 月，所譯創作理論《寫作 與鑑賞》結集出版(重光文藝 出版社)，這是第一本文集。 中篇小說〈老人與牛〉、〈老 人與豬〉投中華文藝獎金委 員會，獲得稿酬，但未發 表。
1957	33	次女春芬出生。	4 月，發起編印《文友通

(民國 46 年)			訊》。訖 1958 年 9 月止共發行 16 次而結束。 本年發表十餘篇短篇小說，有〈水母娘〉、〈過定〉、〈接腳〉、〈上轎後〉等；每篇均約二、三千字。又譯日本作家小說多篇。
1958 (民國 47 年)	34		印行第一本文集：譯作理論集《寫作與鑒賞》。 12 月 11 日完成〈柑子〉、〈婚宴〉兩篇。
1959 (民國 48 年)	35	三女雪芬出生。	9 月，譯日本作家井上靖長篇小說"冰壁"自 22 日起在《聯副》連載，迄次年三月十日刊畢。
1960 (民國 49 年)	36	8 月，鍾理和病逝，年四十五，撰《悼理和兄》追念。 10 月，與林海音、文心等人組成《鍾理和遺著出版委員會》，出版小說集《雨》(文星書店出版)。 12 月，獲台北市西區第六屆扶輪社文學獎。	再次試寫長篇小說《魯冰花》，自本月 29 日日本在《聯副》連載，迄 6 月 15 日刊畢，為發表的首部長篇。 7 月，《摸索者---一個蹉跎十年者的自述》獲《自由談》徵文第三名，並發表於該刊第十一卷七期。
1961 (民國 50 年)	37	8 月，鍾理和逝世周年祭時《鍾理和遺著出版委員會》出版其小說集《笠山農場》(學生書局發行)。	12 月，長篇小說《濁流三部曲》第一部---〈濁流〉開始在《中副》連載，迄次年 4 月 22 日刊畢，5 月，由中央日報社印行。
1962 (民國 51 年)	38	6 月，出版《魯冰花》(明治出版社)。	2 月，中篇小說〈摘茶時節〉在《今日世界》連載(第 238 期--241 期)。 4 月 23 日，《濁流三部曲》第二部---〈江山萬里〉開始在《中副》連載，迄九月一日刊畢。
1963	39		10 月，中篇小說〈初戀〉在

(民國 52 年)			《今日世界》連載。(第二七八---第二八一期) 12 月，出版中篇小說集《殘照》(鴻文出版社)，收〈殘照〉、〈摘茶時節〉、〈初戀〉等三篇。 本年完成《濁流三部曲》第三部---《流雲》，以及長篇小說《大壩》；也編寫電視劇「公主潭」等十餘種。
1964 (民國 53 年)	40	4 月，吳濁流創辦《臺灣文藝》月刊，自任發行人，龍瑛宗編輯，鍾肇政協助小說部份編輯。	起筆〈臺灣人〉寫出一部份即交當時甫行復刊的公論報連載，唯在試版期間即被命撤下，未能繼續刊出，執筆亦因而告停頓。 2 月，小說〈大壩〉開始在《文壇》月刊(第四十四期)連載，刊畢後於 5 月由文壇社印行出版。 9 月，《濁流三部曲》第三部---〈流雲〉開始在《文壇》月刊(第 51 期)連載，迄次年 2 月刊畢。 本年著手寫長篇小說《八角塔下》，僅完成上部，後因病輟筆。
1965 (民國 54 年)	41	參加省政文藝叢書的撰寫。 9 月，鍾肇政患劇烈痢疾。 10 月，為紀念臺灣光復二十周年，獨力編輯「本省籍作家作品選集」十冊(文壇社)及「臺灣省青年文學叢書」十冊(幼獅書店)。	
1966 (民國 55 年)	42	5 月，獲中國文藝協會第七屆文藝獎章小說獎。	9 月，出版長篇小說《大圳》(省政府新聞處省政文藝

			叢書)；11月，另由大業書店印行。
1967 (民國 56 年)	43	5月，獲教育部五十五年 度文藝獎金文學創作 獎。	3月，譯日本作家安部公房的長篇小說《砂丘之女》，並撰〈安部公房與砂丘之女〉刊於「純文學」月刊(第一卷第四期，1967年4月)，同年5月出版單行本(純文學出版社)。 4月，完成長篇小說〈八角塔下〉；5月起分一、二部在《文壇》月刊連載(第八十三、八十四期)。 5月，出版中短篇小說集《輪迴》(實踐出版社)，收入1958--1961年間寫成的較早期作品〈柑子〉等十二篇。 11月，長篇小說《臺灣人》改名為《臺灣人三部曲》第一部---〈沉淪〉，在「臺灣日報副刊」連載。(到1968春夏之交脫稿，入夏連載亦畢)
1968 (民國 57 年)	44	《沉淪》獲嘉新水泥公司文化基金會嘉新新聞獎第四屆文藝創作獎<1並由鍾肇政本人改編為電視劇「黃帝子孫」，游娟製作，於10月、11月在台視頻道播出。	6月，出版短篇小說集《大肚山風雲》(臺灣商務印書館)。 《沉淪》在「臺灣日報副刊」連載完畢，分上、下兩冊，出版單行本(蘭開書局)。 ，主編「蘭開文叢」(蘭開書局印行)，收彭歌《小小說寫作》等十八冊(陸續出版，後六種因故未印行)。 10月，出版譯作選的《戰後日本短篇小說選》(商務印書館)。
1969 (民國 58 年)	45	7月20日，「吳濁流文學獎基金會」成立，鍾肇	1月，與張良澤合譯的三島由紀夫《金閣寺》在「自由

		政應聘任該會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	談」連載，迄 11 月刊畢；12 月出版單行本(晚蟬書店)。 2 月，譯述〈世界文壇新作家〉在《幼獅文藝》連載(第三十卷二--四期)，對世界文壇上具前瞻性新作家作鳥瞰式介紹，計有法、英、美、西德、日等十一位；四月出版單行本(林白出版社)。 4 月，出版長篇小說《濁流三部曲》第二部《江山萬里》(林白出版社)。 本年創作短篇小說〈野外演習〉、〈那天、我走過八吉隧道〉等。另編寫電視劇本「茉莉花」、「老人與小孩」、「喬遷之喜」等十餘部；往後數年陸續為電視台編寫劇本多部。
1970 (民國 59 年)	46	6 月張良澤台北法院公證結婚，吳濁流為男方代表，鍾肇政為來賓。	7 月，譯安部公房《燃燒的地圖》在《這一代》月刊連載(第一卷一---五期)。完成長篇小說〈馬黑坡風雲〉並在新生報副刊連載。
1971 (民國 60 年)	47		8 月，長篇小說〈青春行〉自 27 日起在「臺灣日報副刊」連載，迄次年 1 月 11 日刊畢。
1972 (民國 61 年)	48		3 月，譯伊撥耶.班達桑《日本人與猶太人》出版(林白出版社)。 6 月，譯瑪麗.史托普著《結婚之愛》出版(林白出版社)。 7 月，編譯《名曲的故事——偉大音樂家的故事與名曲欣賞》，在《大同》連載，

			迄次年 6 月 1 日刊畢(第 54 卷 13 期—第 55 卷 11 期)。 10 月，譯三島由紀夫《太陽與鐵》、白石浩一《幽默心理學》，出版(林白出版社)。
1973 (民國 62 年)	49	4 月，「臺灣民間故事新編」計十一篇自 15 日起在「聯合報副刊」陸續連載。 9 月，父親鍾會可過世。	6 月，長篇小說〈綠色大地〉自 26 日起在「中華日報副刊」連載，迄 11 月 27 日刊畢。 發表《臺灣人三部曲》第三部《插天山之歌》於《中央日報》。 9 月，長篇小說《馬黑坡風雲》出版(臺灣商務印書館)。
1974 (民國 63 年)	50	8 月，應東吳大學東語系之聘擔任講師，授日本文學及翻譯等課程。	1 月，〈臺灣高山故事新編〉自 14 日起在「聯副」陸續連載。 3 月，編撰《西洋文學欣賞》自 16 日起在《大同》連載，迄次年 5 月 1 日刊畢(第 56 卷 6 期---57 卷 9 期)。 4 月，臺灣民間故事新編分成《靈潭恨》、《大龍峒的嗚咽》兩冊出版(皇冠出版社)。 7 月，自傳體長篇小說《青春行》出版(三信出版社)。 8 月，編譯《名曲的故事》、譯英國史家 H.G.威爾斯《文明的故事》分別出版單行本(志文出版社)。 9 月，譯作井上靖《冰壁》出版單行本(三信出版社)。
1975 (民國 64 年)	51		5 月，長篇小說《臺灣人三部曲》第三部---《插天山之歌》出版單行本(志文出版社)。

			5 月，譯伊騰勝彥《愛的思想史》出版(文皇出版社)。 7 月，譯《夫妻之道》出版(林白出版社)。 8 月，長篇小說《臺灣人三部曲》第二部---〈滄溟行〉自 17 日起在「中央日報副刊」連載，迄次年 1 月 29 日刊畢。(並於 1976 年由七燈出版社印行) 10 月，長篇小說《八角塔下》出版單行本(文壇社)。 12 月，著《西洋文學欣賞》、譯「歌德自傳」出版(志文出版社)。
1976 (民國 65 年)	52	兼任《臺灣文藝》主編	1 月，譯愛密爾.金尼斯《希臘神話》自一日起在「大同」半月刊連載，迄十二月十六日刊畢(第五八卷一---二十四期)。 5 月，譯瑪文.杜凱耶《日本人的衰亡》出版(志文出版社)。 5 月，與張良澤合譯的《金閣寺》增訂版出版(林白出版社)。 6 月，譯白石浩一《高中生心理學》出版(林白出版社)。 9 月，長篇小說〈望春風〉自 29 日起在「中央日報副刊」連載，迄次年 2 月 17 日刊畢。 11 月，譯法國作家梅里美小說《卡爾曼的故事》出版(志文出版社)。
1977 (民國 66 年)	53	1 月 20 日鍾肇政到國教研習會授課。(兒童文學	編著《名曲的故事》在《大同》半月刊連載。(第 59

		研習班的老師) 《臺灣文藝》雜誌創辦人於 1976 年九月逝世後，經同仁等推薦而接辦此刊，並自本年 3 月起發行革新第一號(總號五十四號)，從此社務、編務一手承擔。 8 月，主編「臺灣文學獎. 吳濁流文學獎作品集」出版(鴻儒堂出版社)。	卷 5 期---60 卷 21 期)。 3 月，長篇小說《望春風》出版單行本(大漢出版社)。 譯安部公房《燃燒的地圖》出版(遠景出版社)。 6 月，譯作愛密爾.金尼斯《希臘神話》、史懷哲《非洲故事》、編譯《史懷哲傳》三書出版(志文出版社)。 10 月，長篇傳記小說《丹心耿耿屬斯人---姜紹祖傳》出版(近代中國出版社，先烈先賢傳記叢刊)。 10 月，譯久保克兒《走出迷惑》出版(文華出版社)。
1978 (民國 67 年)	54	8 月，應聘民眾日報社副刊室主任，兼副刊主編。辭東吳大學東語系教職，專心寫作。出席聯合報第三屆小說獎評委會總評會議。	1 月，譯安部公房《箱子裏的男人》在《臺灣文藝》連載。 11 月，編著《中國古典名著精華》自 16 日起在《大同》半月刊連載，迄 1980 年 12 月 16 日刊畢(第六十卷二十二期---第六十二卷二十四期)。 本年創作短篇小說〈法蘭克福之春〉、〈月夜的召喚〉、〈白翎鷺之歌〉、〈尾叔〉、〈尾叔和他的孫子們〉等。
1979 (民國 68 年)	55	長子延豪以短篇小說〈高潭村人物誌〉獲第二屆時報文學獎；又以短篇小說〈故事〉獲吳濁流文學獎。 10 月，長篇小說《濁流三部曲》獲第二屆吳三連文藝獎。 11 月，正式退休，歷任小學、中學、大學教師	2 月，編選《當代中國新聞學大系---小說二集》出版(天視出版公司)。 3 月，長篇小說《濁流三部曲》合刊出版(遠景出版社)。短篇小說集《鍾肇政傑作選》、譯宋敏稿《朝鮮的抗日文學》二書出版(文華出版社)，又，所譯安部公房《箱子裏的男人》出版(遠景出版

		凡三十二年。	社)。 4 月，長篇小說《馬利科灣英雄傳》出版(照明出版社)。 6 月，第一部長篇小說「魯冰花」重版刊行(遠景出版社)；又，編譯《名片的故事》出版單行本(志文出版社)。 7 月，中短篇小說集《鍾肇政自選集》出版(黎明文化公司)。
1980 (民國 69 年)	56	2 月，辭「民眾日報副刊」主編暨副刊室主任職。 5 月，長子延豪出版第一本短篇小說集《金排附》(台北.東大圖書公司)，父薪子傳，為文壇佳話。 8 月，偕同北部文友多人等南下美濃笠山鍾理和故居，並與鍾理和遺孀鍾台妹一起主持鍾理和紀念館破土典禮。	3 月，撰寫〈原鄉人---作家鍾理和的故事〉，其中部份自七月十二日起在「中國時報人間」連載。 6 月，長篇小說《臺灣人三部曲》合刊本出版(遠景出版社)。 本年度創作短篇小說〈回山裏真好〉、〈馬拉松.冠軍.一等賞〉等。
1981 (民國 70 年)	57	1 月 25 日長子延豪結婚。 年初，成立臺灣文藝出版社，任發行人，期能博取若干利潤，以挹注臺灣文藝雜誌。	1 月，編著《中國古典名著精華》、編撰《不滅的詩魂---對談評論集》二書出版(臺灣文藝出版社)。 主編《臺灣文藝小說選》出版(臺灣文藝出版社)。
1982 (民國 71 年)	58	5 月，應邀參加文藝訪問團，赴韓、日訪問歷時一整月。 秋間，決定交卸臺灣文藝雜誌社務與編務，由陳永興接辦。從此蟄居鄉間，並著手計畫《高山三部曲》之寫作，至年底一連四次深入霧社	11 月間開始「高山三部曲」之寫作，次月起在中華副刊連載。

		各部落作田野調查及訪問山地故老。	
1983 (民國 72 年)	59	6 月中旬母過世。 8 月，主持鍾理和紀念館落成啓用底典禮。	4 月，《高山三部曲》完成《川中島》、《戰火》二部。 發表長篇《高山組曲》於《臺灣時報》。
1984 (民國 73 年)	60	6 月 28 日，應邀赴美訪問，回程經加拿大、日本(楊青矗有去)，於 9 月 20 日返台，歷時八十五天，遊歷該三國大城及名勝古蹟多處，並作十餘場演講。	五月，改寫日本電視劇「阿信」為小說體裁，六月底由文經社印行。 10 月起陸續撰有遊記〈永恆的露意湖〉等多篇。
1985 (民國 74 年)	61	5 月，為寫〈卑南平原〉赴台東訪問，詳作田野調查。 12 月，長子延豪遭車禍亡故。	元月份起，遊記〈北美大陸文學之旅〉在大同月刊連載，迄十二月份止結束。 6 月，起筆撰寫長篇小說〈卑南平原〉，九月二十日脫稿。
1986 (民國 75 年)	62	獲得台美基金會成就獎。	發表長篇小說《卑南平原》於《臺灣時報》及《世界日報》。
1987 (民國 76 年)	63		長篇小說《卑南平原》出版(前衛出版社)。 長篇小說《望春風》再版(前衛出版社)。
1989 (民國 78 年)	65	5 月上客家文化講座，每週一次每次三十分鐘。 魯冰花開拍。 九月十九信，臺灣文學大系掛名編委召集人。	
1990 (民國 79 年)	66	主編《臺灣作家全集》五十冊。 8 月 18 日獲鹽份地帶文藝營文學貢獻獎。 就任臺灣筆會會長。 就任臺灣客家公共事務協會理事長。	

1991 (民國 80 年)	67		發表長篇小說〈怒濤〉，元旦起在自立晚報發表。
1992 (民國 81 年)	68	推動鄧雨賢紀念音樂會於國家音樂廳，事情進行中音樂廳無理阻撓，寫信給李登輝而獲得最後解決。 10 月，李登輝路過龍潭，登門造訪。 榮獲第五屆客家臺灣文化獎。	
1993 (民國 82 年)	69	卸任臺灣筆會會長。	出版長篇小說《怒濤》(前衛出版社)。書簡集《臺灣文學兩地書》(前衛出版社)。
1994 (民國 83 年)	70	10 月，任寶島客家電台榮譽台長。 12 月，卸任臺灣客家公共事務協會理事長，後為榮譽理事長。	
1995 (民國 84 年)	71	4 月日本下關之旅，為參加馬關條約一百週年紀念會演講。	
1996 (民國 85 年)	72	受客家鄉親邀請之德國之旅。 以紮根著眼，至武陵高中為國文教師們約每二星期一次講臺灣文學，共十次。	
1997 (民國 86 年)	73	任寶島客家電台榮譽董事長。 師範大學人文講座駐校作家	長篇小說《怒濤》、《望春風》由草根出版社出版。
1998 (民國 87 年)	74	3 月，接任台北市客家文化基金會董事長。 7 月 30 日台北客家界支持陳水扁連任台北市長後援會在美麗華飯店成立，鍾肇政被推舉為會	3 月，出版《臺灣文學兩鍾書》、《掙扎與徬徨》、《文壇交友錄》。 5 月 3 日起，自由時報每星期一，刊出鍾肇政專欄『臺灣的心』。

		長。 10月3日與台北市長陳水扁共同主持台北客家文化會館揭幕式。	
1999 (民國 88 年)	75	1月14日，遠景出版社沈登恩簽下《濁流三部曲》、《臺灣人三部曲》、《魯冰花》等三部作品由桃園文化中心轉載印予《鍾肇政全集》之版權同意書。 8月8日，在高雄接受民眾日報、文學臺灣共同頒發之臺灣文學貢獻獎。 獲第三屆國家文藝基金會文學類國家文藝獎、文學臺灣基金會臺灣文學獎、真理大學臺灣文學牛津獎。 10月13日獲元智大學邀請當該校「駐校作家」。 10月25日獲成功大學邀請當該校「駐校作家」，為期一週。	桃園縣立文化中心出版鍾肇政全集。
2000 (民國 89 年)	76	5月3日，李登輝贈勳，大授二等錦勳勳章。 5月4日，陳水扁來府，親邀為總統府資政(目前仍被續聘為有給職資政)。	《臺灣文學十講》由前衛出版社出版。
2001 (民國 90 年)	77	5月4日，獲中國文藝協會致贈年度榮譽文藝獎章。 6月16日，鍾肇政至台中文化學院受頒榮譽博士學位。	《書簡集》由桃園縣文化局出版。

2002 (民國 91 年)	78	3 月，於台大法學院發表論文〈原住民文學的歷史文化教育〉。	6 月，完成五萬字雜文稿。 7 月，完成〈歌德文學之旅〉兩篇。
2003 (民國 92 年)	79	1 月，加入民進黨。 7 月，獲第二屆總統文化獎百合獎。	3 月開始寫〈少年歌德的煩惱〉，第一單元五千字已完成。 4 月，〈歌德文學之旅〉完成七篇約六萬字。 10 月，出版《歌德激情書》，前衛出版社。
2004 (民國 93 年)	80	4 月，參加「客家文學數位化資料庫」啓用典禮。	5 月，鍾肇政全集第五批八冊印行。

資料來源：

1. 鍾肇政：《年表、補遺、演講大綱》，桃園：桃園縣文化局，2004。
2. 鍾肇政年表
<http://www.au.edu.tw/mt/hcchien/%C1%E9%BBF%ACFweb/year-1.htm>
3. 鍾肇政生平大事年表
http://literature.ihakka.net/hakka/author/zhong_zhao_zheng/zhao_year.htm
4. 鍾肇政：《鍾肇政回憶錄(一)、(二)》，台北：前衛，1998。